

蔣介石先生思想研究集



中華圖書公司印行

1938

劉炳藜編

蔣介石先生思想研究集

華中圖書公司印行

# 蔣介石先生思想研究集

實售國幣五角

必翻所版  
 究印有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改訂後初版

編者 劉炳藜

發行者 唐性天

印刷者 漢口武漢印書館

漢口湖北街

發行所 華中圖書公司

電話二四二八二

分店 武昌漢陽門大街

宜昌惠通路致德里

重慶武庫街



蔣公近影



影合長員委理總 年三十

## 編輯例言

我很奇怪，國人以前很注意研究墨索里尼、希特勒、史太林等的思想，而少注意研究我民族領袖蔣介石先生的思想；國中出版的關於研究墨索里尼、希特勒、史太林等思想的著作很多，而關於研究蔣先生的思想的著作却未有。這究竟是個甚麼原因？也許是我國人太媚外而忽內了罷？近年來國人自力更生的呼聲很高；跟着這聲浪之增高，國人大聲疾呼，需要堅苦卓絕以救國救民爲己任的民族領袖。經過若干年的磨礪體察，國人現已認識了，蔣介石先生是我民族的最高的領袖。他有「聰穎的智慧，機敏的自覺，明確的判斷，廣博的胸襟，清白的理性，豐富的想像，濃厚的感情，純潔的動機；仁慈的心境，堅強的體魄，雄壯的精神，靈活的手腕，出

現于多災多難的二十世紀初葉的中國」，堅苦卓絕，險阻備嘗，一心一意以救國家救民族爲己任。雖然現在的中國不能說是已經強盛了，但因十數年來蔣先生之英勇奮鬥，刻苦努力，我國現已有自立自強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國不難建設成一個現代的國家。因爲這個緣故，國人一致熱烈地擁護蔣先生，擁護蔣先生從速用力解救中國之危難，拯斯民于塗炭；因爲這個緣故，國人現已開始急切地要讀蔣先生的言論，要研究蔣先生的思想。編者不敏，近年來搜集蔣先生的言論著作不下三百餘萬言，研讀之後，覺其對政治、軍事、人生哲學與教育的理論及經驗，浩瀚淵深，情不自禁地發爲文章，先後在前途雜誌發表若干篇（多用筆名），並邀集對於諸科有專門研究，現在京滬各大學任教的朋友，供給他們以已經搜集了的蔣先生的言論著作，便其研究，發爲文章，多刊載于前途雜誌。現在將這些文章集合起來，並商得黃浦月刊編者的同意，將其第六卷第四期所發表的文章借來三篇（這三篇文章和在前途雜誌發表的文章凡非編者所作均于篇後附註中聲明），共計十餘萬言，刊

爲一集，名曰「蔣介石先生思想研究集。」蔣先生的功業彪炳寰宇，蔣先生的思想浩瀚無垠，以編者淺陋及諸作者之時間短促，且均未能時聆蔣先生的教益，我們如何能窺得蔣先生的思想的堂奧？所以這些文章起初實不敢貢獻於諸讀者之前。但是後來思想，並經諸讀者的熱烈篤促與歡迎，祇得貢獻出來。這算是「拋磚引玉」罷。我們既然拋下了這塊大石頭，當然便有玉石出來的呀！國人現在熱烈的擁護蔣先生，其欲讀先生言論著作及欲讀研究蔣先生的思想者作的同胞，誠不知有若干萬，這本書的貢獻不過是爲時代盡任務，滿足我熱烈地擁護蔣先生及急欲研究蔣先生思想著作的若干萬同胞的慾望而已。

國人前些時愛好閱讀關於研究墨索里尼、希特勒及史太林等思想的著作，現在已轉變過來愛好閱讀關於研究蔣先生的思想的著作，這是個時代的要求，這個要求是很偉大的並急切的呀。是書出版，特作數言以爲例序。



## 改版序言

蔣介石先生的思想言行，近一年來，尤其自抗戰發動以來，經過事實與理論的推演，已爲國人所重視，且國人已視爲行動與理論的圭臬了。筆者年前曾編一書名曰蔣介石先生思想研究集，在南京出版風行一時。自抗戰發動以後，因紙張印刷關係未及在南京續版。但是國人之需要該書者既切且迫。筆者現將該書中之繁冗文章四篇及特載二篇取消而留其精粹者十篇仍名爲蔣介石先生思想研究集，均爲對領袖思想研究精深之作，對領袖哲學思想，人生哲學、革命哲學、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等，無不羅列殆盡。讀者讀此一篇，可了然領袖思想言之大概且得進而窺其堂奧，于個人以及革命思想行動當有莫大之裨益。因書改版故特綴數言以爲序。

# 蔣介石先生思想研究集目錄

畫傳·····	一
編輯例言·····	一
以版序言·····	四
蔣介石先生思想與事業之管窺·····	一
蔣介石先生的哲學思想·····	二五
蔣介石先生的人生哲學述要·····	四八
蔣介石先生的倫理思想·····	六八
對於蔣介石先生人生觀之管窺·····	八九

蔣介石先生的革命哲學述要·····	一一一
蔣介石先生的政治思想述要·····	一三四
對於蔣介石先生政治思想與方法之管窺·····	一五〇
蔣介石先生的教育思想述要·····	一六九
蔣介石先生的教育思想·····	一八八

# 蔣介石先生思想與事業之管窺

——爲慶祝蔣公五秩壽辰作——

蔣公介石以蓋世之才，身荷重任，困苦艱難，救護中國。今年十月二十九日適值其五秩壽辰，全國慶祝。或者購機獻壽，或者發爲文字頌揚其功績，或研究其思想言行。作者不揣冒昧，於舉國歡欣鼓舞之時，特將我革命領袖蔣公之思想事業一爲敘述。但蔣公思想事業之偉大以及其繼續邁進之功能，不是作者這枝秃筆所能描寫其萬一的，則此文之作，不過是聊表作者之一番敬意而已。其有錯誤或不當之處自知難免，敬祈蔣公鑒諒並希讀者指正。

## 一 蔣公是世界的偉人

蔣公生當亂世，扶危濟傾。在這二十世紀的初葉，以言國際，則腥風血雨，以言國內，則爛熳鼎沸。數千年的有史可查的人類歷史，走到這個階段要算最爲複雜，最爲變幻，原因是人類歷史越走越複雜，越走越變幻，而現階段是歷史之最近階段，其複雜變幻當較前爲甚；尤其中國，其複雜變幻的程度視各國爲甚，原因是中國數千年來逗留在小農生產的境域，一旦與資本發達的工業國家相接觸，其莫知所措乃是必然的現象。所以近百年來，尤其近幾十年來，中國自然地爲國際資本主義所牢籠或宰割，這一個複雜變幻的現象實是中國歷史所未曾有（這是自然的現象）。蔣公生當茲世，竟先總理未竟之志，成先總理未成之業，外應國際之狂潮、內定中原之變亂，扶危濟傾，其豐功偉烈，世界英豪，如莫索里尼，希特納等，均不足與比擬。試先以莫索里尼來講：莫氏生在意大利國，露頭角于歐洲大戰之後，提倡

並實行法西斯主義，一手奠定意國的邦基且使雄視全球，其功績之偉，世人稱頌。但意大利小國也，其歷史較中國爲短，其國際關係較中國要簡單至若干倍，莫氏在意大利可以爲所欲爲，外無國際的阻撓，內無國人的障隔，所以自其倡行法西斯主義以來，一帆風順，如願以償。又如希特納處茲德國的境地，當較莫索里尼困難若干倍。但德國國際關係仍未有中國這樣的複雜，其國內是統一的，其人民的智識，技術，與道德均非常高尙，故在德國亦可以爲所欲爲。其領導國社黨一舉而撕破凡爾賽條約，重整軍備，問鼎歐洲，震驚全球，固不可輕視其魄力之強，毅力之大。但其歷史環境條件之成熟實大爲之助。這些條件在中國是不容易獲得的。再如斯大林，麥克唐納，羅斯福等，或則繼承舊業，或則因其固有的歷史，國際，物質諸條件，便於建設，其能造福邦國，維繫世界安危乃是事之當然，毋足驚異。所以現世各建國諸英豪相較，其功績雖強可比于蔣公之所爲，而其所受之艱難困苦則無有能比擬者。而蔣公竟能在此外受國際無限的威脅，內受國人重重的束縛之下，竟能領

導國民黨，一舉而完成北伐，再舉而殲滅土匪，進而能使中國在強鄰挾制威迫下克保生存，徐圖建設，內而國人精神物質政治生活日有改進，外而國際關係日圖改善，尤其近數年來之國家進步有目共睹，這不是蔣公非常之才所作出來的非常之事嗎？此種功績是世界歷史不可磨滅的，雖一時不能比擬莫希二氏之重整意德，但稍假時月，則其成功之大有足以驚耀于世界史者。故謂蔣公是世界之偉人，且駕於莫、希諸氏之上，未常不可。

## 二 蔣公是中國民族的領袖

蔣公對於世界貢獻的工作在救護其祖先墳墓所在之擁有四萬萬五千萬以上人口東亞大國之中國，故其目前工作之主旨與其認為世界性的母甯認為中國性的，這並不是說蔣公建國的工作沒有世界性，乃是說中國乃世界之一部份，要把中國建設好，世界才能好，故建設中國即建設世界之一部份，建設中國，起初為國家性的，容後

將轉爲世界性的。因其如此，故我們尊他爲中國民族的領袖。溯自中國民族建國以來，迄今凡數千載，起初在黃河流域，後延至長江流域與珠江流域，我列祖列宗斬荆披棘，辛苦備嘗，能使我民族血統垂於不絕，國家命脈得保生存者，在這大獸相食，種族競爭之社會實非易易。考我先祖之有功民族或建國功業者，除神話所傳之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而外，其可數者要算是歷代開國或中興的君主，如漢高，漢武，唐太，唐高，宋太，明太以及歷代爲民族殉節力護祖國之諸烈士如岳飛，史可法，文天祥等。他們各以其智慧與熱血貢獻於本民族及其所生存之土地，其豐功偉績，史有專書，以供後世之頌揚，毋待作者來着筆。但迄今世，其能以民族國家之危亡爲己任，且其才智勇毅，足以救護民族國家之危亡而毅然貢獻其全力者，祇有先總理及蔣公二人而已。先總理之功業不在此處敘說。惟我蔣公，以蓋世之才智氣度，戮力國事，再造中國，其豐功偉烈實足與先總理媲美。蓋有史以來，中國民族所遭逢之厄境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在先爲中國民族之大患者，祇有慄



悍的匈奴突厥，獯狁，回紇、鮮卑，諸族。但這等民族過的是遊牧生活，其所有文化工具較中國的爲低，即中國處在較高一階段之農業生活，農業文化自然較游牧文化爲高。以處在低階級文化之民族進攻高階段文化之民族，雖一時獲得勝利，終必被其同化，這是必然的現象。所以歷代以來，雖然有北方諸游牧民族之進攻而且有時獲得勝利，但終爲中國民族所同化，中國民族終能屹立於東亞，且其文化澤被寰宇。但是現在進攻中國民族者，不是處在低階段文化之民族，而是處在高階段文化——較中國現文化爲高——之民族（即工業民族）。低文化民族進攻高文化民族結果不免爲高文化民族所同化；至高文化民族進攻低文化民族則結果適得其反，不是後者同化前者，而是前者同化後者，而是進攻者宰割被進攻者。所以現階段之中國，其抵抗外來民族即國際資本主義之進攻，較之往時要困難至若干倍。蔣公適逢這個時會，奮其全力，內求統一，外求獨立，其困苦艱難之境，實非過去歷史之所曾有。往日異民族進攻不怕爲其所同化，雖一時失去土地，不久可以收回，本民族的

精神文化，不致遭受摧殘；今則不然，失去土地，不易收回，精神文化爲所摧殘，政治解體，物質崩潰，民族渙散，無以爲國。故歷代建國，中興復國，以及抗敵以興或抗敵以亡之民族英雄，其功績固在國家，值得史家贊揚，後世歌頌；但現代準備建國復國，抗敵之民族英雄其處境較之以前困難至若干倍，這不更值得人民之景慕與歌頌麼！所以吾人以中國民族領袖稱頌蔣公，自知蔣公所負責任之重矣。

### 三 蔣公是中國國民黨的導師

近數十年以來的中國，是以中國國民黨爲其柱石或撐支的。先總理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不幸大業未成，寶志以沒。其繼承者，在初大家均期望於胡（展堂）汪（精衛）蔣（介石）三公，但經過事實的證驗，除胡公對理論有貢獻，汪公運行一時之政權外，其克承先總理之偉業者祇我領袖蔣公一人而已。這是蔣公所作出來的事實，也是國民黨員所公認的。蔣公自奮其志勇

追隨先總理之後，先總理特別青睞，愛護有加，委以重任。總理死後，蔣公督率黨軍，完成北伐，先總理若干次在兩粵倡導之北伐完成於其死後三四年之內，設非蔣公有智勇兼全之才，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曷克臻此！北伐完成之後，共產黨僭竊黨權，希圖傾毀國民黨，幸我蔣公英明覺察，於民國十六年四月十六日開始毅然清黨，為時不久，共黨勢窮力蹙，負隅圖存，我蔣公矢力撲滅，先剿贛巢，後追川左，再至西北，稍假時日，餘燼即除。蔣公以青天白日之大旗幟，插遍中國之全領域，掃蕩羣妖，清除反側，其功績之偉，在國民黨中實獨占高位。且也蔣公復在事實上補充先總理之遺教，如倡導新生活運動，提倡禮義廉恥以充實先總理心理建設，倡導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以充實先總理之物質建設。此兩運動風行全國，亦即先總理物質與精神建設，繼長增高。總之自事實到理論，國民黨之有力實行者唯蔣公一人，故我們稱他為國民黨的導師。

#### 四 蔣公是軍事家

有人認為，蔣公之對於國家之最大貢獻厥為軍事，故稱他為世界偉大的軍事家。他在軍事上成功的事件其最大者當為北伐與剿匪。他有百戰百勝之本領；不戰則已，一戰必勝。自他出長戎機以來，無論大小戰，每戰皆克。他於民國十三年在黃埔軍官學校講革命軍致勝之道「我們希望軍隊好過人家，有三件不費本錢而又是最要緊的：第一是編制，第二是精神，第三是紀律」。他以為「革心」「自反」「團結」「冒險」是革命軍人應具的特性。見民國十三年在黃埔軍校講革命軍特殊的精神和戰術。他於是年講軍紀詞中，說軍紀的要素有三：其一是人格的影響，其二是情分的交感。其三是一致的精神；而於一致的精神則又提出四個要點：一是民族傳統的要點，二是人格的勢力，三是鍛鍊全軍的學問技術，四是整齊人事的系統；說整肅軍紀的方法有八個要點：一要清潔，二要有秩序，三要有條理，四要精密，五要慎言（戒謊言欺人），六要誠實（戒虛浮），七要親愛（和衷共濟），八要靜肅。他於廬山軍官訓練團時曾親自書出下列數則重要格言以誥誡全體軍人。

其一是陣中必讀：

嚴守紀律 服從命令

遵守時間 盡忠職務

愛護人民 實行主義

剿滅赤匪 完成革命

其二是陣中反省錄：

一、對主義盡忠了麼？

二、對黨國負責了麼？

三、對統帥信仰了麼？

四、對上官服從了麼？

五、對部下信仰了麼？

六、對本身自信了麼？

其三是國民革命軍人「四要」：

- 一、要對得起已死的將士
- 二、要對得起總理的靈魂
- 三、要對得起生我的父母
- 四、要對得起痛苦的民衆

他在廬山軍官訓練團於軍事教育之要旨一題，作過五次講演。第一次提出三個要點：一是說明恢復軍人魂，創造新生命之重要；二是說明軍事教育有四大要旨，即「確實」「迅速」「靜肅」「秘密」；三是說明一切輕浮虛僞，力求實在着重爲軍官首要之修養。第二次說明「確實」爲軍事教育四要旨之首；其意義在「準確」「實在」，「不輕浮」，「不浪漫」，其應用在對時，對地，對人，對事對物皆要確實。第三次說明「禮」爲處事接物一切合理的態度與規矩；爲軍事首要之基本課目，亦即實踐四維真正做人之起點；禮之要件，在形式上必有節度，在精神上必

合乎義理；軍隊爲明禮義知廉恥之國民學校。第四次說明上官對於部下應同時「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作之君」之道，在賞罰嚴明，恩威並濟；「作之親」之道，在同甘苦，共患難，愛兵如子；「作之師」之道在明四維，教六藝。第五次說明「六藝」爲現代軍民所應兼修齊備之品德與技能；軍事教育應以「六藝」爲基本課目而以「禮」爲中心；軍事教育之目的在使全軍精神「共同一致」；全國軍人應確定三民主義之中心信仰，統一意志，團結精神。

他在廬山軍官訓練團歷次講演中常提到「仁民愛物」，「智，信，仁，勇，嚴」，「命令，就是生命的指南」，「打仗就是打時間」，「不成功便成仁」諸義。蓋此等觀念亦屬軍事教育之要旨。

民國二十四年蔣公在峨嵋軍官訓練團規定十大訓條以誥誡全體軍人：

- 一、信仰三民主義，服從革命領袖，在統一意志下努力。
- 二、磨練身心，精究學術，在充實本身力量上努力。

- 三、思周慮密，言信行果，在謀定後動的古訓下努力。
  - 四、克服天然，自強不息，在人定勝天的信念下努力。
  - 五、冒險犯難，堅苦卓絕，在不成功便成仁的訓示下努力。
  - 六、敬上和下，克己勉人，在明禮義，知廉恥上努力。
  - 七、精誠團結，犧牲小我，在負責任，守紀律上努力。
  - 八、愛護人民，表率部屬，在良兵良民的目的下努力。
  - 九、勝不居功，敗不餒志，在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上努力。
  - 十、忍辱負重，繼往開來，在復興中華民族，完成國民革命的決心下努力。
- 然而要觀蔣公對於軍人誥誡之要點，須觀與黨員守則並重一時之軍人誡訓。
- 一、實行三民主義，捍衛國家，不容有違背怠忽之行爲。
  - 二、擁護國民政府，服從長官，不容有虛僞背離之行爲。
  - 三、敬愛袍澤，保護人民，不容有倨傲粗暴之行爲。



- 四、盡忠職守，奉行命令，不容有延讓怯懦之行爲。
- 五、嚴守紀律，勇敢果決，不容有廢弛敷衍之行爲。
- 六、團結精神，協同一致，不容有散漫推諉之行爲。
- 七、負責知恥，崇尚武德，不容有污辱貪鄙之行爲。
- 八、刻苦耐勞，節儉樸實，不容有奢侈浮滑之行爲。
- 九、注重禮節，整肅儀容，不容有褻蕩浪漫之行爲。
- 十、誠心修身，篤守信義，不容有卑劣詐僞之行爲。

總之，蔣公軍事特強，人所共認，其殺敵致果，成仁取義，訓迪後進之心，隨時流露于楮墨間，此處所錄，不過其萬一耳。中國革命史有專載，讀者參閱之可也。

## 五 蔣公是政治家

軍事是以政治爲目的的。蔣公之致力於軍事，其目的是欲改革中國政治，重建中華民國。他自民國十三年以來，其主持國民革命之進展，不僅是軍事的，而且是政治的。這十餘年來，他所主持的工作如總司令或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等職固然是軍事的，但國府主席，行政院，以及中常委等職則顯明地是政治的；並且在其主持軍事的任務之中，多含有政治的意味，如剿匪之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是也。且也，在革命進展的過程中，軍事較政治爲重要，則蔣公十餘年來之盡瘁國事與其說是軍事的，毋寧說是政治的，故與其稱蔣公爲軍事家毋寧稱他爲政治家。至其政治之主張則悉遵先總理之遺教，惟于實施之方法則甚考究，蓋以爲先總理已規定經邦定國之大計，吾人不過于其實施過程中多加努力，于實施方法多加研討，于運用多加審慎，以便此大計早日實現耳。蔣公于國事方針決定之大者莫過于盛傳中外之有名的「安內攘外」之大策。內安而後外可攘，蔣公近數年來之努力盡集于此，現在可謂已奏膚

他在政治上最大的貢獻在指示爲政之道。他于總理遺教政治建設之講演中曾指出幾個要點以爲政治要領，那幾個要領是：

第一，除舊佈新因勢利導：那也就是「因民之利而利之，擇其可勞而勞之」的意思。

第二，教養兼施，「循序漸進」那也就是「正德」，「利用」，「厚生」以及「政自小始」的意思。

第三，迅速確實，貫徹始終：那也就是「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以及「政貴有恒」的意思。

第四，守法重紀，明德修身：那也就是注重法紀制度以及「革命必先革心」的意思。

第五，選賢任能，講信修睦：那也就是「爲政在人」「和衷共濟」以及「以民治民」的意思。

第六，注重組織，努力研究：那也就是重視組織之要件與方法以及「數」必求精的意思。

他以爲「只要大家能照所講的意思，深思博察，身體力行，一定可以辦好政治上任何艱鉅的事業，成功一個現代的政治家」。

他在峨嵋軍官訓練團講演國家的生命力，說「教育」「經濟」「武力」是國家生命力。第一講到武力，他說：「現代所謂武力不僅是指軍隊與武器而言，……乃包括國家所有國民，人人應參加戰事，致力國防，所有一切的物質，那怕一草一木，皆爲戰爭與國防之所需，莫不爲武力之要件。……具體的講，就是要全國四萬萬同胞，都能成爲軍國民，卽有組織有紀律有訓練，能够爲國犧牲的戰鬥員」！第二，講到經濟，他主張應增加生產，減少消費，合理分配，便利貿易與發展交通。而于禮運所載的「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爲己」以及先總理常說的「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等語尤再三致意。

第三，講到教育，于「智」，「德」，「體」，「羣」，與「智信仁勇嚴」之外，尤注重除靈與血，此外還注重「武德」與「武藝」之軍國民教育。

他于政治最注重實行，近年尤注意于地方與中央政府之關係以及其相輔之發展。他于今年行政院所召集的地方行政會議閉幕之日發表重要的演詞，將地方行政應與軍注重之點條分細舉，不厭詳盡，以其獨特深博之行政經驗貫輸于地方行政實施之中，使地方行政顯現一綫光明，由此可知他不僅是一個中央政治領導者，而且是地方政治指導的專家。他在剿匪期中所主張並現已實行于各省的行政督察專員制以及省府合署辦公與縣府裁局改科等方案，尤于中國地方行政上甚至行政學著有不朽的成績。

外交是政治的重要項目，他于外交情勢緊迫危急中發表重要的演詞，其意是：「以不侵犯主權爲限度，謀友邦之政治協調；以互惠平等爲原則，謀友邦之經濟合作」。至「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

」之名言，久已爲國人所傳誦。總之，他于外交是有卓見的。

他深恐政治的勢力不能普及于民間，故于中央及地方政治竭力改善推行之外，又倡國民經濟建設與新生活二運動，以期其在民間發生偉大的效力。此二運動倡行以來，風起雲湧，遍行全國，舉凡全國人民之物質與精神生活均有改善之趨勢。此實爲藉民間或社會勢力以推進政治之成效。

## 六 蔣公是教育家

軍事與政治之成功須要教育爲其輔助；教育滲透于軍事與政治各領域中。蔣公之成爲偉大的軍事家與政治家，爲民族領袖，爲世界偉人，其得力于教育者甚多；換句話說，教育作用之幫助蔣公成就偉大的事業可不待言。且也，蔣公以教育方法爲軍事與政治等工作之基礎。他平時極重視教育，一面從政與軍，一面施教；寓教育于軍事與政治之中，亦寓軍事與政治于教育之中。故吾人一面稱蔣公爲軍事家與

政治家，一面可稱他爲教育家。

他所辦的偉大的教育事業當然要數軍事學校。他于民國十三年奉先總理之命在廣東創辦黃埔軍官學校，當年招第一期生，不過六百四十五人，後來招第二期生不過四百四十九人，至第三期招一千餘人，第四五兩期各招二千餘人；第六期招四千餘人。照民國二十三年中央軍校同學錄的記載，畢業軍校之學生，以班次言，除第一二三等期而外，有軍官政治研究班，軍官政治訓練班，軍官研究班高等教育班，政治訓練研究班，軍官訓練班，軍官補習班，憲警班，輜重研究班，學兵團等（除各期外，其他班隊等名凡二十二）；以人數言（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前已畢業者）共達二六〇一二人，死者一〇六八人，傷者一五七五人。專就這個軍事學校而言，其人數之多，規模之大，已有可觀了。

除中央軍校而外，蔣公又兼長各軍事學校，如步，砲，工，輜，交通兵等專門學校以及中央政治學校等。他曾做過一個短時期的教育部長。

他對於教育的興趣很濃厚。他極愛護學生。他親書「親愛精誠」四字以爲校訓。學生見了他如見其父母然；學生尊敬崇拜他如尊敬崇拜神明然。他在其學生羣及其所領導的部隊或羣衆中已經成功了威嚴的偶像，不，領袖。

他在教育，尤其軍事教育上，已有大的成功。中國現代軍事教育因得他的提倡領導已有非常之進步。

但是，他不僅是一個事實上的教育家或教育的事業家；並且他又是一個教育的理論家。他在教育理論上有很多的創見。他由苦幹的經驗中透視許多的深刻的理論。

他曾提倡過「教養衛」的教育運動，那是現世極完整有用的教育運動。教者，以訓練普通智識爲基礎。養者，以生產爲基礎。衛者以軍事爲基礎。普通智識，生產技術與軍事三者完整發展之教育乃最優良之現代教育。昔者英儒斯賓塞爾倡生物四大活動之教育說。一，因生物有保存種嗣之活動，故有生理衛生及體育諸科之教育；二，因生物有維持生活之活動，故有普通智識與技術之教育如各種基本學科是



也；三，因生物有羣居或社交之活動，故有社會，歷史，政治，經濟以及公民之教育；四，因生活有休閒活動，故有文藝，詩歌，音樂，圖畫等藝術之教育。後來教育家以此四者，定為基本學校之基本課程標準，直至如今，各國基本學校基本課程均採用之，中國教育抄自外國當亦不能外此。但是時代進化，此四種課程標準漸漸不能適用了。其起而代之者，吾以為蔣公所提倡之「教養衛」三個標準適以當之。教育者是一般智識之輸求，無疑義地一般教育不能忽略此標準。養者是生產教育，這是唯物或經濟歷史觀盛行之現代不能忽略者，並且生產在人類生活之重要實亦母待贅言。衛者是軍事教育。如今弱肉強食，人類互爭雄長，捨軍事外無以自保其種族，故軍事教育又極重要。是則蔣公所指出之「教養衛」三字實可為新課程之標準。

蔣公倡精神教育；倡「智，信，仁，勇，嚴」之教育；倡四維；又倡八德。此諸觀念均于現代人慾橫流及物蔽教育之襲擊為效甚大。總之，以精神和道德的育來代替人慾和物蔽的教育，這是蔣公在近代教育史上之貢獻。

以理智代情感：燃燒起動機之火，要將意志鍛鍊；這也是蔣公對於教育之貢獻。但是他並不輕視情感，蓋愛學生如子弟，以校作家，是他的實際行爲；不過他要把情感受理智的陶鎔或指揮罷了。這是極端理性化了的的教育。這又是一個大貢獻。

他主張人格教育與至高無上的國家民族教育。教育尚陶冶，尚鍛鍊，學生若如鐵，要將其久鍊成鋼而成爲有用之才。教育不重個人的自由，重團體的自由。要將個人之自由犧牲以求團體之自由教育。尚嚴格，不主放浪；主自動，不主被動。自動的教育是真教育。軍事教育雖然自動的機會少，但授以目的與方法之後，其作用則在其自動消受與運用。

總之，蔣公能成功其驚天動地的愛國家，愛民族，愛人類，救國家，救民族，救人類的偉大事業，自有其相當的條件。他以聰穎之智慧，機敏的自覺，明確的判斷，廣博的胸襟，清白的理性，豐富的想像，濃厚的感情，純潔的動機，仁慈的心境，堅強的體魄，雄壯的精神，靈活的手腕，出現于多災多難的二十世紀初葉的中

國，其能解救中國的危亡，拯斯民于塗炭，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 蔣介石先生的哲學思想

## 一 緒論

哲學思想是一切思想的基礎，一切偉大人物的言行均有其深厚的根本思想或哲學思想。蔣介石先生以蓋世之才，身荷中華民國復興之重任，其舉止言論，在思想上有其深切的淵源背景，我們就這種淵源背景稱爲他的哲學思想。且也，蔣先生平時最注意思索，平時靜居無事，一面遊山玩水，一面發揮其哲學家的或思想家的天才，搜窮萬事萬物之真理，以爲解決國難問題之根據。他每於軍事政治外交問題難于解決之時，輒假山水之樂以舒其心意，便假思索，以爲解決難題之助。他平時

好讀古人書，讀至精深奧妙處，輒心神嚮往。大學中庸一書，他尤好誦讀，且復旁徵博引，發揮其精義，以期實際應用。他有哲學家的靜默的頭腦，寡言笑。他每于書齋解決困難事體時，輒繞房數十週，步履輕微。縈思腦際，以求切實的解決方法。當其慢步縈思之際，人不敢近，蓋其用思之深，未得結果，不可阻撓之也。總之，他有深刻的哲學思想，尤能運用哲學的方法以解決國難的問題，這是最值得我們欽佩與注意的。以下將他的哲學思想簡要地分敘出來。

## 二 主觀與客觀

蔣先生以聰穎的智慧，好用思想，而且遇事要求其根源。他曾經作了對聯送給先總理去看，先總理稱贊了一番之後，親自書寫了又交還給蔣先生。那付對聯是：

窮理于事物始生之處

平幾于心意初動之時

由這付對聯的語句，我們知道蔣先生平時用思想有兩條正常的路道：其一是從頭想起，遇事探究其原因，由原因以求結果，這是個歷史的方法。其二是注重動機，由動機以求結果，這比較接近于主觀論。運用歷史的方法能知道事物的原因，由原因以求結果，其結果比較可靠，比較接近于客觀。這是科學的方法。自來革命者很少注重科學的方法，尤少注意科學的因果的法則。蔣先生在這裡提示了革命者的注意，啟示後進要以科學的歷史方法或因果法則去探求事物之始末。這在革命思想法則上的貢獻是很重要的。動機論自來在倫理學，人生哲學或道德哲學上佔了很重要的地位，尤其中國數千年來倫理思想家多注重于動機之研討。因為動機發源於人類的主觀意識。人類的行為一面為客觀所限制，一面為主觀所指使。凡非精神病者之行為動作，其在道德上之批判，大半是由于主觀決定的，即一般人的行為是否合乎道德的標準大半由于主觀使然。所以人類的道德行為應多由主觀負責。這是注重動機論之理由。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東方人在倫理上極注重主觀的作為。蔣先生重

視西方的道德哲學，重視人類的主觀的道德責任，故說「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指示其注重人類主觀動作之義意。他惟恐人類尤其革命黨員，一念之差，致誤國家軍事，至不可挽救，故諄諄於此，作此聯以自勵而勵人。專由這付對聯，我們知道蔣先生已熔東西思想方法於一爐了；而且取人之長（如採取歷史爲主觀方法），亦不忽略自己之長（如倫理的勸機論）。並且這付對聯包含兩種方法：一種客觀的方法是對治事而言的，一種主觀的方法是對治人或自治而言的；以主觀治人或治己並以客觀治事的方法乃是最好的方法。蔣先生深習這種哲學思想，故其治人治事均能獲得最大的成功。

並且蔣先生注重主觀和客觀的兩種方法不僅於上述的對聯中可以看出，且於「致良知」數字的解釋中尤能窺其精義。他平時極注重「致良知」，他於「致良知」曾數數爲門生言，作者聽到也不止一回，而且越聽越明白，越覺有興趣。有力量

。也說：

「現在就拿「愛國」來說：我們知道一個人都應該愛他的國家，應該爲他的國家來犧牲。愛國家，爲國家犧牲，都是個人良心上認爲應該作的事情，這就是「良知」。但是有些人知道國家應該愛，而却不能實在去愛，知道應該爲國家犧牲，而却不肯去犧牲，這就是不「致良知」。……所以我們今天要抵抗敵人，復興中國，完成革命，並沒有什麼困難，只是在我們的一念。只要人人自問這一件事是否以國家爲前提。如果與國有利，我們便應該犧牲去救國家。我們只要個個人照着自己良心所認爲應該做的事去做，則一切不好的動念，如個人的私見，私仇，都可以消除淨盡，這就是「致良知」。中國能够個個人「致良知」，就可以拯救中國。」（見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的階段）

他又說，

「古人說：「如惡惡臭，如好好色」，這個「惡臭」與「好色」的良知是人人所有的，不過要「在去「惡」和去「好」，這就是叫「致良知」。」（全上）



良知是屬於主觀方面的，這是人類的主觀意識。一般人所說的「天良」或「良知」「良能」均是主觀意識。這種主觀意識在人類意識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人類意識本來不能忽略主觀的要素，也許可以說，忽略了主觀的要素便不能形成一般的意識。並且「良知」是一種帶有先天性的自然而然的「主觀要素」；這種要素是造成人格，發揮才能，啓發智識，和發展事業的基礎。無疑地，人類的一切活動，在科學尚未能完全把握或控制以前，其主觀上的主宰能力是很偉大的。尤其在變亂的時代，人慾橫流，物貨蔽錮人類的心靈，其倡主觀的「良知」以爲挽救，尤屬得體。這是蔣先生極力提倡「良知」的原因。

「良知」是主觀的要素，但是推動這種主觀的要素却需要客觀的條件。「致良知」之「致」便是客觀的條件。蔣先生講「致良知」時極注重那個「致」字。他說：

「如果我們僅是講「良知」而不講「致」，那就像宋儒一樣不免落於空虛。陽明所以要在「良知」上加一個「致」字，就是要從各個人良知到事物去切實體

驗。所以「致」就是「行」，（見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

他又說：

「凡是平天下，治國，齊家，修身，正心，誠意，都是「知」，都是「致知」。  
 「知」要怎樣「致」呢？「致」就是研究，就是實行，就是要實現他的所知。  
 這就是致知。（見革命哲學的重要）

所以「致」就是行，就是客觀的動作或條件，有此客觀的動作或條件才能將主觀的要素推動。主觀與客觀二者共同動作才能發揮其最高的效率。

蔣先生一方面重視主觀的要素，一方面不忽略客觀的條件，這是他的哲學思想的大成功。無論處事對人對己均本此完善的適合的哲學態度或方法，故其成功最大。

### 三 生活與生命

但是主觀與客觀是對待的名詞，前者有類唯心的意思，後者有類唯物的意思。兩者也不能調和發展的，除非是調和論者的主張。蔣先生並不是調和論者。不。他主張這兩者有先後的程序，尤有其基本的動力。那基本的動力是什麼？是生活的要素，是生命力。惟有生活的要素或生命力充實或發揚光大，才能使生命有意義，事業進步，心與物循着自然的程序而發展，主觀有所倚，客觀有所憑藉。他不注重於心物或主觀與客觀之分歧的發展，而注重於二者的基本的生命力的發展了。這樣，他就撇開歷來哲學家糾纏不清的心物論爭或主客論爭，而專注於人生及其事業活動的基礎的生命力了。這樣，他就撇開歷來聚訟不清的心物形式哲學，而注重於有力和有用的人生哲學了。講到人生哲學或人生事業活動的基本哲學，他有兩句最重要的聯語，那就是：

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

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

關於人生哲學，歷來就有許多哲學家聚訟不清，派系繁多，主張不一。但蔣先生即提着「生活」與「生命」二辭以爲研究的基礎。生活是什麼？簡單地說，是人類文化之整體，是人類政治經濟和意識之總集。人類爲什麼經營這種生活呢？其目的是什麼？人類生活在渺茫的宇宙中，非傾其全力以營謀，無以爲生；故人類自有史以來，便尙羣居，人類要羣居才能發生偉大的力量，以控制自然，主宰自然。人類定要各個貢獻其才智方能求得生存。人類生活定要向大公無私，羣居集團的道路走，方有意義。並且生活是向前發展的，不是持中的，更不是退後的。我們要爲人羣服務，爲人羣造幸福。蔣先生曾說：

「因爲我們一個人是受天地父母國家社會，換言之，即受天地人之扶助教養而長大成人，必有以報天下人之德；反轉來講，我們惟有公而忘私，犧牲一己來爲人羣謀幸福，然後我們最渺小最短促的生命，才能發揮光大，永久不死……不僅我們要生活，而且要增進天下人的生活；不僅我們要好而且更要使天下

人都好。……」

生命較生活更具有活動的內涵。生命本身就是種活動體。牠的意義就是創造。創造什麼？創造大我的宇宙的生命，創造大我的宇宙的繼起的生命是有繼續力的；如其生命沒有繼續力，則生命便死滅了。死滅了的生命不能稱爲生命。生命是要向大我方面發展的；如其生命不向大我方面發展，則生命將被桎梏以至於死滅。故生命之意義是向大我方面繼續不斷地發展，新陳代謝，越向前進，越繁榮滋長，越有意義。

由於生活目的的解釋，我們知道蔣先生是注重人類全體生活而忽略自我生活；世界大同是生活的理想的。由於生命意義的解釋，我們知道蔣先生是主張動的生活並主張動的生命之發展的。前者是社會主義的大向思想；後者是生機主義的動力思想。合二者於一流，人生意義，能偉大，人生本質才能發揚光大。這是人生的真正意義。這是蔣先生的人生哲學的精髓。

並且動的生命又是增進人類全體生活的工具或方法。要人生繼續不斷地向前勇進，發揮生命的意義，發揮人類的努力，創造宇宙，主宰宇宙，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所以蔣先生關於生活與生命解釋的對聯是有聯繫性的。我們研究蔣先生的人生哲學，不要忽略這個聯繫性。這個聯繫性能將蔣先生的人生哲學發揚光大。

#### 四 「殺身成仁」

人類生活的目的既在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即在增進人類全體的幸福。但這個幸福不是偶然可以獲得的，必須經過相當的努力才可以獲得。所以人類為增進其全體生活的利益或幸福起見，必須盡其最大的努力，以求有所貢獻於社會，民族，國家。這個努力的基本工夫是犧牲，犧牲是最基本的努力，最基本的盡其愛國家愛民族的最大任務。人的生命是不容一刻停止其活動的，並且生命的本性也是如此。人一旦自願犧牲其生命的時候，當是最大努力的時候，或者可說是努力到再不能努力

的時候，或者是努力的功能已經發展完畢再不能發生效力，而客觀事實的要求又需要他再發生效力，可是一點也不能發生效力，無已，祇好犧牲其生命了事。這當然是個最大的努力。這個努力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可是蔣先生極主張軍人有這種努力。他曾說：

「我們之所以要來做軍人，其目的是要犧牲個人來救國家救人民，由此可見我們軍人的人格。是爲國捐軀，殺身成仁！」（見軍人唯一的宗旨——仁民愛物）

他又說：

「大家要曉得，天地父母，既生了我們，我們即算不能成功一番轟轟烈烈的革命事業，也必需戰死沙場，絕對不好使病死在床上——病死在床上的人，是最沒有出息的人，天地父母也就冤枉生他了！馬伏波說得好：「男兒當立功異域，以馬革裹屍還葬，安能病臥床上，死于兒女子手中耶？」」（見成功與成仁）

這等話何等痛快！

「殺身成仁」；「不成功，便成仁」；「子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惟能犧牲爲大勇，爲大智，爲大仁」；「仁者無敵於天下」。人生的目的是要成大功，立大業，功業無成，便殺身以相報。此等壯烈之舉，值得我們提倡尤其值得在這醉生夢死的國度裏提倡。但是環顧宇內，其果能盡最大的任務，盡最大最高的努力而能殺身以成仁者，能有幾人，能有幾人！

## 五 民族國家

蔣先生要人生用盡其努力，無非是救國家，救民族，救人類。他視國家爲最大最高之物，我們應當尊敬他，愛他，保護他。人民是爲國家民族而生存的，沒有國家，焉有人民？他曾說：

「我們中華民族有五千年最悠久最光榮的歷史，我們中國有西起崑崙山東至太平洋最廣大最肥美的土地，我們中國占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我們中國人



有中國人優異的文化，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在世界上佔有特別高尚的人類道德，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至大至剛的精神和獨立自強的人格！我們如果失掉這些精神道德，便不成其爲中國人了！」（見救國的基點）

他又說：

「我們曉得宇宙是無窮大，但是在一層一層的分際當中，國家和民族便是我們最實際最重要的「大我」，我們個人這一個「小我」，必須仰賴國家民族的扶持教養，然後才有生存發展之可能，亦惟有求整個民族的生命能够進步和發展，然後個人纔能得到真正的進步和發展。所以我們惟有將我們個人的生命貢獻於國家民族，然後我們的生命才能發揚光大，悠久無疆！」（見爲學之目的與教育之意義）。

國旗是國家的表徵，他於講談國旗的意義的時候曾說：

「國旗不僅是代表我們國家的神聖標幟，而且是我們整個民族，自上祖先皇

下至我們以及將來千秋萬世子孫孫的精神和生命所集中歸托之處。……我們一看到國旗就等於看到我們的國家和祖先以及自總理以下一般爲革命犧牲的先烈，就要肅然起敬，奮然興起，要在我們手裏繼續保持並發揚光大我們祖先五千年來偉大的民族生命和文化，救起我們的國家，復興我們的民族」。

他視國家民族爲「大我」的有機體。他以爲國家也如人們一樣是有生命的活動力，「這個力的消長就是民族的盛衰與國家興亡之所繫」。他在中國魂內說：

「國家是一個有生命的超於一切的集體組織。他全部的機構「就是一個完密的生命全體。每個國民就是構成這個生命全體的一個細胞，而全民族的歷史文化就是他生活的史實和精神的產果。而此種歷史文化之傳說的根本精神，就是國家的靈魂。國家因爲有此靈魂，所以成其爲有生命的機體，而非死的無機物」。

這是他的國家學說，也是他的政治哲學。他數十年來，困苦艱難，險阻備嘗，

均爲國家民族而努力，爲「大我」的吾人生命財產所寄托的活動的有機體——尊嚴的國家而努力。他用其最高度的心思能力，祇想將中國弄成一個現代的國家。他懷得有這種偉大的政治思想，不，政治哲學。他爲實現他的這種哲學而努力，不，這種哲學已經在啓示他而努力，英勇地努力！

## 六 教育與訓練

蔣先生爲實現其現代國家的建設，他重視教育與訓練。他視教育爲建設國家的良好工具，而訓練尤可以補教育之不足或促教育之從速實現。他辦了若干的教育機關或訓練團，北伐是因黃埔軍官學校之設而克奏膚功的。他是這個學校的校長。他從黃埔軍官第一期，直至現在的中央軍校，他造就了二萬餘武裝青年，遍佈中央各部隊，以其鮮血換得了現在的國內統一的局面。

他提倡「智，信，仁，勇，嚴」的教育。智者「機智」也；信者「信義」也；

仁者「仁愛」也；勇者「勇敢」也；嚴者「嚴重」也。五者具備，才是個完全的武人，也是完全的受教育者。

他於上述五教之中尤著重「嚴」之一字 他說：

「所謂「嚴」，乃指我們先要嚴以律己，隨時隨地能以身作則來教導約束所有的部屬。如此嚴以律己，嚴以馭下，嚴以處世，絲毫不隨便苟且，部下便自然能够做到整齊嚴肅，而且更可由薰染感化而完成其武德與四維的修養。」

教育是須文武合一的。他反對重文輕武或偏文偏武的教育。太陽，空氣，水是宇宙的無盡寶藏，人民應利用來鍛鍊身體，這是最基礎的體格教育，也是一般教育最高注意之一點。「禮，樂，射，御，書，數」六藝，是古代教育科目的綱領，也為現代教育設施的要目，教育不以傳授呆板的知識為目的。教育應善用才幹，發展天才，使其努力於國家的大事業，救國，愛國，救民族，愛民族，這是教育的最高目的。

訓練可以使教育從速實現。他能發生偉大的意識力量。剿匪軍官之努力得力於廬山峨嵋訓練者多。中央現仍辦了許多訓練班。以黨火速造成有力的軍事政治之基本幹部。

## 七 大學之道

蔣先生以教育之道教人，又以大學之道訓人。他說：

「大學之道怎樣呢？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德就是一個人人生下來賦有的德性，明明德就是不要使這生下的德性汨沒，而自己要知道去淬礪牠，光大牠，……。至於在親民，可以說就是要喚起民衆，復興民族，使民衆的生活能夠向上，民族地位能夠平等。在止於至善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切行爲都要到最好的極點爲止，就是要達到善的極點，纔是止於至善。……但因爲人類進化，生來就有一種向上的衝動，利他的衝動。這一點向上利他的衝動，存之於心便是「德

」，施之於物便是「善」，故「德」貴自覺，而「善」貴及人。自覺就是「明德」。及人，就是「至善」。』（見革命哲學的重要

他這樣解釋大學之道真是最切實用了。

他解釋「知止而後有定」一段話說：

「我們知道三民主義是各種主義中最好的，我們便信仰牠，就是「知止」，就是「止於至善」。既信仰了，我們有了確信，無論什麼學說主義都不能搖動，這就是「定」，所以說「知止而後有定」。信仰既定，從此心安理得，所以說「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必須心安之後，然後能夠考慮，想出種種的辦法，所以說「安而後能慮」。把事情考慮妥當，設計周詳，自然能夠實行得到，自然能夠成功革命，所以說「慮而後能得」。』（同上）

他這樣切切實實解釋大學，爲吾人講演大學已數數見。他深得大學之道。他深深地體驗了中國的政治哲學。他是中國政治哲學的實行者。

## 八 積極精確

雖然蔣先生深明大學之道。但他却不是個普通所說的中庸主義者。吾人一提到中庸二字；便以為是馬虎了事的意思。但蔣先生對於一切事件之處理，一點也不苟且，遇事謹慎為之。確實精細是他的處事條件。他極注重「效」的觀念，蓋以為那是治事的科學條件。他于講演 總理遺教政治建設之要義時曾說：

「……第六須決定「數」，即依據事業之規模與組織之範圍，將「人」「事」「時」「地」「物」五者分別統計，以期準備齊全，配置適當，而使預定之事業，順利進行，理想之國，儘早達到。……所以「數」可說是一切組織與一切事業成功之母」。

由此可知他對於處事，接物之精確適當了。

也有果敢的決斷；他對事對人絕不含糊草率。他從不誤事機。

他每好趨于事物的兩極端，不願意逗留在中間的階段。不戰則已，一戰拚命，拚命必勝。

## 九 「利用天然」

蔣先生極提倡利用天然之義。人類起初是適用天然，其次是利用天然，再其次是控制天然。科學越發達，其適應利用與控制天然的程度越增加，人類要利用天然，向天然方面發展，方能發揮人類的偉大性。人類如向天然方面發展，則其志意可發揚光大，其精神身體可不受桎梏，吾人每于登高山，涉大水之時，總覺心曠神怡，萬物皆為我所有，富貴于我如浮雲。人類能向天然發展，則人類自相殘殺之慘劇可稍免，因為人類的精神有限，向彼發展則在此可以少息。所以人類利用天然，可免除自相殘殺之心，並且利用天然是向外發展，向外發展，其所獲益較向內發展為多，人類向內發展是桎梏自己；向外發展是開拓自己。現世科學文明是人類向外



發展利用天然之結果。人類如其想將自己的領域擴大而不自加桎梏，當求積極利用天然。蔣先生曾說：

「所謂『利用天然』者，一方面既有消極的適應天然而增進人類的意義，一方面又有積極的克服天然而矯健自立的意思。一方面既有利用人類本身天然的性能而達成教育之目的意思，一方面又有利用宇宙萬物天然的性能而增進人生福利的意思。」

「天然無窮盡的東西，我們倘能領悟天然，利用天然，便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更可以隨時隨地得心應手。反之，如果不能領悟，不能利用，更不能克服天然的話，那末也隨時隨地要為天然所限制屈服，乃至於為天然所消滅，（即達爾文所謂「自然淘汰」），再不能希望成功什麼事業」。

「太陽，空氣，水」是天然中最易為人類所利用，可以取之不窮，用之不竭的，蔣先生時常提及牠們，勉勵部下多多利用。這幾種東西，是天然中之寶具，人類

應當積極利用牠們，以發揮其本性，本能和努力。

照蔣先生的意思，人類利用天然的功效大概有五點：其一如涵養愉暢的性情；其二是培植高尙的心志；其三是鍛鍊強健的體魄；其四是養成堅忍的精神；其五是發揮創造的智能。有此五種功效，人類本能才可以發揮光大，才可以自立自存于宇宙之間而不至爲天然所淘汰。這是宇宙或自然哲學之精義，蔣先生是深悉其含蘊且能深刻體驗，運用自如的。

總之，蔣先生是個偉大的政治家，也是個偉大的思想家，並且其隆重的政治事業是淵源于豐富的哲學思想。他的哲學思想不尙虛無，尙實踐，于理想中顯示事實的途徑，凡宇宙，人生，政治，道德，教育等哲學思想，蔣先生都具備得很豐富。因其具備得有這種豐富的思想，故其宇宙觀闊大，人生踏實有意義，道德高尙，政治事業昌隆，教育能發揮其宏大的效力。因其如此，故他能領導中國國民黨，中華民族，一手奠定國家的安寧，拯民族于水火，誠偉業也！

## 蔣介石先生的人生哲學述要

處在一個革命的時代，人的力量大過一切，因為革命是人所造成的（雖然一面牠是環境的要求），革命時代的人的力量如其善用之能使革命循序前進，否則中落；而使此革命能循序前進的人的力量必然此人的力量的造成或領導者，具有非常之才幹，動而足爲天下法，舉而足爲天下式，驚天動地，席卷乾坤，世風不變，措天下于太平之安，此亂世之英雄，亦治世之英明領袖。蔣公介石，生當變亂困危之際，繼承先總理未竟之志，擔負中國革命之重任，數十年辛苦艱難，險阻備嘗，足能使中國革命有非凡之進展，近代國家之建設略具規模，此乃由于我蔣公有非凡之才爲非凡之用。人定勝天，此種人的力量實爲這個變革時代之所切需。而此人的力

量的基本觀念，基本修養或基本作爲則爲人生哲學。作者于此願意一探討蔣介石公之人生哲學，一以啓示此一時代革命的領導者之人生觀念，修養或作爲之如何能領導這時代之革命而使其前進；一以啓示此革命之時代需要如何之人生觀念，修養或作爲，全國革命者，能同效此領袖之人生觀而使此革命進展更速，爲效更大。

## 一 人生的意義

蔣先生曾有兩句得意的名言，卽：

生活之目的在增進全體人類之生活。

生命之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

第一句話是解釋人生生活應重視大我而忽視小我。小我本包含在大我之中，要大我發展，小我才有發展的機會，並且發展了大我便是發展了小我。有許多忽視大我生活的人，斤斤以發展小我爲歸趨，其結果是因爲大我既未得發展，小我便無由

發展，致生活得無意義。重視大我生活的人，因為大我發展，小我便在其中或隨着發展，結果生活得有意義。全體人類的生活是大我的生活，人自有生以來便不能離羣索居；許行自耕而食自織而衣的主義在數千年前便遭孟子非難。個人生活的目的與意義定要在全體人類生活中去求得。全體人類生活發展了，個人生活才得發展。

第二句話是解釋生命是繼續不斷向宇宙「大我」發展的。生命的意義若限于小我，則生命便可以死滅，可以死滅的生命不能稱之為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命是創造的。創造什麼？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蔣先生曾說：

「我們每一個人自從天地父母生我們下來，撫育我，鞠育我，長大以後進到學校裏或部隊裏由先生或上官教育我培植我，使我成一個人，有相當的智識和能力。但是我們這個人這個軀體，普通最多只能活到八十歲，這八十年的壽命若計算起來，並沒有多少時間，一年不過三百六十五天，八十年合計也不過二萬九千二百日。這個短短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若拿我們自己這八十年的

壽命，來和我們民族五千年有記載的歷史來比，那不是僅僅佔到極短極短的一段嗎！而我們自己一個人，在整個偉大的民族生命中，豈不更渺小如滄海之一粟嗎？同時，我們這個生命乃是整個民族幾千年所遺留下來的，乃是整個民族生命的一份子，乃是要開拓整個民族未來無窮生命的！所以我們講生命，決不能就自己這個極小的軀殼之存亡來講！決不能就自己這個極短的壽命之終始講！我們要講生命，一定要講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命！要講我們民族整個歷史的生命！總之，我們不好把自己個人的生存看作是生命，我們要把整個民族之歷史的生命當作自己的生命！所以我們對於整個民族，整個歷史，要負起承前啓後繼往開來的大責任！這就是講，我們要繼續保持整個民族的生命與歷史的光榮，更要努力將這個生命與光榮發揚光大而開拓於無窮！」他又說：

「我們曉得，宇宙是無窮大，但是在一層一層的分際當中，國家和民族便是我們最實際最重要的「大我，」我們個人的一個小我，必須仰賴國家民族的

扶持教養，然後才有生存發展之可能；亦惟有求整個民族的生命能夠進步和發展，然後個人纔能得到真正的進步和發展。所以惟有將我們個人的生命貢獻於國家民族，然後我們的生命纔能發揚光大，悠久無疆。」

由此可知生活與生命是忽視「小我」，重視「大我」，以民族國家為前提地發展的。蔣先生明白了這個意義，故能發揚光大，而使民族生活燦爛，民族生命輝煌！

## 二 生與死

「大我」的民族生命發展是生命發展之目的，「小我」的個人生命發展是生命發展之方法。方法是目的的手段或工具。為着目的的發展是可以變更或甚致犧牲任何一個手段或工具的。個人生活在民族之中，如民族有所要求，或民族生存遇隔障到要求民族中之個人須要其生命之時，則此民族中之個人為完成其「小我」之目的

起見，便不得不慷慨捐軀，從容就義，以救此民族生命之繼續發展，這就是以死求生的意思。民族生命的發展須要民族中的各個人充分貢獻其所有的能力，並且生存在民族中的各個人也須要充分貢獻其所有的能力以求民族生命之繼續發展。但是個人的能力有限，倘若到一個時候，民族需要某個人貢獻某種力量，可是某個人盡力到再不能盡力，而民族仍須要他繼續盡力，且須再發生偉大的力量的時候，無已，祇有以生命貢獻之一法，這就是犧牲。犧牲是最大的和最後的努力。犧牲就是死，以死求生，以「小我」的個人之死求「大我」的民族之生；這種死是值得的，是有意義的。但是環顧宇內，寧願犧牲其生命以報國報民族者究竟能有幾人？蔣先生曾說：

我們一個人的生命，窮本溯流是整個民族生命延續中之一分，同時又是整個民族生命繼續開展的一點，因此可以說我們的生命向上推溯，就是敬仰祖宗的生命；往下推演，就是未來無窮子孫的生命。所以我們的生命乃是整個民



族生命長流中之一點，只要這個偉大的民族生命長流不滅，我們的生命便是永  
久不死。因此我們決不能說我們的軀殼存在，便有生命，軀殼一旦死亡，便沒  
有生命了。……我們講生命不好以個人軀殼的存在看作生命，一定要把整個民  
族歷史的生命當作自我的生命，以整個民族歷史的生命的存亡爲存亡，以整個  
民族歷史的生命之始終爲始終。」

他又說：

「現在我們總理已經死了！黨代表（指廖先生）又死了！自黨代表死後，  
簡直像我自己死了一樣。……照這樣看來，本校長那一天死是不知道的；不  
過在我個人方面，死了比生還更好，因爲我們死了，像總理和黨代表一樣的  
，責任就可完成了。」

「本來一個人入革命黨是做什麼？就是要來爲革命而死。我們那一天入黨  
，就是那一天沒有我們的身體了，就是那一天死了一樣的，因爲我們黨員的身

體是不能自由，完全交把黨裏，決心犧牲的。……本校就是要你們爲革命而死的，本校也是要你們爲主義而死的。……要是真正的革命黨，真正爲黨國作事的人，十之八九沒有不先成仁而死去的。譬如文天祥，陸秀夫，岳飛，史可法之類，是拿丹心碧血爲種族革命的，然而他們不得成功，可是成了仁：『是』是最大的成功，『殺身成仁』，『視死如歸』是大勇者，是最大貢獻，最肯努力的人！

### 三 自我人格修養

爲達到生活的目的與發揮生命的意義當然須盡其最大的努力，卽至不得已而犧牲。但犧牲是個最後的手段，是個不得已而爲之的手段。倘事態卽客觀事實要求（「大我」的民族要求），然至此非萬不得已時，則不必出此最後的手段而決然犧牲。在達到犧牲的結果之前尙有許多現象須要努力，換句話說，在犧牲前之勢力過程

甚長，革命者可盡其應盡的任務或力量。蔣先生以如下述諸過程是革命者應努力的：

(一)「向最危險的道路前進」這是蔣先生于廬山訓練時宣示出來的一句有力的名言。越危險，越要向前進；越向前進越能勝過危險，打破難關。危險道路是達到康莊大道的必經的過程，康莊大道是危險道路的前程，革命者要履險如夷，且要找最危險的道路向前邁進。

(二)「自強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惟健者方能自強；能強者方能向前邁進。一時間為一切事業生命之母，故時時要發奮努力，自強不息。「愛惜光陰，注重時間，努力不懈，自強不息。」「堅持最後五分鐘。」這些話是蔣先生慎重為其幹部再三聲言的。

(三)「慷慨悲歌」民國十三年黃埔軍校有兩個學生關在禁閉室內哭了起來，蔣先生對此曾有一段話說：「凡到一個人流淚痛哭的時候，除非是國破家亡，父母喪

最不幸的時候，萬不得已而哭之，否則就是最卑鄙最不名譽的事了。我們革命黨做大丈夫的人，應該光明磊落，知過必改。……所以革命黨的性質是慷慨悲歌，切勿可效婦人小子哭泣的卑鄙行爲。革命黨如果自己錯了，就要認錯，犯罪就要受罰，如果犯了大罪，照紀律論起來，若應該槍斃的時候，就要請願槍斃，只要本黨能立綱紀，正風氣，就是槍斃我個人，亦所不辭，革命黨到這種樣子，就不愧爲真正革命黨了。」

(四)「誠意」 「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不誠無物。」「惟誠可以破天下之僞，惟實可以破天下之虛。」蔣先生說：「……如此自欺欺人，便可證明沒有一點爲國家，爲主義的誠意，這種軍人既無誠心，必無實力，更不肯犧牲，結果一定是要打敗仗的，若要軍隊能打勝仗，社會能够進步，革命能够成功，國家能够復興，最要緊的就是與僞字相對的一個誠心誠意的誠字，如果我們大家都凡事講求實在，

相見以誠，則精神必然團結，實力必可增加。」

(五)「決心」 決心如誠意一樣，是成功事業的重要的心理條件。蔣先生說：「我常常講凡事要有決心，革命要有決心，作戰要有決心，下命令定計劃，以及一切的企圖，一切的作爲，都要有一個決心。因此當時廣東許多人常常譏笑我，說我「決心來了，」但是直到如今，我依然注意決心。無論辦什麼事情，都有一個決心，……有決心，才有決斷，有決斷才能實行，能實行然後才能打破危難底于成功。如果沒有決心，勢必優柔寡斷，什麼事情都不能成功；所以決心是一切事業成功之母。」

(六) 蔣先生曾提出三個信字以爲從事革命之心理要素：一是自信，即要自己相信自己有負擔革命事業之決心，自己負責，努力去幹；二是信任，即對部下要真正信任，「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信任部下，自能做出許多事業；三要信仰，即對長官，對主義絕對信仰，不可懷疑，由信仰可發生力量，有了力量才能成功事

業。故自信，信任，信仰三信字實爲革命事業之又一重要心理要素（但自信和信任又可歸于信仰之中。）

（七）「氣節」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軍可奪帥也，不可奪志也，」「楚雖三戶，足以亡秦，」「中華民族至大至剛，至中至正，向來不畏強禦，反抗強暴的民族。」「現在一般國民因爲不知道我們祖先是如此的光榮，偉大，因而喪失了自信心，以致志氣消沉，自暴自棄，這是最危險的一件事。」「氣節實爲革命者最重要的一個心理條件。

上述諸條件爲自我修養之重要過程，藉此等修養，革命者可達到其努力之目的；換句話說，革命者須有此等修養方可完成其任務，故革命者須重視此等條件。

#### 四 社會人格修養

與自我的人格修養相左右，革命者須重視人與人的關係即人與人的諸條件之修

養。因為革命者的人的關係是人與人的關係，不僅是自我的關係；由人與人的關係造成社會的關係，那是革命者除自我人格修養以外的重視的社會人格的修養。蔣先生除重視革命者的自我人格修養之外，復重視社會的人格修養。關於革命者的社會人格的修養，蔣先生曾提出下述諸重要項目：

(一)「親愛」 蔣先生曾書「親愛精誠」四字為軍校的校訓，他曾對黃埔軍校學生說：「我所盼望於諸位同志重要的點，就是大家相親相愛，和衷共濟，如同手足一個樣子。為甚麼要相親相愛呢？第一，因為團體生活的必要條件，就是感情融洽。各團員有了融洽的感情，作事的時候才能充量發揮互助的精神。大家同志同德，甚麼事都可以辦得好。第二，……本校人員，彼此間相互助的關係是兩種的：一為同黨關係，即黨員與黨員的關係，精神上的關係，主義上的關係。一為同校關係，校員與校員關係，職務上的關係，主義上的關係。大家彼此既有此種重重疊疊的密切關係，應當有相親相愛的感情才好。」

(二)「團結」 人與人的關係是團體的關係；團體的維繫是團結。祇有團結能發生大的力量。人類自原始社會以來便過團體的生活，換句話說，要團結方能過生活。蔣先生說：「所以我們要能建設國家，復興民族，必須澈底剷除中國人過去辦事一切割裂，分歧，各自為政，所謂各人自掃門前雪的弊病，什麼事都要大家通力合作。……各部份都能够互相連絡彼此貫通，精神上完全打成一片，向着共同目標前進。如此團結一致分工合作，辦事的效能才可增進；政治的力量才可以發揮；然後才可以建設新的國家，來復興我們的民族。」他又說：「所謂團結一致，不是嘴說就可了事的，總要你們各從根本觀念上，就是要從道德上，思想上，來澈底了解這個團結與一致，是為人生所需要的。……就是大家只有一個目的。既然只有一個目的，就該大家同心一致，要來做到這個目的。」

(三)「服務」 革命者的行動是利他的，不是自利的。利他便要為人類服務，為人類效勞，盡力多過于享受。先 總理曾說：「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不以奪取為



目的。蔣先生說：「人人能養成勞動的習慣，發揮服務的精神，各盡所能各竭其力，爲社會來開發富源，發達生產，以增進公共的幸福，而絕不自私自利，貪圖個人的安樂。人人只有公的觀念，沒有私的心理，惟恐不能人盡其才，地盡其利，以造福社會國家。」他繼新生活運動提倡之後曾倡勞動服務之說以警惕國人，要以服務爲人生的目標。他盡瘁國事，不求個人的享受和收穫，純以服務人類爲旨趣。

(四)「仁民愛物」 利他是「仁愛」的表現。「仁者人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蔣先生說：「仁」就是不要專顧自己而要犧牲自己來爲他人造福，這就是「仁」字最簡單之解釋。所謂「仁民愛物」就是對於人民，要愛他們，對我一切的物品，除非是有害的東西，如毒蛇病菌之類，必要撲滅之外，其他一切要加意愛護。因爲我們能愛人民，所以能推「仁民」之心而「愛物」，因爲能愛物，當然更能愛民。」他又說：「仁愛即仁民愛物，亦即「愛國家，愛百姓」的道理。」總之，仁愛是推己及人，小觀自我，重視大我的意思。革命者的新社會人格是要將小我化

成大我的成份，將大我極度發展。且仁者不僅能收自己的自我的人格，為社會人格的成份，且能化他人的自我人格，亦化為社會人格的成份，這便是「仁者無敵」的意思。蔣先生曾將此語深深誥誡其部屬。

## 五 人生與自然

如上所述，蔣先生所講的人生是要經過自我訓練和社會訓練的，這是人生的人為訓練。然而人為訓練不及自然訓練來得偉大的効力，並且後者是前者的基礎，所以人生的人格訓練，無論自我訓練，社會訓練，均應以自然訓練為基礎，他嘗講到利用天然的重要。他說：

「所謂利用天然者，一方面既有消極的適應天然，而增益人生的意思，一方面又有利用宇宙萬物天然的性能而增進人生之福利的意思。……若就個人之適性情情，涵養心志而言，……要能够使全軍的精神能得到慰藉和興奮，常常

能够朝氣勃勃，最有效的一個方法，就是領悟天然和利用天然。如日光的幽美，雲霞的燦爛，深林的幽香，松間的風濤，流泉的清響，以及鳥語花笑，草色虫聲，無一不有天然的興趣，亦無一不可細心領悟，用以增益身心。此外再就鍛鍊身體和精神以及努力一切事業而言，利用天然和克服天然也非常重要。去年我在此地訓練一般剿匪軍官的時候，曾有一個口號——「日光，空氣，水，」意思就是講我們一個人的生活，應當與烈日，嚴寒，酷暑，狂風，暴雨，大雪，深水等一切自然界奮鬥，來鍛鍊強健的體魄，和堅忍的精神，然後才可以成功我們革命的事業。……愈是在嚴寒酷暑暴雨狂風的時候，愈要抖擻精神，愈要努力工作，愈要能利用非常的時機來衝鋒陷陣！大家要曉得，人之所以為萬物之靈，就是因為有改製環境克服天然的奮鬥精神和創造能力，只要我們能發揮這種高尚的精神和偉大的能力，什麼天然的險阻艱難都可以克服！……天然的艱險可以克服，人類社會一切的危險困難，當然更可以用人力來打破！語

云：「人定勝天，」總理說：「雙手萬能，」只要肯研究，能實幹到底，什麼危險困難都可以克服，任何偉大的事業，都可以成功這就是領悟天然利用天然和克服天然的要義！天然是無窮盡的東西，我們倘能領悟天然，利用天然，便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更可以隨時隨地得心應手。反之，如果我們不能領悟不能利用，更不能克服天然的話，那末，也隨時隨地要為天然所限制屈伏，乃至於為天然所消滅，再不能希望成功什麼事業。」

惟天然為最偉大，最能啓發人類的心智，涵養愉暢的性情，培植高尚的德意，鍛鍊強健的體魄，養成克苦耐勞的習慣與堅忍的精神，發揮創造的智能。凡人肯履高山，臨大川，便覺富貴於我如浮雲。昔太史公縱覽名山大川，故其胸襟闊達，意志堅強，氣魄偉大；因其如此，故其文章氣勢磅礴，縱橫浩蕩，蔣先生每到萬事臨頭危難叢集莫可解救的時候，輒遊山玩水，一面以解其心志，一面求得問題解決的方法。因為自然最能助人思索，最能使思想的路線擴大而且求得結局。

有許多哲學家主張人類應向自然發展，開闢自然，利用自然，征服自然。因為自然可受人類的控制與征服，人類自然不願意受人類控制與征服。因為人類自己不願意受人類的控制與征服，故歷史往往造成人類互相殘殺的慘局，甚至馬克思也說：「人類的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我們不相信人類文化要鬥爭方能進步；我們相信，人類文化要向自然開闢，方能進步。所以人類若將運用於人與人的鬥爭的精神移用於自然，則人類文化必然日進一日。我們不求人類文化的進步和幸福則已，如其要求人類文化的進步和人類的幸福，則我們急應捨棄人與人鬥爭的慘事而崇尚於人與物的鬥爭，即人類向自然之開闢與發展。人類文明呵，人類幸福呵，且向自然界去求罷！

蔣先生的人生哲學浩蕩無垠，他的一切行動思想無一不有深厚的人生的哲學意味，他能深深地了解中國倫理觀念的精華，又能透闢西洋倫理思想的大全，不僅意識上了解，而且行爲上實踐：我們最少可以說，他在人生哲學之開闢和實踐上是個

極完全的人物。他以人格的偉力控制在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不，他以人格的偉力了解體貼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的痛苦與要求，他爲他們犧牲奮鬥甚至殺身而不惜。他以生命換得中國革命的復興，中華民族的復興！他真是得天獨厚，獨得天地鍾靈之氣，故能發揮其偉大的人格威力以挽救垂危的國家和待救的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罷！茲篇之作，不過聊表對蔣先生的人格威力的一番敬意而已，實際上對蔣先生的偉大的人生哲學尙未能窺其什一呢！

## 蔣介石先生的倫理思想

### 一

蔣介石先生的革命勛業，據他自己的表白，與一般人的研究，都說根源於他的革命哲學。誠然，哲學是每個人所不能缺少，沒有哲學就沒有思想，沒有思想的人何能成大功立大業？故凡任何人，其事業總是根源於其哲學思想。越是事業與人不**同**，越是其哲學思想與人有別。觀某人的事業，可以了然於其哲學思想。反之，既瞭然於某人的哲學思想，則其事業之既成的，可以證明其非偶然，未成的可以推知其將來之究屬如何。

關於 蔣先生的整個革命哲學之研究，範圍甚大，欲道其詳，殊非這短小篇幅所能勝任，無已。姑先就其倫理思想這一部門加以研究與闡述。因為倫理思想與其革命事業關係尤為密切。

## 二

蔣先生的倫理思想，第一應該注意的，就是他統統致辯於人與禽獸之分別。照生物學上講，所謂生物原該括動物與植物兩者而言，人亦只是動物之一；生物進化的程序，是由阿密巴起，一直進化到人為止，這就是說人為生物中之最進化者，這是生物學家解釋人與禽獸不同的說法。有人曾經反問過，為什麼現在只是人生人，而不見動物變成的人？生物學家的進化論於是發生動搖。本來科學的精神原極可取，以言現在的成就，恐須尙待若干時日，前舉的進化論，只可算為暫時的假設，當然不能遽可信奉為金科玉律。



中國古代聖賢，亦嘗兢兢於人禽的分辨，尙書中有云：「人爲萬物之靈；」孟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第一句的「靈」字，或者就是第二句的「幾希」所在。所謂「幾希」當然是分別不多，所謂「靈」又過於空洞不可捉摸。孟子雖然又說「由仁義行，」好像幾希就是仁義，但仁義依然是抽象的名詞未能具體的表示人禽分別。蔣先生關於人禽的區分，既不主張生物學家的進化說，又不取中國古代的抽象論，他具體而微的作出以下的人禽分別的界說：

「赤匪是要毀棄人倫，不要祖宗父母，不要國家民族的敗類！他是要使整個人類變成一個無國家，無倫理，無上下，不要禮義，不要廉恥的東西！就是要把人類的世界，變成禽獸的世界，所以赤匪的行爲，就是禽獸的行爲，赤匪本身就是禽獸，我們剿匪就是和禽獸鬥爭，亦就是消滅禽獸，來救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使他個個人能做一個人，不被赤匪壓迫淪陷而變成一個禽獸！我們要保持整個人類的世界，不讓他變成一個禽獸的世界！」——現代軍人須知。「現在再要講明白

怎樣才算叫做一個人，怎樣就叫做禽獸？同是一個人，爲什麼我們要說土匪已變成了一個禽獸呢？……因爲我們中國人五千年以來歷代聖賢和我們總理所講做人的道理，有八個字，即所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必須這八個字統統完備，然後才能夠算是一個人，是一個完全的真正的中國人！這是是說：對於國家，對於朋友，對於上官，對於部下，統統要忠實；對於祖宗，對於父母，必須孝敬；對於百姓要仁愛；對於一切的朋友乃至所有的人類，我們統統要有信義；還有一切人與人的關係，我們都要求其調整協和，公平合理，最後實現全人類的和平共進！現在共產黨怎麼樣呢？……這種土匪行爲，真是不忠不孝，不仁不義，如同禽獸一樣，還能算是人嗎？還能算是一個中國人嗎？——則匪的意義與做人的道理。

這些話雖是說共產黨，然人與禽獸的分別却說得十分明確。第一段的「國家倫理上下禮義廉恥」與第二段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是有關係的：「國家倫理上下

禮義廉恥」的基本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表現，是「國家倫理上下禮義廉恥；」有「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就有「國家倫理上下禮義廉恥；」有了「國家倫理上下禮義廉恥，」自然就有「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一有一齊有，一缺一齊缺，缺了就是禽獸，有了就是所謂人。假如其形是人，而缺了這些，那就所謂「人面獸心，」雖是人也不能算做人了！蔣先生這樣看人與獸下界說，既不是唯物論，又不取唯心論，獨抒所見，度越前賢，爲學術史上一個新開關！

### 三

其次 蔣先生對於人生的「生」字，也有他的獨創的見解。他說生字有兩個含義：一是生命，二是生活。我們一天到晚，無論起居飲食睡眠，謂之生活；從生到死，所活動的人身，或者死了之後，還可繼續下去的精神，謂之生命；換言之：即橫的爲生活，縱的爲生命。這已是爲前無古人的創說。而他對於生活的解釋雖說是

起居飲食睡眠，但所謂徒然以飽暖爲目的，那是獸類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而人的生活是犧牲個人的自由平等和幸福，以求人類全體之自由平等和幸福；質言之，便是生活的目的是增進我人類全體之生活。又 蔣先生對生命的解釋是從生到死所活動的人身，或者死了之後還可繼續下去的精神。但他又說生命是繼續的，不是片段的，生命不隨肉體而定存亡，而隨主義思想事業人格定存亡，生命是可以創造而不可以限制；質言之：卽生命的意義是創造其將來繼續之生命。這更是古人所不及的了！因爲 蔣先生對生活與生命的解釋是如上所述，所以他再就生活與生命兩者的意義融會而爲成功他偉大的革命人生觀。他有一段話說。

「我們每一個人自從天地父母生我們下來，撫育我，鞠育我，長大以後進到學校裏或部隊裏由先生或上官教育我，培植我，使我成一個人，有相當的智識和能力。但是我們這個人這個軀體，普通最多只能活到八十歲，這八十年的壽命，若計算起來，並沒有多少時間，一年不過三百六十五天，八十年合計也不過二萬九千

二百日，這個短短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若拿我們自己這八十年的壽命，來和我們民族五千年有記載的歷史來比，那不是僅僅佔到極短極短的一段嗎？而我們自己一個人，在整個偉大的民族生命中，豈不更是渺小如滄海之一粟嗎？同時，我們這個生命乃是整個民族，幾千年所遺留下來的，乃是整個民族生命的一份子，乃是要開拓整個民族未來無窮的生命的！所以我們講生命，決不能就自己這個極小的軀殼之存亡來講？決不能就自己這個極短的壽命之終始講！我們要講生命，一定要講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命！要講我們民族整個歷史的生命！總之，我們不好把自己個人的生存看作是生命，我們要把整個民族之歷史的生命當作自己的生命！所以我們對於整個民族，整個歷史，要負起承前啓後繼往開來的大責任！這就是講：我們要繼續保持整個民族的生命與歷史的光榮，更要努力將這個生命與光榮發揚光大而開拓於無窮！」

他說這是生命真意義。吾人就他所述說的內容而加以分析，則瞭然於其所謂生

命實又該括縱橫兩方面。橫的生命是民族整個的生命，縱的生命是整個歷史的生命。中國古時如張橫渠的西銘中有「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句，說者謂爲極仁愛之濶濶，然胞與之義，只能表示爲連理之枝並無一體不可分性。又如謝上蔡語錄中有「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一語，然精神之云，猶未說盡生命之全體。而且他們只能說是如此，而未能肯定說出所以如此。蔣先生則不然，不但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而且說全民族的生命是一個；不但說「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而且說我之全生命就是祖考之全生命。這種真生命說與柏格孫的「真時」論極其相似。這是蔣先生在學術上極大極高的助勞！所謂生活乃是生命的維持，生命的範圍既是那樣大，生活的範圍當然也隨之要擴大，所以要謀全民族之自由平等和福利，所以要開拓發揚於無窮。

#### 四

蔣先生的人生解釋是那樣的偉大，所以他很侃然昭告於世人說：

「我們生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事情很多，但是包括起來，就是生字。」考中國古代儒家學說，其歸趨亦往往以生字為主，如易經上說：

「生生之謂易。」

宋儒解釋心的意義有說：

「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矣。」——朱子語

解釋仁的意義也有說：

「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陳淳語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也是以

「生存爲歷史的中心。」

蔣先生之以生字爲重，在某一方面說，可謂爲集中國古代儒家與孫中山的學說之大成。而且蔣先生自己也說過：

「革命的學問，並不是外歐來的學問，就是一個中國固有的學問。」——革命哲學的重要

可證他的學說固自有其淵源，然他對於人生之所以完成其爲生的則與任何人不一樣，這是值得詳述的。

本來一部中國哲學史，可以謂爲人生哲學史；自古聖賢無不以人生爲極重要，全部經籍，幾於無不討論人生之所以爲人生。換言之卽爲人之方法。如以人與天地相配而爲三才。歷代儒家均反對以人與物並視，所以告子「生之謂性」一語，儒家必出全力以辨駁之，此均以人爲重之表證。至言人所以能配天地之故，則中庸第十二章有言：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根本只在一誠字。何以能誠？則大學上又有一段話：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這即所謂儒家八條目。此八條目俱是所以達到誠的方法。能够完成這八條目則誠在其中，而誠之道盡；亦唯有誠，纔可以完成這八條目。誠字既如此重要，然誠究爲一種怎樣的面目？這在中庸第二十六章裏又說：

「至誠無息」

凡是研究「誠」字的人，對於「無息」二字似乎不能不予以注意。這「無息」二字，似與易經上所說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意思相同。

中庸以後，以誠爲學問之本的，其人雖多，而其中最著名的當推明代王陽明。他抓住誠字，同時他也抓住了無息二字。從誠字上，他認出良知；從無息二字上，

他認出致良知；並進一步而改動古來「知之匪艱，行之維艱」的學說，而創造出「知行合一」的主張來，雖是翻新，究爲誠字的本來面目。

在中國哲學史上發生異樣動態的，爲孫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的學說，直將「知易行難」的古說推翻，其說「知難」是要人求其知；其言「行易」，是要人着力去行。此外又說出「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此八德等於王明陽的良知。而知難行易就是致良知。還是誠字的本來的面目。

蔣先生講做人的言論最多，凡是古人所值得研究的言論他都提出來研究過。譬如八條目是大學上極有價值的倫理與政治的哲學，蔣先生關於此項言論，幾於連篇累牘，一言再言：如中庸言誠，言智仁勇，蔣先生亦言誠，言智仁勇，並於智仁勇之外加信嚴二字，合稱之爲武德，而以中庸有「仁者人也」一語，遂以成仁盡仁爲得入之道；如管子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蔣先生的新生活運動便以禮義廉恥爲骨幹；如王陽明的致良知，孫中山先生的八德，蔣先生都一一予以闡發，加

以表宏，這都是 蔣先生的倫理思想與前人相同的地方；也是 蔣先生自稱革命哲學爲中國固有的學問之重要原因。但是 蔣先生的倫理思想並不完全只是前人的承繼者，他在倫理學上却有兩大功勞；第一，他將前人的倫理學說加以整理，其不合於中華民族精神的予以淘汰，如宋明兩代的學者多淪於玄虛，有消沈中華民族精神的弊害 卽不是真正的人生本義， 蔣先生均所不取。其真爲中華民族精神所在且有裨益于中華民族精神者如大學中庸所言，如王陽明所言，如 孫中山先生所嘗以及管子所言，都加以疏通。如 孫先生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 蔣先生說就是禮義廉恥，所謂禮義廉恥就是良知，就是誠。 孫先生的知難行易， 蔣先生說：就是着力在行，與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同爲篤於行的表示；而致良知，就是力行，於是而成立了動的革命哲學，這是他的第一個功勞。第二，他主張的動，是有兩義：一是向上，二是利他，這根源於他的生命的解釋。他解釋生命有縱橫兩種不同，自然於人的行爲有向上與利他的自然律，這種向上利他的自然律，包括了大學八條目

以下各種學說，基於這自然律，必然有國家，有民族，有倫理，有上下，有父母，有兄弟夫婦朋友，其理想中的人：是一個大公無私自強不息的人！其理想中的社會，也是一個大公無私自強不息的社會！這是他的第二個功勞。他將前人所欲言而未能言的，一語爲之道破曰：「勵的哲學。」他又將前人所未悟到學到的，一語爲之表出曰：「向上利他。」他的勇敢果決的精神，實爲任何人所不能及！

## 五

蔣先生常常教人研究三部書：一，學庸；二，王陽明集三；三，民主義；做人的道理盡於三書。在精神方面講，三部書實是一氣相承；王陽明的言論旨趣固不超越學庸，而三民主義中也稱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條目爲無上政治哲學；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爲良好的固有道德。三部書中研究一部如同研究三部，研究三部實同研究一部。

蔣先生教人必須研究這三部書，實無足爲怪。有些人未遑深究，陡然聽得 蔣先

生遺言論，以爲 蔣先生又在主張復古，教今人爲古人。假如這些人能用心的將蔣先生的言論集一讀，便覺得這種觀念爲錯誤。

第一，蔣先生教人所要做的人，是一種新人而不是舊人。他曾經說：

「我們明德修身之後，便要推而廣之，將一般民衆的一切舊的不良的不適於時代環境的思想風習剷除，使成一種新的思想與風習，能與時代要求相適應，以確保生存與發展。這就是古人所謂「化民成俗，」亦即近來所推行的新生活運動之真實意義；必須如此，然後治平之功才有基礎。」——大學之道。

他並未忽略時代與環境的適應，時代新，環境新，生於這時代與環境的人類們，不新就不能生存，不新就不能發展！治國平天下的大事業，以個人的新爲基礎。怎樣才叫做新呢？又怎樣才能新呢？其要點在能剷除舊的不良的不適於時代環境的思想與風習。此固是新生活運動之真義，也是革命事業的出發點。何能謂爲復古？

第二，蔣先生教人所要做的人，是一種順應自然而又能克復自然的人。此語

看來似極矛盾，但 蔣先生的理由則極其充分。他說：

「至於天命之謂性一句話，古今來許多經生學者，聚訟紛紜，都說得太玄妙而不着實際。依我看，只是平平實實的照字面講：天命就是宇宙自然推演無盡之生命。論其本體，就其天性天理，也就是自然運行之理。論其迹象，則是一切勸植飛潛繁衍無窮的生命。我們 總理曾說：「人類歷史以生存爲中心，」自然之理，即是生存，反之即是死亡。……人之性即自然之理，如違反自然之理，違乎仁道，反乎人性，其人必敗，其國必亡。……」

「大家或者以爲率性二字既然作順應天理解，未免與我們平常所說克服自然的話有些衝突，其實這並不矛盾，譬如自然之秘，必須探索；天災地變，必須以人力與之奮鬥而戰勝之，這正是發揮天性的本能，求合乎自然之理。因爲江河泛濫是水性就下而有所壅阻，所以導水疏河，一方面是克服天災，一方面也正是順應自然之理。……所以順應天理與克服自然兩者一些也不矛盾，而實在是一理。我

們可以說唯合乎天理者方能克服自然，唯順應天理人情者，方能戰勝一切困難。

——中庸的要旨與將領之基本學理。

性命就是生存，這是將古人「生生之謂易」與「天地之大德曰生」一語道破，快人快語掃除學術上不少的浮雲！率性就是順應自然之理，這是他所以主張順應自然的原因。在順應自然中，如發生自然之障礙則又必須克服自然順應自然。順應自然之自然爲生存，克服自然之自然乃自然界之萬事萬物；萬事萬物所以便利吾人之生存；其有不利者則吾人必用全力以克服之所以謂兩者一些也不矛盾。然克服自然只可出發於順應自然；換言之，只可爲生存而克服自然之舉，否則爲戕賊自然，與戕賊生存者無二致；其自然必不能克服，反之必受自然之克服。此革命與反革命之真正判別，而亦人之所以必須要革命之理由。

第三，蔣先生教人所要做的人是一種有本位而不可凌亂的人。這也可說是與孟子「善推其所爲」的意旨相同。我們讀蔣先生的言論集，可以常常看到一無媿

父母」的一類說話，因為無論何人必有父母，父母在人類組織中為最先最密切最重  
要最親愛，子之對於父母，假如不盡孝，則其他一切人類關係都不待言；連父母也  
不知孝，則與禽獸究有何區別？所以中國古代聖賢教人，總是自孝字着手。蔣先  
生也是這樣，總是教人孝事父母，一切的修己為人，總要不遺差於所生的父母。既  
盡孝道，則推之而兄弟朋友夫婦，再推而至全國。所以我們又常常見得：

「我們要做一個真正的中國人。」

做中國人豈真忘了做世界的人嗎？這都是由於本位的思想出發，而是要由為中  
國人推而為世界人。如同由為一家的孝子而為中國人一樣。凡事不可忘本，而且登  
高必自卑。平天下是我們終極的志願，也是全生命得着生活；然必自為真正的中國  
人做起，否則便陷于與禽獸無別。尤其是我們是中國人處今日危急存亡的時際，賣  
國求榮之輩多似過江之鯽，甘心為虎作倀，甘心為異族走狗，引狼入室，魚肉同胞  
，忘了國家，忘了宗祖，且忘了自己，非大聲疾呼做真正的中國人，何以救已死之



人心，挽將頹之國勢？不能救自己的國家而曰將以平天下，世界恐無是理吧？

第四，蔣先生教人所要做的人是一種有秩序守紀律的人。這也可說是爲一種有組織的人，所以要有組織。因爲生命是有縱橫兩面，所說組織就是求生生命之有向心力，保護生命有各部門，是要全生命分工合作可以生活。所謂組織就是企圖分工合作；生命之流極其偉大，有時順暢前進，有時會遇着不少的波折，非有整齊的組織，頗不易於打破種種難關；——所以組織極其重要。既然組織爲人生不可少，則有組織必有領袖，有組織必有羣衆，於是秩序與紀律爲不可或缺之要件。有秩序與紀律，則若網在綱，井井有序，而組織之力量於以益宏。所以蔣先生講齊家而將家字範圍擴大爲國以下之團體都可謂之爲家。齊的意思則爲劃一，反對散漫凌亂，於是而主張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於是而主張禮義廉恥，於是而主張誠。每一個人在大生命中都有他的本分應盡義務，不可一息或懈，必須力行，乾乾不已，尤必須堅苦卓絕，剛勇無畏。

凡此，都非前人所可企及，卽有爲前人之遺意，亦不若 蔣先生之明快澈底。

## 六

因爲 蔣先生的倫理思想是如此，所以他的事業功勛都不是得自偶然。

第一， 蔣先生之忠事 孫中山先生爲任何人所不及。能見危授命始終如一。

因爲服從領袖是人生的本分。

第二， 蔣先生之勇於革命，富貴不淫，威武不屈，險阻艱難，甘之如飴，因

爲仁就是人道。

第三， 蔣先生之剿滅共匪，乃以人而消除禽獸。

第四， 蔣先生之打倒帝國主義，乃是順應自然以克服自然。

第五， 蔣先生之治國乃爲平天下之初步，所以求全生命之邁進。

他認定宇宙間只是一個生命，所以他便具了「宇宙內事皆分內事的」胸懷，他

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他視天下人之飢溺怒然心傷，他大聲疾呼地說：

「我們要做一個正堂堂的人！」

「我們要幹一番人的事業！」

他的事業雖然是完成中國的統一，他的功勛雖然是已令四萬萬的中華民族獲得自由平等和幸福，但照他的倫理思想推測，他就僅是如此而止了嗎？已成的勳業是結局還是開端呢？蔣先生常有言曰：

「止於至善」

吾人對於其未來的勳業，可以思過半了！

附註：此文爲夏君虞君所作

## 對於蔣介石先生人生觀之管窺

### ——闡明生死觀念——

#### 一 澈底了悟的生死觀

凡是能够成功大事業從千辛萬苦中奮鬥到成功的地步，並且是能够永遠的在一般人的心理上信仰上，具有不可磨滅的力量，乃至於是能使一般人無條件的服從像似有「不可思議」的神秘似的樣子的一個劃時代的偉大人物，他惟一的自信力，也就是他的成功的要訣，說實了，並沒有什麼高深使人不能了解的道理，他只是平平淡淡的把自己的生命看輕了看的很是平常，隨時準備以死報國家人民，以死去救人

就是了，也就是他不把自己的生命看的比別人重要，不存一點犧牲別人的生命，以保全自己的生命的意思，他時時是存一個「先憂後樂」和「不忍人」之心，這就是儒家所說的「殺身成仁」，佛家所說的「我不入地獄孰入地獄」，耶教之「舍己救人」以及歷史上一切偉大人物，和許多無名的英雄所以能成功他的事業，並且是能夠延續一般人類永久的生命的一點真精神。這點精神是不可以「偽爲」，不可以從「聲音笑貌得之者」，這必然是對於生死有澈底的了悟觀念，才能作到。蔣委員長就是我們民族在當代中對於這一點最能澈底了悟的第一個人，他曾說道：

「若是一個人，果真明白做人的意義，對於自己生命的目的，同自己生命的澈底意義明白之後，那不管是在「槍林彈雨，人山血海」之中，沒有畏懼恐怖的心理。就是太平洋之大，喜馬拉雅之高，都要跳過去，走過去，亦沒有什麼懷疑顧慮？要是遇到天翻地覆的時候，我們還要頂天立地，來扶持天地間的正氣，來拯救人類的劫運。如果我們的志向能夠真正的堅決，那我們的事業與

理想，沒有不可成功不可實行的道理，你們要曉得我們生活的目的，不單是顧着自己一個人的。我們的生活是為增進全人類的生活而生活的。」

從上面一段話裏可以「顯豁呈露」的看出他的「大無畏」「不怕死」和「已餓己溺」以拯救人類為他自己不能脫卸的責任的意思。我們要追尋他這種精神志願從那裏來的，就可以從以下的一段話看出來：

「我們的生命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在此說明生命意義之先，有一句要緊話，請各位聽着。就是我們軍人的職分，是只有一個生死的「死」字，我們軍人的目的，亦只有一個「死」字，除了死字之外，反面說，就是「偷生怕死。」如果偷生怕死，不單是不能做軍人而且是沒有人格，就不能算是人。古人說「與其背義而生，則生不如死」這句話，是為一般人類說的。一般人類尚應如此，何況我們軍人呢？你們要曉得我們的生命不是一時的，是永久的。我們的生命不是我們自家生出來的，是我們子子孫孫會承繼下去的。所以我們現在的生命是有

限的，我們真正的生命，是在死後的將來，千千萬萬年之中的。我們生命能得將來世世承受的價值，那麼暫時肉體的生活，就不去計較他了。所以古人說「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如果我們的死有如泰山的價值，死得其所，如爲主義而死，爲救國救黨而死，那麼死又何足惜呢？因爲我們身死之後，還有繼承的人，來承繼我們的事業，亦就是繼續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命就永久不會斷絕的了。所以我們生命的意義是創造將來繼續之生命，不是單求肉體上一時的存在，就可以算長命了。方才說的人生觀，得了兩句斷語，就是「生活的目的，是增進我全體人類之生活。生命的意義，是創造其將來繼續之生命。」

「生命不是身死了就斷絕的，只要我們主義不斷絕，那麼我們革命黨員爲主義所犧牲的人，即使其身體死了，而他的精神與光榮，是同我們本黨歷史，世世代代會傳下去的。所不只要革命事業有人繼續，國家民族能够存在，而我們的生命亦是永久繼續存在，不會斷絕。」

「我們應該看見我們先烈的死，和自己的死一樣，或者比着自己還要重大；因爲先烈的死，就是替我們的死，並且我們就是他們的後死者，就是他們化身。我們能够拿先烈的奮鬥精神，來爲先烈報仇，才對得住先烈，才對得住我們。總理的遺囑，才不愧爲後死者。」

上面這一段話，很透闡了闡明了「民胞物與」，「爲天地立身，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的精神。因爲他把人類的生命看成是整個的，不僅是「痛癢相關，休戚與共」的一種暫時的感應，和人情上的關係，他簡直是在主觀上，把自己的生命認爲是和他的以往無家的先人，和未來無家的子孫，看成是一個東西。他不僅認爲是爲傳自己的血統造成一個生命，他簡直是認爲個人的生命，就是創造將來人類無家的繼續的生命，也就是古人所說的「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的意思。從這一點再進一步的追求，就涉於宗教學理哲學範圍，因爲蔣委員長是單純站在三民主義的革命立場上，來說他的對於生死的觀念，所以我們不能以宗教和普通的哲



學觀念來加以推測。因為蔣委員長是躡全站在三民主義的革命精神上，來說明他的生死觀念。他的出發點當然是現實的，是要從改造現實的生活作起點，去貫徹他的生死觀。所以他又說：「生活的目的是增進我全體人類之生活。」他是要從生活中認識生命，他不把生命當作是神秘不可解的東西，他把生命的精神作用現實化了，他簡直要把未來無窮的生命，也現實化了，所以他認為生命是永遠不死的。他認為革命的後死者，就是先烈的化身，所以他認為生命不死，就是要以個人暫時的生命來改善全人類的現實生活，所以他在我們的生活是為增進全人類的生活而生活的一句話下面接着又說：

「比方說只有我一個人有飯吃，其餘的人統沒有飯吃，那你一個人還能夠安穩穩穩的吃飯嗎？就是你可以安穩吃飯過去，那你的心可以安樂嗎？若是反轉來說，世界上全人類統能飽食足衣，豈有讓我一個人饑餓凍苦的道理嗎？天下事只要為主義，為人類做下去，沒有饑餓的道理，所以我們生活的目的，是

要增進全人類的生活。」

「生活不是爲我個人的，是爲我人類全體來求幸福的。我們革命不是爲一家一族自私自利求生活的，如果我單爲個人來謀生活，那就是我發了大財，亦是無用的。因爲天下事決沒有你一個人可以飽食暖衣，而其餘的人皆可飢凍的。亦決沒有大家飽食暖衣，而讓我個人饑凍的。所以我們的生活，是要爲全體人類着想，如果全體人類的生活皆能良好，不但是我個人生活亦能良好，就是我死了，我的家族子孫，亦能得良好的生活。所以我們革命，就是求全體人類生活良善，如果我爲革命死了，那我家族妻子亦必有得到良好生活的一日。如此死法 才有價值 這種死法，就是死得重於泰山，何等榮耀呢？所以我們只要爲主義來革命，不怕死後的子孫沒有飯吃的。」

## 二 以必死的精神作革命的事業

因爲 蔣委員長他自己先把生死的觀念澈底的了悟了，所以他才能够「以身作則」「躬行實踐」的以必死的精神去領導一般人努力革命事業。他是具有從犧牲中求生存的最大決心，所以他對於民族國家的前途，永遠是抱着最大的樂觀，他認爲革命是沒有不成功的道理。他說：

「中國爲什麼要有革命黨？爲什麼要有革命主義呢？你們要曉得革命黨乃是民族的急先鋒，抱有一定的主義，去救護人民。所以革命軍人最後的目的，是要替人類替國家替我們自己來革命的。況且軍人最後的目的。只有一個死字。所以我們做軍人的，是爲求大多數人的解放，爲造大多數人的幸福，爲達到我們主義的目的而來革命的，不是暫時要犧牲少數的生命財產，就是連我們自己的生命財產，也要犧牲在內的。如果如此爲替代多數人而犧牲，爲替代多數人而造幸福，爲求達三民主義的目的，那就是犧牲了少數的人民，也算不得什麼。也沒有什麼對不住天良的地方。所以我們革命軍人，到不能伸張我們主義

的時候，不能實行我們主義的時候，惟有以死報黨，以報人類，這就是「生辱不如死榮」的一句話。我們軍人如果能抱定這種志趣來吃餉，來吃民脂民膏，就不算爲負疚，亦不愧爲人類了。所以餉的意思，可以說是我們死的意思。」

「青天白日旗幟之下，實行三民主義就是死了，也是爲救國救民而死，爲主義奮鬥而死，這樣死是很有價值的，是能留芳百世，照耀史冊的，不比得在土匪軍隊裏面，爲自私自利而死，做別人走狗傀儡而死。所以我們要明瞭主義才能打倒一切土匪式的禍國殃民的軍隊。還有一句話要緊，我們軍人要明白的，就是人總是要死的。死是軍人最後的目的，只要死得其所，死就有價值了。」

「如果我們真能犧牲自己少數人的生命，去爲大多數人謀幸福，是很有價值的。就是奮鬥而身死，也是爲國民謀良好的生活而死，爲謀人類前途的光榮

而死。只要我們的主義是不死的，我們的生命也就是不死，代代的傳下去，以至於千年萬年，是何等的光榮呢？

上面這一些話，是說明不能抱定必死的決心，是不能成爲革命軍人，而革命軍人又原來就是以貫徹三民主義，去犧牲自己的生命爲職志的意思。因爲革命的最後目的，就是要謀大多數人的幸福，而個人的幸福又是以大多數人的幸福爲保障，所以爲革命而犧牲少數人的生命財產是合理的。至於革命軍人，要有怎樣的行動，才算是抱有必死的決心？在下面的話裏有深刻嚴正的說明：

「刺刀不單是刺敵人的；而有時要用來刺自己的。怎麼要刺自己？就是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或是被人拿去做俘虜，受侮辱的時候，如果到了這個時候，與其投降敵人，讓敵人來侮辱，就是國家被敵人侮辱，亦就是本軍同胞本黨同志，與主義皆被敵人侮辱的一個樣子，所以與其爲我個人來侮辱神聖不可侵犯的主義，那不如就「殺身成仁」以保我革命軍人的人格。所以我們革命軍人，

頭可斷，骨可磨，而主義亦不可爲人來侮辱的。古人說：「與其背義而生，則生不如死。」這個「義」字現在說來就是「主義」之義，要請你們各位理解這個道理。還有我有時或是犯了大罪，照紀律應該要槍斃，若我自認以爲錯，就不要等候法律來殺我，我應該要自殺，像這個樣子，方才算是革命軍人的本色了，這就是刺刀的用處。」

蔣委員長對於武裝同志的訓話，一面隨時隨地激發其不怕死，以死爲目的的心理作用，一面就指示其實際的不怕死的行動，教他「從死裏求生，」很自然的認清殺就是生的道理。所以他又說：

「總理說一個人要打一百個人，才算是革命軍。我以爲革命軍如髮志向堅定，拿槍拿得穩，子彈打得中，不但一個人可以打百個人，而且一個人可以打千個萬個亦是不難的。這個子彈打得中的法子，是很簡單的，是怎樣法子呢？就是在戰地上心思堅定，不要慌張，不可存一毫偷逃的心思。換一句話說，就

是要「不怕死，」亦就是「要在死中求生，」方才可以「真正不死，」就是爲主義而死了，亦是同生的一個樣子。」

「作戰沒有別的秘訣，就是我不怕敵人，敵人必怕我；如果我怕敵人，敵人就怕我。不過我們心裏要先存不怕死的觀念，那麼無論什麼強大的敵人，所們都不怕他了。本來死是一樁不要緊的事，我們死了，祇要死得得當，死有價值，死得安心，爲主義而死，爲正義而死，爲人類而死，如果我們的死能與正義同死，那就死得其所了。這個做人責任，也就可以完了。一個人總有死的時候，就是活到一百歲，還是要死的，我們又何必怕死。」

「軍紀主要的意義，各軍人以克敵制勝底緣故，必致其心志，到効死疆場而無怨的地步。但是要求兵卒作這種非常的事業，下非常的決心，就要在平日先養成了他「必致其死」的一個自然習慣，不要用官長去勉強他，或環境來逼他，使得他發於至誠，視死如歸，以死爲榮，成爲自然習慣，這就是軍紀主

要的意義。」

上面的一些話，是單指革命軍人一方面說的。同時 蔣委員長對於一切的黨員，也是要叫他以必死的精神，去推行主義。他說：

「本來一個人要入革命黨，是做什麼？就是要來為革命而死。我們那一天入黨，就是那一天沒有我們的身體了，就是那一天死了一樣的。因為我們黨員的身體，是不能自由，完全交把黨裏，決心犧牲的。亦就是我們那一天入軍官學校，就是你那一天死了一樣。你們到了本校來，本校就是要你們去為革命而死的。本校長也是要你們去為主義而死的。從前 總理說過「親見革命成功的人，謂之成功，生前未見成功，先犧牲去死的人謂之成仁。」我以為真正為人類為主義的人，很不容易在他生前成功的；生前成功的人，我以為大部分是假的。本校長是要你們做真正的革命黨，就是要你們成仁，要你們為革命而死，我們試翻開歷史一看，大凡能成功的人，大都是騙子。成功最顯著的莫如帝干



，而帝王便是一些大騙子。他們的居心是不可以告人的，他們專拿人家來做奴隸牛馬，並且拿人家的生命來做犧牲品，以造成他一人無上的幸福，所以他們絕對不是革命黨。要是真的革命黨，真正爲黨作事的人，十之八九沒有不先成仁而死去的。可是成了仁，在歷史上和人格來說，這些人就是最大的成功。所以我們要做人格上歷史上成仁的革命黨員，不一定要希望做成功的革命黨員。

### 三 生死觀念的哲學根據

有了確定不易的人生觀，才能澈底的了悟生死觀念。我們從下面一段話裏，可以見 蔣委員長的人生觀的一個片斷。

「社會的進化，是天天在那裏革命的，革命如停止了，社會就不能存在。試看歷史上沒有幾百年不革命的，所以我們非革命不可。然而我們要革命就先

革自己的命，將自己的命革好了，才能革人家的命。你要知道一個人的生命不打仗是會要死的，一個人早晚總是要死的，而且今天或明天死是不曉得的，所以你拿肉軀來易生命是不行的。你要知道生命是繼續的，不是片斷的，祇要我死後還有人來繼續我的主義，實行下去，這就是我的生命未死，譬如本校長死了，有你們學生來繼續我的事業，你們死了，還有你們的學生來繼續你們的事業，這才是真正的生命。我們的生命，不是單爲一人一家來求生活的，是要爲增進世界上一般人的生活平等來革命的。如世界上有一個人的生活不平等，我們的革命就是假的。你們以後對人生觀，總要澈底明白，才不爲枉做人。要是不明白人生觀，做人就無把握，人家講東就東，講西就西，隨環境的改變來轉移，這樣子總是做人的傀儡機械。如果我自己有主義，有目的，專拿三民主義來做把柄，凡信仰三民主義的認爲同志，不然就是父子之親，也和我們是敵人，所以我們同志，總要了解人生觀，做個有人格，有思想的人，不然你們本身

是很危險的。我們說這個危險，並不是死，就是不死，終身要做人的機械傀儡，這樣真是人生第一痛苦。」

在上面這一段話裏，蔣委員長雖然沒有爲我們專論他的人生哲學，但是他諄諄的對於我們提出人生觀一個題目，並且說，「你們以後對於人生觀總要澈底明白，才不爲枉做人。」我們就可以知道他自己對於他的人生觀是怎樣的澈底明白了，他是站在革命的立場上去講人生觀，他的人生觀主腳，就是他的全部的革命事業，而他的革命的理論，是要「先革自己的命，」能革自己的命，自然是先要把生死的觀念澈底了悟了。不革命社會就不能生存，要革命，就要爲主義去犧牲自己的生命。沒有明確的人生觀，就是活着反不如死了，這就是蔣委員長革命哲學的人生觀的出發點。關於這一個問題當另文闡明。

#### 四 總理的革命精神與蔣委員長的生死觀的關係

革命的理論，和一般的思想家，哲學家，和政治評論者不同的要點，就是革命是行動的理論。他是由事實產生理論，也就是從行動中找出他所以要行動的道理，他認為他的行動一定能成功，他的行動一定是對的，他是要造成可為一般人行動的正確指導的主義，可以引起一般人信仰的主義，可以產生行動力量的理論。他是要把「行」看作是「知」的條件，知了沒有人能行的，行了更要求知。他是要打倒一切只能坐言不能起行，或把「行」看成是比「知」更難的傳統心理。在革命者的心理中，「行」既然不是什麼難事，他是除了行動以外無理論。因為這樣，所以他要在他的行動以外，找到所以支配他的行動的一種最大的力量。這就是「革命的精神。」說到這裏，我們要知道 總理是以他的偉大的革命精神所以才成功他的革命事業。他對於革命事業認為是「精神能力實居其九，物質能力僅得其一。」 總理在他的精神教育演講中說：

「總括宇宙現象，更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精神為物質之對，然實相輔為

用。考科學未發達時代，往往以精神物質絕對分離，而不知二者原來爲一。在中國學者亦恆言有體有用。何謂體？卽物質。何謂用？卽精神。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體皆爲體，屬於物質。其能言語動作，卽爲用，由人之精神爲之。二者相輔，不可分離。若猝然喪失精神，官骸雖具，不能言語，不能行動，作用既失，而體亦成爲死物矣。由是觀之，世界上僅有物質之體，而無精神之用者，非必人類。人類失精神則非完全獨立之人。雖現今科學進步，機器發明，或亦有製造之人，比生成之人毫髮無異者。然人之精神不能創造，終不得真謂之爲人。人者有精神之用，非專恃物質之體也。我既爲人，則當發揚我之精神，亦卽發揚爲人之精神。故革命在乎精神。革命精神者革命事業所由產生也。……

！武器爲物質，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兩相比較，精神能力實居其九，物質能力僅得其一。」

我們讀了這一段話，就可以澈底的了悟，凡是一個偉大的革命領袖，除了他本

身具有不可思議的偉大精神作用，能使一般人，「聞風興起，」「踴躍奮發，」「歡欣鼓舞，」信仰主義；加入於革命戰線以外，他自己所日夜「兢惕」「戒慎」「恐懼」者，只在於其異於常人的一點精神作用罷了。

革命事業的原動力是精神作用；不是物質。所以革命黨的成功，都是由於三五極少數的先知先覺者的發動。他能够赤手空拳，推倒勢力勝於他本身千百萬倍的當時的統治者。而革命軍人都是能够以一當百，以十當千的勇士。這裏我們要問革命精神，到底是什麼東西？他和一般人的精神不同的在那裏？總理在黃埔軍校訓詞中有一段話說：

「大家總要記得革命是非常事業，不是尋常事業。非常事業決不可以尋常的道理一概而論。現在求學時代能够學得多少，便是多少，只要另外加以革命精神，便可以利用。如果沒有革命精神，就是一生學到老，記得滿腹的學問；總是沒有用處。……從前每次革命的時候，我常常都參加，總沒一次貪生怕

死。但是每次流血，都沒有流到我的身上。所以今天還能同諸君講話，把不怕死的道理口傳至諸君，敢說革命黨的精神，沒有別的秘訣，秘訣就在「不怕死」。

「要能够有這種大勇氣在心理中，就是『視死如歸』，人生隨時都可以死，要死了之後，便能够『成仁取義』，明白這種道理，便能够說死是我們歡迎的。遇到了敵人的槍砲子彈，能够速死，便是我們歡迎的。有了這種大勇氣，和大決心，我們便能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這種以死為幸福，要求速死的道理，並不是憑空的理想，完全是事實。……由陳天華，楊篤生，兩個人投海的道理，便可以證明一般人，只要感受了革命的精神，明白了革命的道理，便可以視死如歸，以為革命而死，是最高尚，很難得，很快樂的事。如果在戰場上，遇到了自己主義的敵人，受敵人槍砲的子彈而死，當然你以為是死得其所了。

○……」

「以身殉道，」「以死救國，」乃至於為了顧全朋友間的信義，為了良心子責

備，以死去報知己。在我們歷史上，本有許多這樣「義無反顧」「死而後已」「一死明志」的可泣，可歌，驚天地，動鬼神，「神魂浩氣」常留於宇宙間的事跡。這就是我們民族所以能够屢次從外人壓迫的勢力，掙扎出來，延續我們民族生命，直到於今，而又能發揚光大之唯一的原因。不過是我們以前有許多「志士仁人」，限於歷史所決定他的命運，不能不把他的所以死的對像弄錯了。——他們有許多人只是臣民對於皇帝的死，婦人女子對於他的夫父而死。他們認為死得「所」的「所」字意義太狹隘了。——現在我們這種傳統的不怕死的精神，要加上我們三民主義革命的洗禮，更加上我們革命領袖的「切實闡明」「諄諄誦誡」，「現身說法」的指示，我們一般人民，是要把他用到實現主義和再造國家的事業上。再進而言之，就是我們當前就要人人存一個不怕死的決心，以整個民族不怕死的力量，在完成了我們民族主義對於世界的使命，這就是作者並希閱者更深的體認我們革命領袖所說的革命精神和他的生死觀念的一點微意。這裏再引 蔣委員長的一段話，以當結論：



「民族主義既然要求民族獨立，當然我們就要起來打倒國內的軍閥，推倒壓制我們的國際帝國主義。……更使我們中華民族得到獨立的機會。如果我們真能這樣，將來打仗死了，我們是爲民族獨立而死，爲打倒帝國主義而死，爲世界各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奮鬥而死，爲求世界人類求自由平等而死，死了也是很有價值的。只要我們主義不死，我們的精神就可以永遠存在；只要我們精神永遠存在，我們也就永遠不會死了。如果我們不能奮鬥，甚至做人牛馬，那麼就是雖生也不如死，「不自由毋寧死，」這是人類所應奉爲圭臬的一句話。」

「附註」全文所引用 蔣委員長的話，都是從「黃埔」「廬山」「峨嵋」各訓練集中摘出的。至於文字或有錯誤，和有「斷章取義」不合全文意旨之處，當然由作者負改正之責。

附註：此文爲茹春浦君所作

# 蔣介石先生的革命哲學述要

## 一 前言

欲研究 蔣委員長之哲學思想，當具有豐富之學力，以作者之淺薄，而欲遽叩高明，實無異以蠶測海。茲篇之作，僅在（一）約略提示 委員長哲學之要點以引起學者之研究，（二）使學者對於 委員長之指示有明確之概念，（三）闡明 委員長之哲學與今日國內外環境之關係，（四）以 委員長之言，證以 委員長之行，以爲力行者法。至若詳細研討 委員長之革命哲學，仍當於 委員長全部演講及著述中求之。

欲明 蔣委員長訓示之大意，須先明吾人今日所處之環境。我民族落後於他人者已百數十年，領導此落後之民族，使之邁進，與世界強國並駕齊驅，乃 總理一生之志願，亦即 蔣委員長所繼承而致力者也。欲達斯目的，端在力行。

吾人試就現代各國之政治領袖觀之，自民族主義昌明以來，益以世界大戰，國際政局，異常緊張，爲領袖者，非知戰守，明政治，文武兼而有之，不克排除萬難，支持國運。 蔣委員長以軍事政治兼具之資，首先鞏固革命策源地，次則完成北伐，以鐵血奠定國基，復本其特殊之智慧，秉承 總理之主義，益以數十年革命之經驗，故能對於革命主義，多所闡明。綜其所訓示而關乎我民族之復興，爲吾人所應專心體認者：曰「力行」，曰「寶貴時間」，曰「生活之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之意義在創造宇宙繼續之生命」。此皆民族之南針， 總理遺教之發揚光大，復興民族之具體方案，須於此中求之。茲就平日研究所得，謹述如左：

## 二 知與行

方今舉世民力圖生存，長空遠征，巨艦縱橫，其所表現者曰動，曰力，曰戰爭。乃東亞老大民族捲入世界之狂潮，猶夢寐不自覺，終至幾不能自存。於是首先知先覺者，孫先生出，慨於國家之危亡，首創革命之運動；建國方策，綱舉目張，祇對全國人民「行」，無庸另外求知。故於二民主義之外，復創立「知難行易」之學說。蓋欲使人知「知甚難而行則易」，以接受其主義而見諸實行，然後能救中國；非然者，主義等於空談，於國家前途何補？

不幸自總理逝世以後，國家多事，黨爭紛起，而寶貴之遺教，反被黨內外人士遺忘，此革命之所以中落也。當此國本廳搖之時，幸有偉大之繼承者出，遵遺教所指示，復融會而貫通，故能鞏固兩廣，底定長江，統一全國。此繼承者為誰？即堅苦卓絕之蔣委員長是也。總理全部之教義重在「行」，不「行」則一切不能實現。故委員長謂：

「現在中國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所以要受日本人侵略壓迫，主要原因在

那裏？就是一般士大夫自己不能做，不敢做，反拿 總理的二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來曲加解釋，弄得一般青年，無所適從，全國人不能照 總理的哲學「行易」方面去做，祇是向着「知難」方面去求，這就是不能致「良知」，亦就是不能行，所以到了今日，我們革命還不能成功。我們一般同胞把我們黨國弄到這樣地步，就是這一般曲解主義，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之人弄出來的。……」

「如果我們祇聽信一般士大夫咬文嚼字片段曲解，與一般一知半解的理論家的亂宣傳，把 總理最純粹，最良好的學說，主義，弄得支離滅裂，以致一般國民和青年無所信仰，無所適從，實際的革命工作，反而沒有人去做，使得 總理的主義，一點也不能行；這樣便是革命的罪人，亦就是 總理的罪人。革命之所以失敗，即在我們不能力行，不能力行 總理主義，不能照着 總理的哲學實事求是去做，歸根到底，就是病在只求知而不能「致」。（自述研究

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

委員長深知空談主義，無補於事功，故特別提倡「行」的哲學，使「總理一知難行易」之學說愈益昌明。不幸此種「知而不行」或「言而不行」之病症，深入於一般人之腦中，根深蒂固，以故雖在危急存亡之國難期中，一般國民心理仍有諉過與唱高調之兩種弊病。此皆由於自己不行，夢想意外奇遇，而徒責他人之卑怯心理有以致之。

夫天下固無不勞而獲之事，倣倖之心不可存；天下固無不擊自退之敵，依賴之心不可有；天下無一人應負前代之責，諉過之言不必發；所貴者在以責人之心責己，望人之心望己而已。能如此，天下無不成功之事，無不可克之敵也。然此種工夫，歸根說來，亦不外「行」字，故 蔣委員長諄諄告吾人曰：

「總理發明知難行易的原理，完全是要我們注重「行」字。因為 總理生在滿清末年，與王陽明先生在明季一樣，同是看着中國人中了幾千年「知易行難」學說的毒；一般士大夫不是學漢儒解經，就是學宋儒講性，結果只是空疏迂

闊，無補實用。所以王陽明使用「知行合一」的學說來醫治當時中國的民族性；而我們總理更進一步用「知難行易」的學說，要來啓發中國的民族精神，並用來實行他的革命主義。總理的意思就是說：你們既知道三民主義和國民革命是好的，那你就只要照我的「革命方略」去做，照我的三民主義去行，就一定能夠完成革命了。所以總理常講：「你們一般黨員只要照我所講的話實在去行就好了，不要再求另外的知」。他的意思即是：良知是我們大家所固有的，故不必另外再去求知。若說要求學問的知識完全，就要用許多時間，更是不易。求知既是不易，卽是很難。後知後覺以及不知不覺的人們，祇要跟着先知先覺的人們去行，就可以節省時間，完成革命，因為跟着去行是很容易的。照這樣說，王陽明所講「良知」的知，是人的良心上的知覺，不待去求，而總理所講「知難」的知，是一切學問的知識，是不易強求，而知識的知不必人人去求，只須人人去行。我們理解了這點，便知總理所講的「知難行易」

的知，同王陽明所講的「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知，其爲知的本體雖有不同，而其作用是要人去行，就是注重行的哲學之意是完全一致的」。（見白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

由上所道，可以看出不行之弊與力行之益。總理與陽明一大導師所教，亦不外「行」字。委員長以其自己之生活加以印證，故能發爲如是深切著明之義理。

### 三 時間與空間

時間與空間爲宇宙構成之二大條件，凡百事物，均不能逃出其範圍。故奉行總理與委員「力行」哲學者，尤宜特別體認。蓋「行」爲人之動力，而時間之長短乃主觀的，亦即因爲人之動作始顯其價值者也。

行動有勤惰之分，亦即使用時間有差異之別，故能率高者，一小時所完成之舉



，能抵他人二三日而有餘。推而至於文明人與野蠻人較，文化發達之國家與文化低落之國家較，亦猶是也。故近世各國莫不講「速率」亦即欲以一日之工抵他國多日之工，以時間勝人也。

如前所述，委員長悚於國家之危亡，知我國一切落後，故欲國人均有振作與向上之精神，最基本者莫如在時間上着手。因中國之所以一切落後者，由於不知寶貴時間也。中國之所以敗於人者，由於不知運用時間也。故曰：

「現在戰爭爲時間戰爭，我們當愛寶貴時間」。又曰：

「時間爲一切事業與生命之母」。

「一個人生存在宇宙間，有兩件事是不能忘掉的，一是空間，一是時間。

中國人向來不注重時間，以爲時間是不值錢的，因而使得我們中國國家，無論什麼事情，都是落後」。（見民國二十年一月五日在中央軍校紀念週講詞）

「一個人的生命，究竟有幾歲？最其命也活不到一百歲，每天只有二十

四點鐘，百歲可有幾點鐘，我們可以做多事情」？（同上）

「我們要作人，第一就是妥節省時間。一個人的學業，統統限在時間中。時間規定，一點鐘可以當十點鐘用。如果不重視時間，不節省時間，不運用時間，一天二十四點鐘轉眼過去了，什麼事都不曾做，這一生就是等於死了，什麼事業都不能成功」，（同上）

復次，空間之於吾人，亦甚重要；蓋空間者，自然所包含的各部份也；亦即吾人所處之客觀環境也。吾人做事業，苟不認清自己所處之環境，則其弊亦如不認清自己所處之時代。故委員長云：

「空間的距離就是地位，一個人生在世界上必須注意兩件事：一是空間的地位或全球的地圖，另一個便是時間」。（同上）

#### 四 生活與生命

吾人知力行矣，然而力行之目的爲何？人生之目的與意義又爲何？此則吾人所必須究討者也。

人生之目的爲何？視其答案之異同，可以決定其人之德性。故不可不釐定一正確之觀念，以作爲判斷之準繩。若其答案曰：人之目的爲食，爲衣，如杜甫之言「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是則與下等之生物無異也。又若其答案曰：「人之目的爲享樂」，則其結果亦不過爲一利己之小人。又或其答案曰：「人之目的與意義在自我之擴展，支配慾之發揚」，則其結果必至成爲窮兵黷武之帝國主義者。

然則吾人果如何而生乎？試就前義言之，衣食誠爲維持人類生存之資料。然人者有生有死，前乎我者百千萬人，後乎我者亦有無窮之未來世界，若是短短數十寒暑，果可以衣食爲人生之目的與意義乎？曰否否，衣食只可謂爲維持生活之要件，而非生命之目的與意義。

又試就第二義言之，人類有時求樂者反得苦，而苦中亦可得樂；且苦樂若自外

來也，則其來，吾人不可得而逆拒之；若自內發也，則苦樂自我而定，又何享樂之可言？

至若以人生爲支配慾之發揚，則其弊不失之於卑，卽失之於狹。是種種者皆不能謂爲人生之真義。

吾人試測生命之本原，無論如何複雜之生物，其始無不由單細胞動物而來。單細胞動物之第一目的，卽爲分裂個體而擴大其族類，以故由一而分爲二，由二而以至於無窮。由單細胞動物進化，而有雄雌，其任務亦爲分裂其個體，使產生蕃衍之族類。於此分裂之現象中，有二方面發展：一則爲其族類之擴展，二則爲其族類之延續。故凡生物必有二目的：一則擴展其族類，二則延續其族類。

然此特生物之原始現象耳；人類者具有文化之生物也。此二種現象表現於有文化之人類中，其表徵爲何？由人之延續方面言之，謂之生命，由人之共同作業營生方面言之，謂之生活。故 蔣委員長云：

「我們生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很多，但是包括起來，却只有「生活」與「生命」四個字。每天要做事情，就是爲的要生活。無論吃飯，上課，出操，穿衣服，洗臉，掃地，這一切的行止都叫生活」。（見民國二十年一月五日在中央軍校紀念週講演）

又云：「自從父母生我們下來到死爲止，所活動的就是生命，你的生命要不要生存呢？這生存着的東西就是生命了」。（同上）

復次，吾人當知所謂生活者，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又有精神與物質之別。饑而食，寒而衣，固爲生活之要件，但決非生活之全部，生活之意義決不狹窄如是。吾人須牢記生物有向上向外擴展之天性，低級生物中所皆同者則爲繁殖之擴展，若此擴展之意義用之於高級動物，則爲 蔣委員長所言：

「生活之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

何以「生活之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蓋由於一人之生活與全人類息息

相關，有如委員長所云：

「我們的生活，不是爲我們個人，間接直接都影響到人類……」

從禍害方面言之：一人之一舉一動，可以加害於社會，如一人污穢，則其所孳育之微菌可以毒害全社會，一人傳播謬誤之思想，其流毒可以妨害全世界之安寧。再從福利方面言之：一人之發明，可以裨益十萬人，在科學上，發明之有益於人類者多至不勝數，是則一人之舉動行爲固處處與社會發生關係，而裨益社會，造福人羣，又爲人人應有之責任。故曰：

「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又加以淺顯之解釋曰：

「現在同胞沒有穿沒有喫的人太多了。我們無論作學生，作下級幹部，或高教長官，總要想到除了我個人之外，對於一切人民同學同志朋友，都要使得他們一樣的有益處，不祇我們自己有飯吃，有衣穿有房子住便算了」。（見民

國二十年一月五日在中央軍校紀念週講演）

吾人欲增進人羣之幸福，須先從最切要之點做起，凡得我救助之千百萬同胞之生命，亦即爲我之生命之擴大，而我一小己之生活，乃與千百萬人之生活相合。歷史上許多賢哲之所以建設豐功偉業，其動機不外如此而已。

生活之目的，既如上述，然則生命之意義又爲何？如上所述，前乎我者既有無數之遠祖，後乎我者又有無限之未來，此區區一段生涯，誠若白駒之過隙耳，吾人爲遠祖所創造而生我，而我之任務又一如遠祖，須負延續未來之責任。故 委員長曰：

「生命之意義在創造宇宙繼續之生命」。其深切著明之釋義更有如下所云：

「隨便那一個人，活到一百歲也是要死的，早一點死，遲一點死，都沒有什麼關係。不過死了之後，我們的歷史生命，要能繼續下去才好，決不是我們的身體死了，生命就完了，我們生命的意義，不是那樣的；比如我們 總理逝世，今年已六年了，但是我們 總理的生命沒有完的，並且是永遠可以遺傳下

去的。我們軍校的學生已死了幾千人了，但是軍校學生已死的生命，並沒有斷絕，因為中國國民黨存在，國民政府存在，軍官學校存在，軍官學校的學生也還有存在，他們的精神永遠不會消滅。大家不要以為我們個人既然死了，生命即已斷絕，其實並不是那麼一回事。比方我們 總理死了，有我們一般學生來繼續 總理的生命；我們一般同學死了，從新又有一般同學同志來繼續我們的革命。因為我們的生命的意義，是在創造其繼續的生命，不是說我出生到死為止就算了，我們的生命自己天天仍在創造的。生命是可以創造的，不是生死可以限制，限制却在於我們自己。如果只圖自私自利，那生命到死便是完了，若是實行三民主義，想民族獨立，謀黨務發展，我們的生命就是永遠不會斷絕的。」（見民國二十年一月五日在中央軍校紀念週講演）

吾人讀此訓示，當可糾正一般人對生命之狹窄見解而表明生命之真義。一般人因對『生』之意義有不同的觀感，故對『死』之意義亦有不同的認識。常人以為死



卽人生之終了，而不知死後尙有精神之存在。苟如此，則人之一生，誠屬可憐。蓋悠悠天地，吾人所享者只此一段短促的生涯，豈不大可哀耶？故吾人若從生命是創造的觀之，則此悲觀之黑暗頓然打破，而現出偉大之光明，覺生命有不可限量之無窮延續。蔣委員長偉大之啓示曰：

「生命可以創造，不是生死可以限制」。此二語是 蔣委員長在人生哲學中的重要發現 其解釋如下：

「我們大家各個人都有創造的能力，父母生了我們下來，不僅只生我們一個身體，還生了一個我們自己能夠創造的生命，可以創造的繼續的生命。……我們自己的生死不能限定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命是繫在所有的同學身上，也就在我們後輩學生的身上。惟其是這樣，我們始能團結，事業才能發展，不怕我們生命的不存在，因為我們的生命是可以傳下去的」。(同上)

今日之世界，尙未脫離民族主義之支配；全民族之生命應視爲一大生命，然後

此民族始能延續，如吾人所見僅限於一己之生命，則民族之生命將不能繼續。故委員長諄諄以生活與生命之真義訓示吾人，蓋欲吾人處處爲全體而不可徒爲個人着想。

## 五 動與靜

試觀東西兩半球之文明，則覺兩者顯然有相反之趨向：東方之文明，偏於靜，故好學之士，大都寄情林壑，優游自適，其極也，每至消極而遁世。西方之文明偏於動，其極也，每至盲動而爲侵略，黷武，造成空前慘酷之大戰。

往昔交通不便，我國閉關自守，東方不知有西方，西方亦不知有東方，互不相涉。自海通以還，此靜的東方文明乃突爲西方動的文明所衝破。於是立國之根本精神乃發生問題，經數十年之失敗，知昔日靜逸之態度，實不足以臨競爭劇烈之今日。是故今日中國文化應有之趨向爲「動」！倘仍保持靜的態度，則不足以抵抗異族之

侵略。蔣委員長博學鴻識，故能尋出中國由靜趨動之根源，發見王陽明之學說爲反宋明數百年死靜生活之動的精神，其言曰：

「王陽明哲學是非常有價值的；他在儒教中間，誠是別開生面，他因爲當時中國民族麻木，消沉，散漫，萎靡，只講玄學玄教，儘是講而不去行，這實在是在亡國滅種的現象。他目觀當時中國人的民族思想那樣衰弱，精神那樣消沉，頹唐，將來一定要崩潰滅亡。他知道當時之所謂儒教，只注重靜的一方面，而不能提倡動的哲學，僅僅向靜的方面發展，大家伏在桌子上翻死書本。……這樣讀書人，讀了幾句死書，只會空談理學，弄到自相殘殺，而對於敵國外患，怎樣抵抗、民族精神怎樣復興，却一些不問……王陽明後來提倡動的哲學，而批評靜的哲學。……中國民族現在仍站在靜的方面，無論倫理政治，自秦漢以來的哲學思想，直到現在爲止，儘是講究靜的。所以民族精神，就如此其積弱不振了。如果現在我們把道德方面的精神爲基礎，而再在動的方面盡量

的發揮。就可以造成我們固有整個的民族精神」。(見「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  
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

前代賢哲雖揭獎勵的精神，尙未有動的生活之具體方案。蔣委員長既認清今後文明應趨於動，於是更爲具體之說明。其於吾人生活之標準提示爲「日光，空氣，水，」「勞動，創造，武力。」在此等口號之下，於是又有更具體化之「新生活運動」。皆一本反弱爲強，由靜趨動之意義，而化之爲條理的現實生活者也。

## 六 唯心與唯物

近日唯心唯物之說，每成爲擾亂青年心曲之大端。實則此乃哲學上千古聚訟紛紜而從未有最後解答之問題，決非膚淺之叫囂所能得一正確之結論。倘根源於一方謬誤學說，而發爲行動，其爲害乃至不可收拾。如今日之焚殺劫掠，不顧禮義廉恥，皆誤解唯物之過也。

矧就唯物論本身論之，其派別亦是非莫辨；自命爲「辯證的」唯物論者，每謂機械論者否認主觀動力之存在爲不當；而所謂主觀動力，又實爲人之意志；人之意志卽人之心力。故論者謂「辯證的」唯物論，大有恢復唯心的傾向。是知心與物二者本難下嚴格之區分也。

此本無可嚴格區分之界線，胡爲興起無窮之辯駁？彼唯物論已自暴其隱，曰：「哲學之黨派性」也。吾人爲中華民族之一份子，須求吾民族需要之哲學，隨人斤斤致辯於他人黨派間之哲學，非我民族之益也。是以 蔣委員長云：

「現在唯物論者，僅是講「唯物」，完全排除了精神方面，這在東方民族一定是立不住的，就是西方的民族也不能離開了精神而獨講物質所能立住的。我們中國，從前僅是講唯心而不注重物質，所以不能夠獨立，不能夠發展。我們要成功一個新時代的國家，精神與物質，決不能偏廢。我們只知道「知難行易」的「行」字，爲唯一的人生哲學，而不能承認唯心哲學；亦不能承認唯物

哲學：我們只知道有「行」的哲學」（見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武士道的精神）

委員長之意，即在排除心物之爭，而以需要為標準，不能離心而言物，亦不能離物而言心。今日吾國之首要，端在力行。故 蔣委員長處處教人注重「行」字，此乃中國今日所迫切需要，亦即 總理「知難行易」學說之本旨也。

## 七 結論

蔣委員長秉承 總理的主義學說，加以二十餘年的革命經驗，對於革命哲學自有重要發現，其全部哲學可名之曰「方行哲學」唯其全部言論達數百萬言，學者每苦不易讀畢全書，得其要領，特摘出其中關於革命哲學之要點，加以闡述，俾供學者之參考焉。

吾人對於事物之原理，必求其知，既知之後，必求其行；惟知有先天之知，有

後天之知；前者係與生俱來之知，謂之「良知」；後者係由學習而來之知，謂之知識。窮理格物，係後天之知；惻隱羞惡，係先天之知。至於「行」，即係將所知者見之於事。知行二者，只有先後之分，並無輕重之別。傳說欲戒高宗之怠於行事，故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總理深惡一般人不重視真理，不信奉其主義，故又一反傳說之說，而改爲「行之匪艱，知之維艱」。至王陽明之「知行合一」學說蓋係針對當時「知而不行」之弊，故曰「即知即行，知而不行，等於不知」；又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終」。上三列者，均各有其理論上之根據，祇是各人所着重的觀點不同而已。

蔣委員長承總理主義學說之後，以爲革命原理及方略上，已有總理之發明，無須再事他求，祇須依照總理所指示者切實去行，即可完成革命，故特別注重在「行」。凡爲總理及蔣委員長信徒者，應明瞭此種革命哲學之來源線索，體認其中之時代性與重要性。一種學說或一種主義，原非可以適用全時間而不變，或

全空間而皆同。吾人生當今日，即當知今日之需要，處茲環境，即當知環境之需要；需要即是真理；蔣委員長「力行哲學」即今日之需要，亦即今日之真理。能依此真理去實行，則國興；不能依此真理去實行，則國亡。取舍之間，存亡所繫，故革命者不可不慎也。

附註：此文爲夏含華君所作。



## 蔣介石先生的政治思想述要

### 一 從政三時期

蔣介石先生是世界一個最偉大最成功的政治家。他從事國家的政治建設凡數十年，直至他的五秩壽辰，可將他的政治生活分爲二個時期：其一是追隨先總理革命時期，其二是自創辦黃埔軍校至北伐完成之軍政時期，其三是自國民政府定都南京至現在努力建設新中國時期。在第一個時期，他苦心孤詣、犧牲一切、擁護先總理，以冀其革命事業之成功。在這個時期，因有先總理的庇護，故得玉成其大器，大智，大才，大量；因有先總理之嘉猷碩勳，故自己少獻新策，惟於危難或重要關

頭，多所學劃，而動輒有成，所謀皆中。因有先總理之親身指揮革命工作，故自己重居幕後工作或努力研究，鮮露頭角，養精以待。這個時期是他的政治準備或潛蓄時期。這個時期進備了他所需要的一切，他以後所作成的各種偉大工作都是胚胎於此時。第二個時期，是他開始在政治革命上獻身手時期，因其蓄積也深，故其顯現也大。一現政治革命舞台，便驚天動地，山河變色。其指揮革命軍事也，如手之使臂，臂之使掌，掌之使指。集全國數十百萬之軍士，自由調動，指揮靈活，謀算皆準，故能挫大敵而完成北伐。在這個時期有二大工作：其一是完成北伐，即將清廷遺留下來的北洋軍閥餘孽一舉廓清，為北洋軍閥作最後掙扎之吳佩孚孫傳芳雖各擁數十萬之衆，亦不值一擊，土崩瓦解。其二是豎立中國國民黨的權威于全國各界人士之前：在以前國民黨祇能作小規模的秘密活動，在此時期，全國家喻戶曉，咸知三民主義為救國救民之主義，國民黨是救中國的唯一政黨。在第三個時期，他開始將先總理遺留下來的三民主義之政治實惠於全國民衆。「剿匪建設」，「安內攘

外」，是他在此時期的從政的名言，由這名言也可以知道他的努力內政工作。在此時期他將國內羣匪平靖了（雖然尚有少數負隅竄往西北，但不久即將掃滅以盡），他將國內真正統一了（直至現在，多年未能解決之所謂西南問題亦已和平解決了）。在這時期開始了國防和國家的經濟建設。全國的公路建設有驚人的發展；鐵路建設有如粵漢之完成，浙贛鐵路之建設等，於國防交通有大的貢獻。全國人民雖然未能載歌載舞，然景象昇平則已顯示中國政治建設確已開始走上了新的軌道。蔣先生在這三個時期，蓄其才能，試其身手，且得展其懷抱，由此時啓示了中國新政治之楷模；甚至奠定了中國新政治建設的基礎；以後若干年的新中國政治的建設毫無疑義地要以此時期為基礎；此時期種下了新政治的果實，以後將要發芽，開花，結實了。我們翹望這果實之早日成熟。

## 二 國家論

蔣先生不僅是個政治的實行家，同時他是個政治理論或思想家。他在政治思想上極重視國家觀念。他倡國家至高無上論，他認國家是超然偉大的東西。他在國旗與軍樂的意義內講：

「國家是個超然偉大的而又看不見摸不着的東西。我們從什麼地方來愛護他，拿一個什麼具體的東西表現出來給我們愛護呢？這就是國家的標幟——國旗……愛護國旗就是愛護我們的黨和整個國家。我們早晨起來，要知道愛黨愛國，晚上休息，也要知道愛黨愛國」。

他又在國旗的意義與新運的要旨內講：

「國旗不僅是代表我們國家的神聖標幟，而且是我們整個民族，上自祖先皇帝下至我們以及將來千秋萬世子子孫孫的精神和生命所集中歸托之處。……我們一看到國旗就等於看到我們的國家和祖先以及自總理以下一般爲革命犧牲的先烈，就要肅然起敬，奮然興起，要在我們手裏繼續保持並發揚光大我們祖先五

千年來偉大的民族生命和文化，救起我們的國家以復興我們的民族」。

他一面講國旗的意義，一面實是講國家的意義，要我們愛國，尊敬國家，而以國旗為代表的標幟來接受我們的敬與愛。

他倡國家有機說。他以為國家是有機的，活動的；她具生命的活力；有此活力，國家才可不朽；有此活力，才可以推動國家的其他一切工作，創造一切，改進一切。他在現代國家的生命力中講：

「現代的國家乃是一個最發達到極度的一個有機體。有機體的物質就是有生活的機能，不斷的新陳代謝，不斷的發榮滋長，自主的努力完成其理想的生命。同樣，現代的國家必須有他內在的基本的原動力，來不斷推動一切，改進一切，創造一切，使國家的生命作有計劃的進行，國家的生命，能無限量的發展！這種原動力，就是國家的生命。這個力量的消長，就是民族的盛衰與國家興亡之所繫」。

他又在「中國魂」內講：

「國家這個東西，是一個有機體的。這就是說：國家是一個有生命的超於一切的集體組織。他全部的機構，就是一個完密的生命全體。每個國民就是構成這一個生命全體的一個細胞。而全民族的歷史文化，就是他生活的史實和精神的產果。而此種歷史文化之傳說的根本精神，就是國家的靈魂。……國家就是因為有此靈魂，所以成其為有生命的機體，而非死的無機物」。

他重視民族精神。他以為民族精神是至高無上的產物，國民應該重視牠。一個民族國家之是否能够生存，全視其民族精神之是否喪失。一個民族國家之是否偉大強盛。全視其民族精神之是否偉大強盛。民族精神是建國的唯一條件。他在自信心與氣節之重要內講：

「我們一定要從各人自己起，恢復我們民族的自信，振起我們民族的精神，發揚我們民族的光榮」。「我們中華民族，有「至大至剛，至中至正」的民族精

神與「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王道文化，向來是「威武不能屈」的民族，向來是不畏強暴，反抗殘暴的民族」。

他又在「爲學做人與復興民族之要道」內講：

「我們曉得，宇宙是無窮大，但是在一層一層的分際當中，國家和民族便是我們最實際最重要的「大我」，我們個人這一個「小我」，必須仰賴國家民族的生存發展，才有生存發展的可能；亦惟有求整個國家民族的生命能夠進步和發展，然後個人纔能得到真正的進步和發展。所以惟有將我們個人的生命貢獻於國家民族，然後我們的生命纔能發揚光大，悠久無疆」。

國家之能存在於地球與發榮強盛，厥在其求存的力量，那就是國家的生命力。國家的生命乃是什麼？教育，經濟，武力是也。教育的要旨在使受教的人能充分發揮其「智識」，「道德」，「體魄」，和「羣性」，即所謂「智」，「德」，「體」，「羣」四育。除此四育之外，教育尚有一個中心的目标，就是要養成「軍國民

」的風尚。惟有實施「軍國民教育」才可以充實並增強國家的生命力。

經濟的要素有三：即勞力，土地與資本是也。這些經濟上的條件都要運用得很好，方可以使國家發生力量。所謂國民經濟生活之內容不外生產，消費，分配與貿易四者。要發達生產，須善用勞力，土地與資本。有人說中國人的消費是二十四世紀的，生產是十五世紀的，那就是說這個國家生產不發達而消費發達。大學上說：「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這就是一面增加生產，一面減少消費的意思。分配須合理化，即分配的社會化。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至於貿易在求其便利，即是使全國各地有無相通，多寡相濟。凡此數者均備，則經濟發達，而國家生命力自可增強。

武力不僅指軍隊與武器而言。「現代之所謂武力，乃包括國家所有的國民，人應參加戰事，致力國防；所有一切的物質，那怕一草一木，皆爲戰爭與國防之所



需，莫不爲武力之要件。……要使全國四萬萬同胞，都能成爲軍國民，卽有組織，有紀律，有訓練，能够爲國犧牲的戰鬥員！必須如此，然後可以造成強大的武力，來恢復我們中華民族固有的地位」。（見蔣先生講現代國家的生命力。）

但教育，經濟，武力三者，就是蔣先生所常提示的「教」，「養」，「衛」，亦卽「建國的三個基本」。換句話說，「教」「養」「衛」三者乃國家之生命力也。要國家強盛發榮，須於此三者多多注意及之。

總之，國家論是蔣先生的政治目的論之一，蓋以爲政治建設的目的在使自己的國家發榮強盛，外求獨立，內求統一，中國丁此艱難困苦時代，非提倡國家目的論無以振聳啓聵，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這是蔣先生重視國家之意義。

### 三 民本論

除國家論之外，蔣先生又注重民本論，以爲這是政治建設的又一個目的。「民

爲邦本，本固邦甯」，這句話是蔣先生於其政治講演中大聲疾呼提到過的。他曾說過：

「我們所要救的民衆是那裡的民衆？是要救我們中國全國四萬萬民衆！……我們要救國，一定先要救民，要救民首先就要使一般國民知道做人的道理；能够照着做人的道理來做成正堂堂的一個「人」！而且要做一個完完全全的「中國人」！……而且要使他們個人認識自己是一個「中國人」！「中國人」者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即「中華民國」的主人翁！主人翁對於國家應當要盡主人翁的責任！應當要愛護自己國家，挽救自己的國家……！」（見救國的基點）。

做良好的國民須有相當的條件。蔣先生以爲做現代國民必備的條件有四點：第一，重秩序，守紀律。秩序紀律是一切工作進展的必需的條件。紊亂無章是阻礙事業進展的因素。第二，明地位，負責任，蔣先生說：「我們生在宇宙間，一定要隨時認識環境，知道自己所處的地位和應盡的責任。對宇宙而言，我們人類爲萬物之

靈，有征服自然利用萬物，改造世界，造福人類的大責任；對國家民族而言，我們都是國家的國民和民族的一份子，有捍衛國家發揚民族的責任；對社會而言，我們都是民衆的領導者，有保護民衆教養民衆，增進社會文明與福利的責任；對團體或機關而言，譬如在軍隊行政機關以及學校，……各有一定的紀律，我們一方面要服從各級長官或師長的命令與教訓，一方面要統率教導所有的部屬或學生。在此上下四周一定的環境之中，根據自己所處的地位，發揮所有的智能來盡到自己所負的一切職責，這就是所謂「明地位，負責任」的意思」。第三，崇主義，復國魂。國家有形象，其表徵爲國旗；國家有聲音，其表徵爲國歌；國家有官能，其代表爲政府；此外最要緊的一點，就是國家內在的靈魂；中國的國魂就是三民主義。我們要崇信三民主義與挽救國魂；同時崇信三民主義便是挽救國魂。第四揚武德，張四維。所謂武德就是「智信仁義勇嚴」數字。所謂四維就是「禮義廉恥」數字。武德之中，以「嚴」爲最重要。蔣先生說：「所謂「嚴」，乃指我們先要嚴己律己，隨時隨

地能以身作則來教導約束所有的部屬。如此嚴以律己，嚴以馭下，嚴以處世，絲毫不隨便苟且，部下便自然能够做到整齊嚴肅，而且更可由薰染感化而完成其武德與四維的修養。要曉得：武德和四維八德是一貫的，都是人人所應有的德性，能真正實踐武德，即所以實踐四維；能實踐四維，必能做到「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見現代國民必備的條件）凡此四條具備，然後才可以做良好的國民；良好的國民，才是國家的真正的基本。

蔣先生講爲學做人與復興民族之要道說：「我們教學的目的第一步自然要教他在天地之間做一個真正的人，第二步成爲中華民國一個良好的國民，能够愛護國家……絕對不會作洋奴，充漢奸。……一國的國民如果精神奮發，道德高尚，則其國家雖屬貧弱，外人也一定不敢欺侮侵略，不能不敬而愛之，且必能於最短期間，轉貧爲富，轉弱爲強。反之，一般國民如果精神萎靡，道德墜落，則其國家雖云富強，亦不能使人心悅誠服，而保其繁榮強盛」。

總之，蔣先生極重人民的道德智識與技能。因為要有良好的國民才有良好的國家。所謂「民爲邦本」便是說須有良好的國民以爲國家的基本。而良好國民如何訓練，蔣先生曾切實指示，此處恕不伸說了。

#### 四 行政論

方法爲達到目的之手段，政治上之行政技術可視爲達到政治目的的方法之一。蔣先生於宣示政治目的論——國家論與民本論——之外，又宣示各種行政方式以爲達到其所希冀的政治目的——國泰民安——之手段。他講總理遺教政治建設的要義時，講到政治建設之要領曾宣揚六個要領以爲行政之準則：第一個行政的要領是，除舊布新，因勢利導。他以爲一切政治上的設施，必須運用過去的材料，根據現實的情況，創造將來的事物以實現高尚之理想。故一方面要不斷的除舊布新，一方面要注重因勢利導；換句話說，行政之實施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擇其可勞而勞之

第二，教養兼施，循序漸進。禹謨說：「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民」。總理在其遺教亦曾數數指示政府之職務，不僅在治理政事，而且在發展經濟以舒民困，換句話說，即是教民養民。所以行政者必須教養兼施才可以算盡了政府治民的職責。

第三，迅速確實，貫徹始終。爭取時間，證實實在，有始有終，為現代一切工作所必遵循的條件。行政者要使政治發生效能尚須寶貴時間，今日應作的事毋待明日；諸事求其正確實在，免致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有始有終，毋有首無尾，徒費勞力。

第四，守法重紀，明德修身。法紀是行政者必須遵守的規章。因為法紀是政治的憑藉，失此則政治無所依據，馴至人人各行其是，各逞其私，政治必敗，國家必亂。慎子說：「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荀子說：「修禮以齊朝

，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同時爲政者身爲人民之表率，風行草偃，影響極大。論語云：「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又謂：「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既有治法，又有治人，則行政效率自大。

第五，選賢任能，講信修睦。「爲政在人」，「任官惟賢材」，「能必當其官」，「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王安石說：「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凡此皆爲選賢任能之義。書曰：「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凡此皆爲講信修睦之義。現在國家行政者多棄賢能而任宵小之徒，上驕下諛，失和失度，均推行政治最大的阻撓。

第六，注重組織，努力研究。現代政治部門繁多，技術複雜，亟待研究。而行政運行，尤須組織之力以爲推動。所以組織與研究亦爲行政之重要綱領。

蔣先生於民國二十四年在重慶召見四川各行政專員訓話，曾提出幾個要點以爲行政之指示：一，政治須重事實與經驗，不尙理論與玄想。二，爲政之要，首在得人；而用人之道，必先知人；知人之先，必重考察；考察之法以辦事實爲第一標準。爲主官者必須精勤篤實，以身作則。三，得入之道不僅在部屬健全與運用得法，尤必本「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古訓，就地取材，相助爲理。四，辦事之要則第一在工作「實在」，切忌虛文捏報，敷衍塞責與陽奉陰違。第二在時間「迅速」，切忌怠惰延宕，遲誤失機。五，本末次第，處事所先；政自小始，古有明訓。六，爲民服務，實事實功，務須矯正虛僞浮誇之弊而造成篤實力行之風氣。七，事無大小，須權其輕重，且須興利除弊。

蔣先生是個有力的成功的行政家，故所言行政諸義悉爲要點，而爲行政者奉爲圭臬，其在近代行政學上之貢獻殊大也。



## 對於蔣介石先生政治思想與方法之管窺

### 一 發揚中國固有的政治心理與精神

蔣委員長的政治思想與理論，完全是以中華民族固有的理論道德，與歷代政治家的學術事業爲出發點，先立定了我們民族在世界的地位，再以發揚我們民族的精神，與充實我們民族的生命的基础，去隨時運用現代的科學方法。因爲他的根本目的，是要實現我們古代聖賢所主張的大同世界，所以他時時刻刻忘不了我們古代聖賢偉大的政治思想。同時又因爲他是本於總理所講的「迎頭趕上」的精神，並犧牲一切，去急速的實現二民主義，所以他對事物與物質的一切方法，就要盡量的採

取最新的科學方法，更具體的說，他是以「中庸」「大學」以及經史中的正統的政治學說，作爲他個人修養和政治道德，以及激發一般人的民族意識，和政治生活的興趣與力量的一種精神教育。而在實施上，他又是極端的運用革命的方法，剷除一切「舊染汚俗」，要領導全體人民，趕緊的走上現代國家的道路，尤其注意的是要使一切人民都能够成爲現代的一個人。因爲他是民族本位的政治思想，所以他就不能不偏重於人治方面，主張「人格感化」，「躬行實踐」的去領導人民，他就要以「作之君，作之師」，「爲民父母」的倫理觀念，去治理一般人民。但是同時他又要使國家人民現代化，新近在生活行動上，都要站在現在國家的前面，至少是能夠和現代最文明的國家作平等的揖讓周旋。所以他又不輕視法治，並且是他很深刻的認爲經濟就是政治的基礎，因爲他要在政治上，把人的條件，和物的條件，都放在最有效的動作上；而尤注重於利用時間與認清空間，所以他的政治設施，是最切實有力，是最合於中國當前的需要。他不願意說一句空話，他作到了還不願意說，他

把一切的理論都集中在一個焦點上，使他能够實現最大的作用。

說到 蔣委員長的政治哲學和思想的最根本的地方，就要專意悉心去研究和體驗他的一切實行和進求他在中國學術上所認定的路子，和得到的受用。更要極莊嚴肅穆的想到他的人格之偉大，和他的精神的充沛。這應當是要另作一個小冊去述敘，這裏只能就最淺顯的幾點，引據他的說話，來證明他的政治思想與目的。

我們要知道一個革命的政治家，他的最大的動機，必然是爲救國家民族與世界人類，他必然是抱有「悲天憫人」，「仁民愛物」，「先憂後樂」的志願，他是要改造一切，要使人類得到合理的生活。他決不能敷衍現狀，他決不是在現狀中去求理論，先構成一種形式邏輯式的政治學說，再去遷就事實，作形式的工作。他一方面是要不說空話，腳踏實地的做去；一方面就要有在一般人認爲是不能做到的一個最遠大的目的，他具有要使他的理想實現的最大決心，他決不在已成的環境中討生活。因爲這樣，所以 蔣委員長在政治心理上，就時時不忘實現三民主義，就屢屢

的崇拜讚嘆「禮運大同章」的大同世界的理想。他說：

「禮運上說（下引大同章原文）這真是古今政治最高的目標，總理以救國救民之熱誠從事革命，而生平所最稱誦勿衰的就是這一篇。實在因為這寥寥百餘字裏面，却已包含了達到人類社會最高境界的途徑。只要能去私心，謀公利，使男女老幼，各得其所，各盡其力，孤獨殘廢皆有所養，物產盡闢，自然秩序和整，不難達到大同之境界。我們一般從事政治的人員，不可不了解此篇之精義，而求其實現之道。總之，大家無論是在軍民政教團警那一界服務的人，從此要認識並牢記政治惟一的目標，是要使全國人民個個人能夠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足衣足食，知禮知義。簡言之，就是「民生樂利，萬物得所」。必須如此，才算是現代的政治」。

在他想要達到最後的目的的方法上，他又說：

「大家要曉得宇宙一切事物，沒有過去，便沒有現在，沒有現在，便沒有

將來，所以我們政治上一切設施，必須運用過去的材料，根據現實的情況，創造將來的事物，以實現高尚之理想。因一方面要照剛纔所講不斷的除舊布新，一方面在方法上，技術上，更要注重因勢利導。因勢利導的正確意義，是要因應現實的趨勢，想方法運用現實的事物，而達到理想的目標，完成一切新的事業」。

## 二 對於法治與人治的批評

「現在政治建設，必須「守法重紀」，「明德修身」。國家的圍籠很廣，政治上的事情極多，而人心不同，人事無定，賢愚異等，才智各別。所以我們要推進政事，治理國家，如果不先確立一個合理的規模和制度，根據一定的綱紀和法律來做，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法紀制度：就是政治的憑藉，失此，則政治無所準據，馴至人將各行其是，各逞其私，政治必敗，國家必亂。……今

後我們救國救民必須要將這一點澈底改進，否則無論有怎麼多的兵，怎麼大的勢力，也不能算是現代的一個國民，當然不能够在現代成功什麼事業的。大家要曉得，現代的政治與現代的國家，都是以「法治爲本」，國家一切事務，無不是遵循一定的法制，在正當的軌道上推進。慎子說：「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或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荀子說：「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呂龍吾說：「法者御事宰物之神器」。我們從這幾句話，便可以看到法紀之作用，和法紀之重要，可知非守法重紀，不可以爲政的道理矣」。

在上面的話裏可以看出 蔣委員長是認爲現代的國家，是以法治爲本，國家一切的事，都要由法律的軌道上推進。但是他同時又注重「明德修身」，說爲政在人，而得人必先修己、歸結於一切法令必須由爲政者自己先能實行。對於「修己治人

「的古訓反復稱道，而更以總理革命必先革心的遺教爲明德修身的起點。所以他

在下面的話裏又說：

「法紀制度，是政治必不可少的準據。但是政治建設，決不是祇建設好的法紀制度，可以成功。最根本最緊要的，還是要我們軍民政教團警各界的幹部人員，本身能够健全，有高尚的人格，優越的智能，和強毅的精神，能够真正爲一般部下和民衆的模範，盡到養民教民的職任。所以我們從事現代政治的建設，一方面要守法重紀，一方面要明德修身。……大概爲政在人，而要能修人，必先修己，一切法令也必須自己先能實行，然後才能貫徹於一般國民。這些道理，儒家尚德治，講得最透闢。大學中庸，以修身爲治平之本，卽其綱領。而論語中所謂：「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所謂「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這一類教人明德修身，正己而後正物的話，幾乎到處可以見到。我們只要讀一讀

這些古訓，便可以知道現代政治的建設，一定要本着總理革命必先革心的遺訓，努力從明德修身的工夫做起。一方面大家注意明德修身，便不患無治人，一方面大家守法重紀，便自然有治法。法良治美，而又官賢更能，現代的新政治，新國家，當然立即可以建設起來」。

### 三 注重人治的要點

(甲) 選任賢能的人材：蔣委員長既然認為政治上的法令，是要由為政的人首先實行，所以他對於行政上的用人，是極端的慎重。而在事實上，他的政治工作，也可以說是大部分是集中的訓練，考選和徵求人材方面，他認為人盡其才，比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更為重要。他說：

「為政在人的道理，大家都知道的，從來講政治人，可以說沒有一個不是注重在這個根本問題，所謂「任官惟賢才」，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不



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以及「德必當其位」，「功必當其銖」，「能必當其官」，這一類的話，歸結起來，就是「選賢任能」四字。所以政治建設的根本要務，是在訓練人材，考選人材，和任用人材。

(乙)由治而教的人格感化：在下面的話裏，可以看出蔣委員長所說人格感化的作用：

「因為你們無論是警察、團隊的幹部，或是專員，縣長科長，都是你們屬下，一鄉，一邑，一區，全體民衆的模範，這般民衆，不僅要你們去治，而且要你們去教，例如四川一省有一百四十八縣，共有七千萬民衆，平均每縣有四十多萬人，縣政府的縣長，各科長，再加上警長，和團隊隊長，不過十幾個人，平均起來，每個人要治理和教導兩三萬民衆，我們並不能對他們去一個一個口講面授，或家諭戶曉，也不是只下幾個命令，貼幾個布告，所能教好他們，治理他們。我們要教好民衆，治理民衆，必須於口講面授，及法令典章以

外，求得教民治民的要道。這就是要用我們的人格，精神，體魄，態度等，來作民衆的模範，使民衆不待我們說話，或下命令，而已受到了我們的感化。即古人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之身教，如果我們的人格高尚，體格健強，精神興奮，態度莊嚴，我們無論到那裏，或是走到街上，或是走到鄉間，或是到合部下和民衆的時候，一般民衆，一看見我們，自然發生敬畏的心理，服從我們。所以你們一定要以身作則，用感化的方法來教民治民，一個人至少要做一萬民衆的模範，一個人感化了一萬民衆，就可以發生一萬人的力量，如此才可以增進行政的效能。因此大家特別要知道，古人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的道理，所謂德與禮，就是指人格精神，態度等而言。我們在政治上，不是用嚴刑峻法，就可以治理人民和國家的，刑法與法律，乃是萬不得已而用的，並非政治的根本。政治的根本，在於德化，以人格精神，體魄，態度，來感化民衆，是治國治民惟一的要訣。

……大家要曉得我們一個人感化一萬人，並不是一件難事情，如果用直接的方法，當然很不容易做到，但如由近而遠，逐漸推廣起來，並不算難。先從自己身邊的人感化起，至少可以感化十個人，再由這十個人，又感化他身邊的十個人，如此，以一化十，以十化百，以百化千，以千化萬，效力就不知多大了。豈只一個人，可以感化一萬人，就是五萬十萬都可以被我們感化過來，只要大家如此努力，四萬萬國民，都能够新起來，就可以推動新的政治，建設新的社會，和新的國家」。

(丙)以警察軍人爲人格感化的模範：蔣委員長在偏重人治的政治作用上，更集中其作用於警察軍人。他要指導警察軍人，去推動感化的效力。他說：

「警察和軍人，就是社會的導師，民衆的保姆，除盡力愛護民衆之外，一言一行，都是做民衆的模範。但一般警察士兵，甚至一般警官軍官，還多有不明白這個道理，以爲戴了軍帽，穿了軍服，知道一點維持秩序，和作戰的技能

，就算蓋了警察和軍人的能事，當之無愧。殊不知警察軍人，除開以保民爲天職之外，還有安民的責任，如果自己做人還不成樣子，又怎樣可以示民以範，使民衆有所做法？又怎能改良一切惡的風習，使社會進步？因爲警察軍人，在社會上地位之重要，所以我們推行新生活運動，又要以警察軍人爲中心，負起教練民衆的責任來，提高民衆的知識，改良社會的風尚。因此，警察軍人，格外要自主自愛，從本身起，切實做到新生活的要求，然後可以一化十，以十化百，完成到社會國家所負的責任。這雖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却是爲政與革命入手一個要法』。

（丁）行政人員要以父母之心待人民：人治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引起最大的熱烈情感，與免除心理隔閡。而這種作用，只有從倫理推演出來的父母對於子女的心才能貫徹，所以只注重人格感化，而不進一步打通人與人之內心的親愛的心理，仍然是形式的人治，所以蔣委員長又說：

「大家要知道行政人員，無論他是專員，縣長，或科長，都是百姓的父母。既然是百姓的父母，當然要以父母之心待一般百姓。父母是怎樣待兒女的呢？各位一定很明瞭的，我們從前少年做兒女的時候，我們做兒女的未餓，我們父母已先爲我們備好吃的東西，我們未冷，我們父母已先備好衣服，我們未病，我們父母預先替我們種牛痘，防病痛，我們未成材，我們父母又教我們敦品勵行，使其學習藝能以爲立身之本。行政人員，亦應推此心以臨百姓，才不愧爲民之父母。所以做行政人員，固然要使所轄區域內的百姓，能守法律，守秩序，更應設法在消極方面，預防水旱疾疫，肅清匪盜，減少百姓的痛苦，在積極方面，鼓勵勞動，使百姓品德高尚，注重衛生，使百姓體魄健強，發達生產，使百姓足衣足食，推廣教育，使百姓智能提高，積穀儲蓄，使百姓備荒防饑，組織保甲，使百姓相親相愛，互助合作」。

(戊)造成風氣養成習慣：法律制度，是社會習慣和社會心理的產物，沒有社

會習慣與心理的基礎，法律制度，只是理論和形式，不能支配一般人的行動，這是在何政治學說所共同承認的一個原則。而偏重人治的政治主張，是更以領袖人物的行為，來轉移風氣。再從新的風氣裏，造成有潛移默化的作用的新習慣，所以蔣委員長說：

「今日之根本要務，就是轉移風氣，振作人心，團結精神，統一意志。我們要從事建設現代國家，要完成革命，復興民族，必須由此做起。我們必須照我們的理想，真正造成了新的風氣，新的習慣，新的信仰，與新的制度，使全國國民的思想行動，都能共同一致，政治建設才算有了成效，國民革命纔能隨之而成功。同時無論什麼事物，一旦成爲風尚，便有不可阻擋的勢力，而能普遍傳播，風靡萬物，若再進一步成爲習慣，立爲制度，則更能確乎不拔，固定不移，可以留傳久遠，綿綿不絕。所以我們從事革命，無論大小事情，總要我們一般先知先覺的人，能以身作則，造成新風氣；再進而養成新習慣，確立新

制度。到了確乎不拔，固定不移的地步，然後可以放心。……最後做到全國國民的精神，心理，生活，習慣，都能煥然一新，共同一致，無論做什麼事，都能整齊嚴肅，井然不亂，整個中華民國，就可成爲一個最進步的生長發育的有機體，四萬萬同胞就如合成爲整個一個人同一樣子，卽做到管仲所說的「期而至，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爲心者，敬之所期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未之令而爲，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爲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大小必舉，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讖也」。……如此我們便可以抵抗任何外侮，建立起一個真正自由獨立的現代國家」。

#### 四 政治不外國計民生四個字

「本來政治的內容，分析起來，雖然包括經濟，教育，倫理，社會，軍事，交通等等，但綜合起來講，就不外「國計民生」四個字。一切政治的設施，無非是要使國家富強，民生樂利，必須能够如此，纔算是政治。我們中國的政治進步很早，政治學說也很發達，我們無論從事實與學理來考究，可以說無論那一個偉大的政治家，都是以「民生」為政治之本。大禹謨所說，「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孔子主張「既庶加富」，「足食足兵」。到孟子更特別將政治以「民生」為主要的道理，闡發詳盡，所謂「使民養生送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所謂「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至於管子所謂「倉廩實則知禮義，衣食足則知榮辱」。更是歷來政治上最緊要的格言。我們由這些古訓，已可認政治的中心目標所在。如果再研究現在各國政治的性質，可以說政治與經濟相關，簡直是整個的不可分的，不僅是政治上最大部分的工作，完全是屬於



經濟的範圍，而且政治的基礎，就在健全的經濟，我們甚至可以說經濟情形是決定政治的惟一主要因素。就國家的觀念來看，也就是所謂「國計民生」。一國之現代政治，必須是「民生主義」的政治，現代的政治建設，必須民生爲首要。所以總理在建國大綱中規定，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開發一切富源，增加生產，以滿足全國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並辦理育幼，養老，濟貧，救災，醫病，與夫種種公共所需之事業。總理這種偉大精確的見解，是由博愛的胸懷，用深遠的眼光來體察政治的精義，而得的一個結論，這是千古不磨的定理，與總理平時所最愛讀的禮運一篇所說的完全一致。

因爲 蔣委員長是認定政治以民生爲重心，所以同時他就認定政治和經濟是不可分離的。所以他又必然的要實行生產的政治。他在政治的生產方面，除了實行國民經濟建設以外，他更注重盡量利用人民的勞力，節省經費。他說：

「我們處此異常困貧緊迫時期之中，一切建設，如動需鉅額經費，纔能舉

辦，隨便甚麼事都永無成功的可能。所以我們作事，以不花錢爲本，是政治上最大的秘訣。要曉得我們的勞力，就是金錢，能運用勞力，勤儉篤實，刻苦耐勞，雖無資本，亦必能生產，和創造一切事物。所以大家不要忘記大學上「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以及總理所說的「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這幾句格言。所謂「人，地，財，」三種經濟的要素，就是政治的基礎。政治上所有別的秘訣，就在如何管理與運造三種要素。而三者之中，又以「人」爲首要，只要使人能盡其才智，竭其心力，則地未有不盡其利，物未有不盡其用。一切生產建設，都很容易成功」。

因爲 蔣委員長在政治上，是以「仁民」爲出發點，所以在經濟上就以「愛物」爲生產的必要條件，但他又說：

「對於一切物品，我們都要好好使用，不可隨便毀損，用到破舊的時候，就想方法去修理，到最後實在不能修理，還可以廢物利用，將殘餘的材料，改

做別的東西，使無用的又變有用，總求盡物之用而後已。現在一般使用物品，尤其公共使用物品，差不多完全不知道愛惜。隨便用毀了，就丟去，毫不顧及物力的艱難，國家的貧困，真是和賣國一樣的罪過。我們中國人，既不能積極的發展生產，又不能消極的節制消費，所以要窮迫到現在這個地步，我們一般負政治責任的人，一定要以身作則。『其實來改革這個通病』

以上所引 蔣委員長的話，都是從黃埔，廬山，峨嵋各訓練集中摘錄的，如有錯誤，及附會誤解之處，當由作者更正。

附註：此文爲莊春浦君所作

# 蔣介石先生的教育思想述要

## 一 偉大的教育事業

蔣介石先生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我們以教育家稱呼他，未免失當。但是細考他的政治或革命事業的成功，有許多是由于運用教育方法得來的，並且當他領導其偉大的政治或革命事業時，不惟未曾忘掉教育，且重視教育以爲政治或革命事業推進之助力。在他負責領導中國革命進展時，他負責興辦許多重要的革命基礎教育，尤其創辦了革命的基本武力教育，這是值得我們稱贊的。他於民國十三年承先總理之命在廣東創辦了黃埔軍官學校，從那年起到現在止，從黃埔軍官學校到中央陸軍

軍官學校以及其他各特訓班或特別隊，其一手所造成出來的軍官，已達二萬餘人，遍佈了全國，尤其中央各部隊之上中下各階層，這些軍官費了很大的犧牲，簡直可以說，以他們的頭顱與鮮血換得了北伐的成功。除軍官學校外，他最近又兼長了中央軍事專門學校各步，砲，工，輜各專門學校以及中央政治等學校。他在十餘年之內造成功了數萬有力的勇敢的以身許國為國服務的青年，奠定以中國國民黨甚至中華民國的基礎，這些青年除犧牲了的以外，均成了中國國民黨甚至中華民國的有力

的軍事政治幹部。專就這個偉大的教育而言，我們已可稱他為一個偉大的教育家以

為我們教育界增光。

## 二 視教育為推進革命的方法

他視教育為推進革命的重要方法。有史以來的革命者很少有如他一樣視教育為推進革命的重要方法。他辦理軍官學校，為的是推進革命。部隊如不良，他便以教

育方式來改革牠，如調集部隊人員受訓是。剿匪工作發生障礙了，他便調集剿匪部隊軍官來受訓，如廬山（兩次）及峨嵋訓練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廬山軍官訓練團第一期開學時，他曾說：

「今天在廬山召集我們剿匪各軍各師的官長開始訓練，我們要從此奠定一個新的偉大的基礎，來完成剿匪的工作，並盡到大家革命的責任。我們以後能不能剿清赤匪，與整個革命的成敗，黨國的存亡，以至各個人的生死，統統都看這訓練能不能發生效力」。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廬山軍官訓練第一期開學時，他又說：

「此次開辦軍官團是我們中華民國全國的軍官集合在一個地方來受訓練的第一回，其意義為何等重大！我們相信廬山軍官團的訓練將來在中國革命歷史上一定要占最光榮的一頁。……」

民國二十一年他對武漢教育界說話，曾說：

「一個國家或一個地方要使之復興或改良進步，方法很多。但旁的方法很不容易見效！改造國家與改造社會，惟教育之效爲最大」。

「現在這個危急的局面，如何挽救，整個的國家社會如何改造，這當然是革命黨和政府的責任。不過要一個國家改造好，要政府和黨能够有力量，達到實現主義的目的，最要緊的還是要教育界共同努力，以教育來救國」。

### 三 國家教育論

教育是國家的事業。教育應以使學生愛國家與愛民族爲前提。教育應該如政治一樣，懸一個最高的鵠的就是保護國家，愛護民族。教育爲政治的鍵子，需要時可以任政府踢來踢去。蓋教育本身不能自有目的，應以政治之目的爲目的。現在中國政治之目的，以救國愛國護國爲前提，故教育亦以此爲前提。他于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對雲南省會中等以上學校員生講話說：

「國家和民族便是我們最實際最重要的「大我」；我們個人這一個「小我」，必須仰賴國家民族的扶持教養，然後才有生存發展之可能；亦惟有求整個國家民族的生命能够進步和發展，然後個人纔能得到真正的進步和發展。所以惟有將我們個人的生命貢獻于國家民族，然後我們的生命纔能發揚光大悠久無疆。你們要曉得，現在大家可以在學校裏受很好的教育，這是國家爲你們所設備的，……所以從國家或民族方面來講，我們做人的道理，就是：既做了人便要做一个良好的國民，便要盡忠于國家，要犧牲個人來報效國家和民族，以盡到國民的責任。我們現在所要學的，就是這個爲國犧牲的基本道理和如何發揮犧牲的效力之一切問題。就教的方面來講，我們教學的目的，第一步自然是要教他在天地之間做一个真正的人，第二步成爲中華民國一個良好的國民，能够愛護國家盡忠于國家。具體的講，就是要使個個學生有濃厚的國家觀念和深刻的民族意識，絕對不是外國人，絕對不會做洋奴。充漢奸，並且能積極犧牲一己來



愛國家保民族。」

他講國家現代的生命力時也曾說：

「然則我們教人正確的目標究竟是什麼呢？就是要使我們所屬的部下學生——一切受我們教導的人——國民個個人都能够懂得做國民與革命的道理，成爲有用的人才，或成功爲現代的國民；要使他們共同一致爲國犧牲！向立業的光明大道努力前進。使我們的國家和民族能够轉危爲安，轉弱爲強，轉貧爲富！」他於字裏行間，深切的流露國家民族的觀念，視教育爲愛國家愛民族之重要的方法。

#### 四 人生或人才教育論

然而他講教育的目的並不限于一班人所謂的狹隘的國家主義的國家觀念。他極重視做人的基本道理。他以爲先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然後方配做一個良好的國

民。良好的國民建築在堂堂正正的人之上。造就堂堂正正的人是教育的最基本的工作。教育先應將這種基本的工作作好，然後才可以談到其他。他于民國二十四年對雲南省會中等以上學校員生訓話：

「天地父母既生下我們，既做了一個人，我們便要做一個真正的人，不愧爲天地父母所生我這個人。……大家要曉得，雖然宇宙是無窮大的空間與無限長的時間之結構，而我們個人的生命却渺小如滄海之一粟，短促如曇華之一現；然而無窮大之空間，却是我們的舞台，無限長的時間，却是我們的旅程。宇宙萬物，都是爲我們而生，待我們而用，所以我們就是宇宙的主宰。我們要征服自然，利用萬物來增進全人類的生活。惟有如此生活才可以找到，並增加我們人生之意義與價值，以至于無窮大，無限久。」

他于講救國的基點中說：

「我們要救國，一定要先救民。要救民首先就要使一般國民知道做人的道理

能够照着做人的道理來做成正堂堂的一個「人」！而且要做一個完完全全的「中國人」！……我們人之所以爲人，是因爲他有特殊的性靈，有他生活的目的，知道做人的道理，能够發揮人類高尚的習性，向着高尚的目標邁進不已，而自覺自主的做一個與禽獸不相同的所謂「人」。……要救中國，一定先要救中國人，即是要使中國人個個能够知道做人的道理，做成一個正堂堂的人！

做人的教育本是最基本的教育。教育的對象是人。自來有許多教育家倡人生教育或人本教育，惟他們忽略了國家的觀點。蔣先生所提倡的人的教育或人生的教育，乃是以國家爲前提的，換句話說，即期教育造就良好的人以爲國家之用。故這種人或人生教育，可以說是人才教育。由此可知蔣先生之注重人才了。

歷來革命的成功或失敗繫於人才的有無，因爲革命是人作出來的，有人才撐持，其革命可成功，否則失敗。蔣先生重視人才教育，乃由於體驗革命經過之結果

。他極慨嘆人才之重要。他時時以認識人才，訓練人才，選拔人才爲要務，以期能于中國革命有較大的貢獻。

## 五 訓練論

但是人才或志士或愛國之士從何得來？由於訓練。訓練本是教育的項目之一。教育的含義較廣，訓練的含義較狹。教育有順其程序，循序漸進，因勢利導，因材施教之意，這是緩慢的漸進主義的教育。訓練有速求其成，急略功效之意，這是急進的教育。前者好像是由下而上的漸進教育；後者好像是由上而下的速成教育。處在一個變革的或革命時代，實施緩進教育，遠水不能救近火；實施急進教育，於事有濟。故革命時期多用速成教育，換句話說，多採取訓練主義的教育，以期在一個較短的時期，召集一班革命幹部，實施某種嚴格的有目的的短期訓練而達到某種預定的目的。蔣先生看準了這個意義，故重視訓練的教育，歷次軍官訓練團以及中央

軍政各種訓練班之組成，均是爲的從速造成革命幹部或軍事政治人才。

他所重視的訓練，有點與洛克所提倡的形式淘汰相似。形式淘汰是預定一個目標，使學生嚴格受此淘汰。而此淘汰之形式可轉移於另一事物，換句話說，即學生如受了此種淘汰而成功，則於彼種淘汰亦可成功，如一學生對於數學有淘汰。則其治文學或其他科學亦可成功。蔣先生所重視的訓練雖不是希其受了此種訓練而冀其於他種訓練有所成就。但他預定一個目的，期由某種訓練而達到，並且這種訓練是普遍的，是一般的，無論學習者的程度如何，均須在共同目標之下習此課程，以期獲得同一的水準。發展個性的教育在這裡似乎是不用了。但是個性或天才在同一水準目標之下却可獲得相當的發展，那就是訓練之中的領袖的教育。他舉辦各種訓練班或訓練團，是在此種原則之下進行的。

蔣先生於民國二十二年在廬山軍官訓練團第一期開學時訓話說：

「我們此次所召集未受訓練的學員，既來到這個軍官團受訓練，就不好再把自

已當作一個官長，這個觀念，一定要改變！要把自己當作一個初入伍的新兵或是一個初進學校的學生；要抱定這個當兵或入學的新觀念來進這個軍官團！來受這次特別的訓練」。

他又於另一次訓話說：

「由這兩星期訓練的結果，我相信你們雖然因為「時間」過於短促，對於學術科沒有多大的進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現的儀容，態度，動作，比兩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就這一方面講，我相信，這兩個星期的功效，至少可以抵到普通學校裏紙上談兵的兩年工夫！因為我所有的精神，和一般官長所有的精神，你們各學員已完全接受，得到了。所以這一次，我們軍官團實施訓練要注重的東西，技術還在其次，最要緊的就是精神」。

短期訓練的目的不在智識技術而在精神，因為時間過短，對於智識技術無法訓練，至精神則是短的時期所能提示興奮的。由此蔣先生重視教育是訓練主義亦即重

視精神教育。精神不死，革命可成，國家可救。

## 六 人格或道德教育論

講到精神訓練自不能不提到人格或道德教育。人格或道德教育是精神教育的高表現。一個人的精神是否能發展得適當，要看他們的人格或道德表現如何。所以重視精神訓練的教育家，無不提倡道德或人格教育的。尤其在人慾橫流，廉恥喪盡的現代中國，非提倡人格或道德教育不足以挽救國家的危亡，民族的衰頹和社會的解體。蔣先生於「爲學做人與復興民族之要道」中說：

「現在要告訴各位教與學的一個根本要旨，就是：在一切學術技能之先，要修養我們的精神道德，以養成完美的人格。因爲精神道德是一切學術技能的根本。一個人如果沒有精神和道德，任他有什麼好的學問和本領，都是無用，對於國家民族，一點也沒有效益；而且一切聰明才智，反可資爲濟奸作惡之工具，

對於國家社會格外有害。再就國家而言，一國的國民，如果精神奮發，道德高尚，則其國家雖屬貧弱……必能於最短期間，轉貧而富，轉弱為強。反之，一般國民如果精神萎靡，道德墜落，則其國家雖云富強，亦不能心悅誠服，而長保其繁榮強盛。所以我們現在無論為學教人，無論要挽救國家復興民族，都要首先發揚我們民族的精神，提高我們國民的道德。因此我們的教育應以養成學生之健全人格為第一義。而一般學生也應自動的特別注重人格的修養。……從今以後，我們要自救救國，一定要從提高國民道德做起；而要提高國民道德必先改良教育。欲改良教育，必先端正學風；要先端正學風，必先將特別注重訓育——即注重學生的人格訓練。具體的講，就是要使學生明白做人的道理，能够「孝父母，敬長上，愛國家，保民族」，能够「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能够「盡忠孝，行仁義，重信義，尚和平」，必須如此然後可以做人，可以做中華民國一個現代的國民。……精神道德為基本，學術技能為末



務。「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 七 團體教育論

但是人格或精神教育是注重團體性「羣性」的呢，還是注重個性的呢？人格或精神教育之最高表現是團體性的。因為訓練人格或人的精神之最高目的是救國，是愛民族，是護衛祖國；精神訓練如不能發生團結作用，則其教育為失敗。所以蔣先生說：

「我們中國何以會弄到現在這樣內憂外患，相逼而來，危急存亡千鈞一髮的地步呢？就是由于全國的軍人精神不能團結，力量不能集中。過去軍人團體，……

……其目的無非軍人關係互相勾結，同惡相濟，朋比為奸而已。所以這種團結，只能算是自私自利禍國殃民的小團體，而不是大公無私救國救民的大團體。……

……所以我們現在要挽救國家，復興民族，必須首先將全國各地一切自私自利的

小團體完全打破，使全國的軍人結成一個大團體！我們創辦軍官團和大家進到軍官團來受訓的目的，就是要統一意志，團結精神，集中力量來完成革命」。

「軍官團不僅是我們全國軍人的唯一的大團體。也可以說是我們全國軍人的大家庭。……軍官團的大生命就是我們各人的生命之總和。所以我全國軍人的生命是整個的，共同的」。（見峨嵋軍官訓練團之意義及其使命）

但是人格或精神訓練的基礎則是個性的，因為個性教育是真實的教育，是基礎的教育。個人訓練健全則團體才能健全；個人訓練有失敗，則團體訓練必然失敗。

俗話說：「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蓋為孝子者必可以為忠臣，因其個性已有相當的訓練之故。蔣先生時常提到個人訓練或自我訓練之重要。他于每次接見部下或學生時，尤能觀察求見者之個人心理，態度與慾望，常能因人施教，分別指示：有的鼓勵，有的誥誡，有的獎賞，有的責罰，均能使受訓練者心悅誠服。

## 八 文武合一教育論

教育的對象是人。教育以人格的完全發展爲目的。但要使人格完全發展，則必實施完全的教育。在昔，因爲人類生活簡單，教育項目比較單純，故當時教育，是文武兼施，學術並重。後來因爲人類生活日趨複雜，教育項目比較繁多，馴至文武分途，學術異轍。但是無論人類生活如何複雜，其統一性，整體性的發展的要求，必然古今如一，因爲破裂或偏畸的發展，在人性教育是不許可的。所以近代因爲生活複雜而實施文武分途的教育是不合理的。實施這種不統一性和破裂性教育之結果，其影響所及，一面使個人人格分裂，生活單調與痛苦，一面使國家社會發生分裂的和歧異的現象。固然我們一方面要注重分工合作之原則，但是一方面不能忽略人格之統一或調和之自然發展。蔣先生深知健全人格的發展在實施健全的統一教育，故倡文武教育合一論以爲當今教育之指針。他說：

「從前我們古人教人，無論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都是文事與武藝並重，文武合一，術德並修。不僅要使受教育的人懂得文事，並且要使他懂得

武藝。……可是現在的教育，忘掉了這個最緊要的道理，文武完全分途，文人  
不學武藝，武人不知文事；馴至養成重文輕武的惡習，結果，每個人最多只知  
道一半的道理，因此就沒有完全的學問，也沒有完全的人格，不能完全盡到做  
人的責任；所以我們社會國家就要弄到現在這般積弱的情形和危亡的地步！大  
家要知道！現在世界凡是一等強國，他們的教育，未有不文武合一，而並重兼  
修的。……尤其是現代各新興國家，如德，如俄，如上，更無不首重武藝。……  
……所以他們能够發揚剛健強毅的民族精神，造成磅礴偉大的民族力量，完成他  
們復興民族的事業。由此可見，我們要做現代的國民，要從衰敗危亡之中復興  
我們的國家民族，就要矯正過去重文輕武的惡習，恢復古人文武合一的教育；  
要使全國同胞，無論男男女女，都有武藝，都能自衛國家」。

他主張學習武藝要從鍛鍊強健的體魄入手。其實行方法的最重要的原則便是要  
和自然界「日光，空氣，水」這三件東西奮鬥，他並說重武藝應注重武藝的精神，

那便是古人所謂「智，信，仁，勇，嚴」之武德。

講到文武合一教育的內容，他使舉出「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的教育。他將這幾種教育詳盡解釋。

他于講「救國必須實施文武合一之教育」末後說：

「我們要能教導一般學生部下乃至一般國民都能成材，第一，先使其與自然界奮鬥，鍛鍊他們的體魄；第二，要教以「智，信，仁，勇，嚴」之武德；第三，要以古人所謂「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爲其主要內容。如果教育能照此實施，那便是最完備的文武合一的教育。也是最完備的救國家救民族的新教育」。

蔣先生不但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一個偉大的教育家；不但是一個偉大的教育事業家，而且是一個偉大的教育理論家。他在教育理論上能啓示我們以若干的真理。他從偉大的教育經驗中，宣示我們以真正確切的教育理論。我們研究他的

教育理想，知道他在教育史上是不朽的！何況他對於人類的貢獻，不限于教育，更  
不限于教育理論？

## 蔣介石先生的教育思想

### 一 緒言

我們可以說，蔣委員長不但是位偉大的軍事家，而且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我們更不妨進一步說，委員長事業上的成就，固然是賴於他的軍事的天才，但尤其因為他有一套系統的教育哲學。我們要了解委員長的人格，最先對於此點應有明確的認識。我們若能了解教育家的委員長，我們即能了解軍事家的委員長。

委員長對於教育理論，實有透澈的研究與了解，他在教育上有獨到的見解，他的教育思想目成爲一整個的系統。他在教育方法上也有他自己的主張與辦法，可是在教育上的這一切見解，主張，思想，辦法，都是由他自己的研究與體會得來，他並未抄襲歐美教育家的學說，他對於西洋教育思想似乎也沒有多少了解。但他的

教育思想，却與歐美最進步的教育學說，不謀而合，而且有獨到的地方。因為他的教育思想是由他自己體會得來，所以他的教育主張，最適合中國特殊的國情，絕非一般抄襲的歐美教育思想所能比擬。我所以尊稱他為中國偉大的教育思想家，即由於此。中國的教育理論家不為不少，但他們所講的，差不多全部是歐美的教育學說，能够探溯中國的歷史，根據中國的國情，另外創一套適合國情的教育思想者，似乎尚無其人。有之，當自委員長始。

但是委員長的教育思想，並不純是他腦中思想的結果，而是他的豐富的經驗的結晶。他的教育主張，沒有不可以實施的，因為本來即是他的實施的結果。委員長雖然是一個革命家，但他實在是一個教育家，他的革命事業，即建築在他的教育事業之上，所以他的革命的成功，即由於他的教育事業之成功，所以由成功教育事業得來的教育經驗，當然是最可寶貴的，他的教育思想之價值，即在此點。我們且看委員長自己的話：



「中正現在雖說是帶兵，似我實在是辦學校的，以教育界自居；從前在廣州創辦黃埔學校，現在在南京辦理政治學校，與軍官學校」。〔救國的教育二十一年十月對武漢教育界訓話〕

由上述的兩點，所以委員長的教育思想形成了一個特殊的體系，而此種體系，在理論方面，有確切的根據，在實行方面，亦有經驗的驗證，所以就內容無論，實在可以當得「博大精深」四個字，尤其是在實施方面，最切合中國現在的國情。我們尚不見中國教育家們自己有一套適應現代需要的教育理論體系，我們尚不見中國教育界有一套適合國情的教育方法，所以我們對於委員長的這一套教育思想，應加以深切的注意與體會。尤其因為委員長的教育思想體系，是由親身經驗得來的結果，尤其因為這體系是使他事業成功的基本原因，所以凡是中國的國民，尤其是各方而負教育責任的人，應該虔誠地授受他的教育思想體系。

委員長的教育思想，雖然自成一個整齊的系統，但委員長自己，並未將他的教

育思想作一個系統的發表。在委員長心中，確有一個系統存在，可是委員長發表的，都是一些零碎的講演，讀者或聽者要想在他的講演中尋出一個教育思想的體系，是頗為困難的，這在了解並且準備接受委員長教育思想體系的人，不能不認為一種缺憾。所以作者費了很長的時間，將委員長關於教育的講演，（以及普通的講演）加以整理，替他尋出一個系統來，以便國人的研討。不過委員長的教育思想，內容非常豐富，本篇所述的體系，不能全部包容，只能論其大概。再則，委員長在教育上固然提出了許多新主張，但對於此等主張在學理上的根據，有時缺少發揮，同時，具體的辦法，委員長在他的講演中，有時亦很少論到，在這方面，作者擬代他略加補充，使其成爲一個更完備的教育思想體系，不過此地爲篇幅所限，關於這兩點是無從論到的；甚至敘述委員長的教育思想，亦不能盡量發揮，這是要請讀者原諒的。

一種實用科學，其理論體系總不外目的論與方法論兩方面，尤其是在教育上，

這種體系尤其顯明。我們要整理委員長的教育思想，最好也依照這種系統，分爲目的論及方法論兩部分。而關於目的論方面，委員長的發揮特多。

## 二 目的論

在委員長的教育思想體系中，關於教育的目的，他有許多重要的意見及新穎的主張。我曾將委員長的講演，詳加分析，發見他對於教育的目的，他由兩方面觀察的，即就個人方面與國家方面，他確定了教育的最大目標。換言之，由個人的與國家的立場而論，他認爲教育是不可少的。

就國家的觀點而論，委員長承認教育是一種最基本的救國力量。在委員長的看法，國家是一個最發達的有機體，其中最重要的原素爲人民，土地，主權三種，但縱有這三種原素，假若缺少推動的力量，國家仍不能發揮其最高的理想。試看他說道：

「國家的要素有二，第一是人民，第二是土地，第三是主權所由運用的政府。但是……如果單有這三個要素，沒有原動力來推動一切……當然不能算是現代的國家……現代的國家，必須有他內在的基本原動力，來不斷地推動一切，改進一切，創造一切，使國來的生活作有計劃的進行，國家的生命能無限量的發展，這種原動力，就是國家的生命力。這個力量的消長，就是民族的盛衰與國家的興亡之所繫。惟其有如此重大的關係，所以我們要想建設一個現代的國家，不可不先將現代國家的生命力認識清楚，從而謀所以培養充實增長加厚之道」。（現代國家的生命力）

國家的生命力，既然重要，那麼這種生命力，究竟是什麼呢？在委員長的意思，便是教育，經濟，武力。所謂武力，「乃包括國家所有的國民，人人應參加戰事，致力國防，所有一切的物質，那怕一草一木，皆為戰爭與國防之所需，莫不為武力之要件」。（見同上）所以武力是包括人與物兩方面而言。所謂經濟，委員長會

提出五個培養充實現代國家經濟力的要則，而用總理所說的「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四句話概括。至若教育，委員長認為即包括「智」「德」「體」「羣」。尤其緊要的，則是羣育，因為這是「中國一般國民所最缺乏的習性」。見同上。委員長說道：

「總要先使一切受教的人認清是自己在團體在社會與在國家中的地位和責任，養成大家隨時隨地相親相愛，分工合作，羣策羣力來做事的習慣；再使他身體能夠強健……當然他的道德可以高尚起來，智識能力也可以增進起來，做一個完全的現代國民了」。（見同前）

上述教育經濟武力三者，即是建國的三個基本，委員長認為：「只要大家能照我所講的這些道理切實苦幹，我相信必能在最近的將來，建設起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可以復興民族」。（見同前）

不過在委員長的意思，仍承認教育的力量最為重要，他以為武力和經濟的發展

，須賴於教育的發展，教育是武力與經濟的基礎，沒有良好的教育，即不能有良好的武力與經濟。他說道：

「尤其辦教育的人，格外要了解，因為教育差不多是一切事業的根本，而與經濟武力的連環關係，尤為密切，必須互相聯絡，彼此貫通。亦可以說教育是經濟與武力相聯繫的總樞紐，所以必須以發達經濟增強武力為教育的主要方針。現在一般辦教育的人，……很多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整個教育失了功效」。（全國總動員的要義）

總之，他承認教育是一切的根本，教育沒有改良，教育若無進步，則一切建設都談不到。這種意思，他在許多講演中都提到。例如在救國的教育一講演中，委員長說道：

「……現在這個危急的局面，如何挽救，整個的社會國家，如何改造，這當然是革命黨和政府的責任。不過要一個國家改造得好，要政府和黨能夠有力

量，達到實現主義的目的，最要緊的，還是要教育界共同努力，以教育來救中國」。

「當然救國只要有決心，有血性，用各種方法都是有效的。……然而其中最容易最有效的，莫如教育」。

「現在我們要救國家，惟有教育界最容易實行，而且教育界的責任也最大」。

那麼教育爲什麼有這樣大的力量呢？在委員長的意思，認爲國家的興亡，最根本的原因，即決定於一般國民在精神方面的教養。假使一般國民不知愛國，不知爲國家服務，不知抵抗強敵，甚至爲敵人奸細，簡言之，假使一般國民的文化程度低下，民族復興是絕不可能的。他說道：

「須知復興民族國家的根本問題，首要還在改造國家的風氣，和國民的心理，方能使民族的國家復興，一般國民的心理振奮，要達到這個目的，就非從

教育入手不可。教育如果不能改造，或者沒有進步，那麼，國家和民族就永遠不能有進步，並且還有危亡的危險」。（見同前）

委員長且將中國一般國民的教養，與外國相比，覺得中國根本的失敗，亦由於教育的失敗。所以他說：

「兩相比較一下，中國自己一般的教育，就覺得差得多，不及他們外國，所以結果還要受他們的欺侮和侵略。所以我們要救國，根本還在教育」。（教育界的責任與今後教育的方針）又說：

「我以爲今日日本能够獨霸東亞，侵略中國，而我們中國反要受他的壓迫侵略，其原因大半皆在此教育優劣的關係」。（救國的教育）

那麼，改造社會風氣，培養國民心理，爲什麼即能達到救國的目的呢？因此，我們便論到委員長的另一種主張，即由個人方面，說明教育之必要。

在委員長的意思，認爲每一個人，既然生而爲人類的一分子，國家的一國民，



便應該盡其所以爲人的道理。委員長以爲我們人生的意義，可以從宇宙，國家及社會三方面來看。從宇宙方面而論，我們父母生我們下來，並不是偶然的，實在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們不能以我們個人的渺小而忽視個人的意義。再則我們父母扶養我們，費了很多的心血，我們對於父母的辛苦，應有相當的報答。如何發揮我們在宇宙中的意義，並報答父母的恩惠，全視我們個人的努力而定。委員長有一段精采的講話：

「……雖然宇宙是無窮大的空間與無窮大的時間之結構，而我們個人的生命却渺小於滄海之一粟，短促於曇花之一現，然而無窮大的空間，却是我們的舞台。無限量的時間，却是我們的旅程，宇宙萬物，都是爲我們而生，待我們而用，所以我們就是宇宙的主宰。我們要征服自然，利用萬物，來增益全人類的生活，惟有如此生活，才可以找到並增加我們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以至於無窮大，無限久」。（爲學做人與復興民族之道）

第二，就國家或民族方面而論，我們每一個人，必須仰賴國家民族的扶持教養，然後才有生存發展的可能，亦惟有來整個國家民族的生命能够進步和發展。然後個人才能得到真正的進步與發展。所以一個人「既做了人，便要做一个良好的國民，便要盡忠於國家，要犧牲個人來報效國家和民族，以盡到國民的責任。亦惟有將我們個人的生命貢獻於國家民族，然後我們的生命，才能發揚光大，悠久無疆」（見同上）

第三，就社會方面而論，我們個人的生存，更是賴於與大眾的合作。所謂「一日之所需，百工斯為備」，個人生活之維持，全賴於分工合作，協力互助。「一個人離了社會這帶的關係，生活不能繼續，生命亦無法發展，因為孤獨的生存，在人類幾乎自始即不可能」。所以：

「我們既做了一個人，便當對於社會有所貢獻，為社會而勞動服務，以促成社會的進步，增進公共的福利」。（同上）

總括一句話說，一個人必須抱定確定的人生觀找到人生的正鵠；然後始不致做一個人。這個人生觀，即是委員長所常說的兩句話：

「生活的目的，在增進全體人類的生活；生活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

那麼我們怎樣使個人盡其在宇宙中，在國家中及在社會中的責任呢？如何才能使一個人的征服自然，利用萬物，不致忝爲人類呢？如何使一個人能犧牲了我的幸福，是國家民族謀利益呢？如何使一個人在社會上能有所貢獻，並且互相通力合作，以謀社會的進步及發展呢？唯一的方法，當然只有教育。沒有教育的方法，我們絕不能使一個人的精神與行爲發生改變。沒有教育，一個人必定成是一個無知無識自私自利的野蠻動物。所以委員長說道：

「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使得受我們教導的人都能成爲一個「人」，並且使他自已知道是一個「中國人」，對於國家應盡到做主人翁的一切責任呢？這

個方法，當然也不止一端，最重要的還是教育。教育中最要緊的一點，就是要使受教育的人先認識我們教他們的幹部決不會隨隨便便污穢卑劣，偷懶苟安，頹唐腐敗沒有人格的人，而後再使他們知道他們的祖先，他們的歷史，他們的國土，他們的民族之由來，指導他做一個現在時代的一個人，就是現在的國民。」（救國的基點）

在另一篇講演中，委員長又說道：

「我們教學的目的，自然是教他在天地之間，做一個真正人；第二步，成爲中華民國一個良好的國民，能够愛護國家，盡忠於國家。具體的講，就是要使個個學生有濃厚的國家觀念和深刻的民族意識，絕對不是外國人絕對不會做洋奴充漢奸，並且能積極的犧牲一己來愛國家，保民族。」（爲學做人與復興民族之要道）

上面委員長就國家及個人的兩個立場，來說明教育的必要，並且即決定了教育

的目標。委員長對於教育的這種看法，正與歐美教育哲學家的思想不謀而合，我們知道，向來歐美一般教育思想家討論教育之必要，都是根據個人與社會的兩個觀點，我個人方面敘述個人在未成年時期內經驗能力之缺乏，以證明教育之必要，在社會方面，則敘述文化傳遞之必要，證明個人必須負起此種文化的責任。而委員長的看法，亦是根據個人與國家兩個立場，而討論個人方面，處處着重其在社會與國家中的責任，我覺得較諸一般教育思想家更進一步。

根據上面兩個觀點，委員長因此決定教育的最大目標，即在「做人。」關於「做人」的意義委員長在許多講演中發揮得非常詳盡透澈，此地因限於篇幅，不便詳述，但總括起來不外下列幾個要點：

第一「做人」便是發揮人之所以為人的特徵。因為「人有他的特殊情性，有他生活的目的，知道做人的道理，曉得人和禽獸的分別，能够發揮人類高尚的習性，向着高尚的目標邁進不已，而自覺自主的做成一個與禽獸絕不相同的所謂「人。」

如果不知道做人的道理，便是爲「人」的形式，而無「人」的特質，便不能算是一個人」（救國的基點。）

第二，一個人不僅發展其「人」的特徵，且應該成爲一個真正的「中國人」。因爲現在中國的衰弱，完全由於每一個國民不知道他自己對於國家應盡的責任，毫無國家的觀念「現在我們中國一般國民，……就是曉得自己是「中國人」的，恐怕也十不得一，……所以不愛國，不知道自己對國家有何責任，更不能來救中國。」所以「要救中國，一定先要救中國的人，即要使中國人個個能够知道做人的道理，做成一個正正堂堂的人，而且要使我們個個人認識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救國的基點）

就此點而論，委員長對於現在的教育有極嚴格而精到的批評，他以爲現在的教育，關於做人之一點，完全沒有顧到，只注重知識的傳授，而不知改善學生的行爲，培養學生的精神，結果，不惟學問無處使用，且亦無人用他。（救國的教育）因

爲學生在行爲及精神上沒有相當的訓練，所以在家庭中不尊敬長上，在社會上自私自利，在國家中不知盡其國民的責任，不守紀律，不重組織；簡言之，簡直沒有禮義廉恥。試問一個國家沒有禮義廉恥，還成爲一個近代的國家嗎？我們且引委員長的幾段精采言論：

「現在教育失敗的原因，就是對於學生的國家觀念，民族精神，公共道德，與及做人的實際生活，完全沒有注意，只注重在黑板上，書本上，教學生幾本書，這只可說是教，而不能算是育。」（救國的教育。）

「照現在的教育現狀說，已經畢了業的學生，變成一個識字的高等流氓，不僅不能爲國家來效力，而且還來擾亂國家；至於在校未畢業的學生，又是今天不上課，明天打先生。以國外人目光看來，這種學生的習慣，就是無異於亡國奴的習慣，幾乎不能算是一個人，更不像是教育的國民。」（見同上）

「現在一般教師皆不注意到學生做人的道理，所以學生出校之後，只知道教他

物理化學，算術，和外國文，挨到三年五年畢業，就算了事，這實在不算得是教育。」（見同上）

「我們中國現在的教育，無論大學，中學，小學，統統都不注意日常生活，以致現代的學生青年，不僅不能得到切實的學問知識，而且連吃飯穿衣都不會。」

再則遵守紀律注重組織的精神與習慣，也是做人最初入門的道理，「但是我們中國一般教育界却沒有注重這些最緊要的東西來教育學生，所以中國教育完全失敗。」所以委員長最後說道：

「所以現在的教育不是救國愛國的教育，而是亡國的教育，不是現代文明國的教育，而是落伍的教育。」（教育界的責任與今後教育界的責任）

所謂「做人，」即是大學中庸上所謂的「修身。」我們知道，總理的三民主義，都是根據於中國固有的倫理思想，而委員長尤能繼承 總理的遺教，將中國固有



的倫理思想政治等哲學發揮光大。委員長對於大學中庸尤其推崇，認爲是中國最好的政治哲學。關於學庸的解釋，亦頗多獨到之見解。委員長認爲：「大學中庸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段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揮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什麼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知識中獨有的寶貝，是應該保存的，」（大學之道）因爲大學一書，即講一個人如何做人與做事的道理。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據委員長的解釋，所謂「德」，即是一個人生下來賦有的德性，一個人的本性，我們只消把這種先天的德性，發揮光大，照着自然的法則，任其自由發展，換言之，即發揮一個人所以爲人的道理，達到「明明德」的境地，一個人即不忝爲一個人。（所以照此說來，委員長是主張人性本善論的，關於此點，有暇當爲詳論。）所以大學裏面講，一自天下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即是說，不論任何人，只要是具有人性，他就應該「修身。」

那麼怎樣「修身」呢？在大學上講，必須「正心」「誠意」。因為一個人的思想行為，皆以心為主。故必存養省察，使此心常湛然虛明，不為物慾所蔽，不為感情所勝。不然便難免流為貪愚迷妄，甚至放僻邪侈，一切的錯誤罪惡，都由此而生了，所以正心是修身的根本工夫。」（大學之道）所以委員長主張一個人的教育，必須從心理改造起。一個國家的國民，在精神方面若沒有相當的改造，這個國家絕難復興。所以委員長道：

「今後我們要使革命完成，使國家民族能夠復興，第一步即須注重精神的建設，換言之，就是人民心理的建設。我們能够社會上已往一切頹風惡習，掃除淨盡將人民新的心理新的風習建設起來，我們革命才有緊穩健全的基礎，國家民族，才有復興的把握。」（四川應作民族復興之根據地）

關於此點，讀者應該注意的，就是委員長對於精神的重視。在委員長的意見，認為一個國家的建設，物質方面固然要緊，但精神的建設，尤其重要，個人的心理

不改造，國家無論如何不會強盛。因為就任何方面而論，精神總是勝過物質的，一個軍隊若有主義，有信仰，即使軍備稍差一些，也往往可以獲得最後的勝利。所以委員長說：「建設事業，可以大別之為物質的精神的兩種，普通人只注重物質的建設，忽略了精神的建設，所以一般人民習於腐敗頹唐，放僻邪侈的惡風氣，人心陷溺日深，社會國家一切事業因此建設不起來，所以革命經過了二十四年，還不能成功。」（四川應作復興民族之根據地）

但是委員長亦不是唯心論者，單注重精神而忽略一切物質，關於此點，委員長曾有詳細的說明與解釋，以免一般人的誤會。（參着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因為委員長的思想，是根據總理的心理建設的學說而來的，關於此點，委員長亦有詳盡的發揮，此地因限於篇幅，不便敘述。異日有暇，當另文詳論。

個人的修身，既是教育的主要目標，而修身的要點，又在心理及精神的改造。那麼我們怎樣從事心裏的改造，才使一個人盡其為人的責任，又對國家有貢獻呢？

照委員長的意思，即在恢復中國固有的道德，尤其是『禮義廉恥』四德。因為禮義廉恥四德是我們中國固有的道德，亦即是我們中國所以才能成爲世界上最悠久民族的基本原因。總理講得很明白，東方民族——尤其是東方民族之代表的中國民族——就是在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八個字下面成功的，這八個字就是我們中國民族固有的美德，也就是我們中國文化的神髓。而總理與三民主義，即是東方精神文明的產物，亦即是中國的國魂。（關於此點，異日另文詳論）從前有一次，總理與蘇俄代表見面時，當時蘇俄代表第一句話就問總理，『你的革命哲學的基本是什麼？』總理回答說：『我們中國有一個傳統的精神，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遺傳下的固有道德，我就是繼承這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的道德：我就是中華民族固有的精神。』所以委員長說道：『這就是三民主義所從而發源的，三民主義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留傳的大道，亦即是中國政治倫理哲學的基礎，就是要以中國固有的精神來革命，來治國家，來平天下。』（進德修身業與革命之途徑。）現在國

家的建設，即在實現二民主義，亦即在復興民族。所以我們唯有實踐我們中國固有的道德，尤其是實行「禮義廉恥」的教育。委員長說道：

「……我們中國民族得天獨厚，固有文化特別高尚，爲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所不能比擬。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八德，實由於我民族「仁，義，智，信，」之天性，由我們祖宗一代一代的遺傳下來，已發揮盡致，涵養純厚，成爲所謂良知良能，與技能之必須由外界得者，完全不同。只要我們將這種醇厚高尚的天性充分的發揚出來，——就個人言，便可以成爲完全的正正堂堂的國民；就國家民族言，便可發生極偉大的精神力量，而成爲最優秀最強盛的民族。此種精神的力量，惟其係根於天性，由內心發揮出來的，故其力爲無形的力量，亦是無上的力量，爲任何物質的力量所不可抵禦。……獅虎乃至任何禽獸，都要受制於人，就是因爲人類在體力之外，還有超於一切物質力量之最偉大的道德精神的力量。道德精神較高尙的民族，必可征服道德精神較低的民族。……所

以國家只靠有武力，都不過是表面很有限的力量，不是真正的根本的大力量。……因此，教育的根本，不單在……一切技能和學問，而在首能够恢復我們民族固有的道德與精神，使受教的人，盡其天性，致其良知，然後所學的一切學術技能，才可以發揮最大的效用，爲國報效。」（軍隊教育的要旨）

上面一段話中，有幾個很重要的觀念：第一，精神道德勝過一切物質武力；第二，我們中國固有的道德，已成爲我們的天性；第二，教育的責任，即在盡量發揮此種天性。論到這一點，我們便應該注意委員長關於「致良知」的主張。

因爲委員長承認我們民族固有的道德，已成爲我們的天性，所以委員長主張我們的教育即在「致良知。」不過「致良知」三字的主義，並不如一般人的解釋那樣簡單，委員長頗有獨到的發揮。第一，致良知的作用，即在發揮我們中華民族固有的良好道德，此點已如上述，但除此而外，委員長還有一種解釋，即所謂「良知，」是我們人人認爲正當合理的，亦即事理所當然；所以致良知，即我們實行人人

所認為對的。委員長有個警喻說：「現在就拿『愛國』說，我們知道一個人都應該愛他的國家，應該為他的國家來犧牲。愛國家，為國家犧牲，都是個人良心上認為應該做的事情，這就是致良知。……如惡惡臭，如好好色，這是好色與惡臭的良知，是人人所有的，不過要實在去惡好，這叫做致良知」、『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第三，既然稱為致良知，便應該去實行，所以委員長對於『實行』非常重視。他以為一般人的毛病，即在不重視實行，儘管知道得很清楚，而不去實行，結果雖然有很好的知，亦屬無用。總理發明『知難行易』的原理即在矯正國人向來不重實行的毛病。委員長尤其極力提倡『行的教育。』

委員長認為『行』是非常重要的。中國人的大毛病，即在明知事理很對，但不照着去實行，結果雖然真知亦毫無裨益，反而養成許多幻想空談，苟安偷懶自暴自棄浮偽虛妄的習慣，所以總理說：「吾黨之士，於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難免有信仰不堅奉行不篤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實多以思想錯誤而懈志也。此思想之

錯誤爲何？即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之說也。……此說者，予生平之最大敵也。」委員長關於此點，亦有極精透的說明。他的意思，即繼承總理的主張，且力證與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並不違背，他認爲我們的一切只有實行，只有幹，只有苦幹，實幹，硬幹，則任何事均有可爲。所以「致良知」三字，最重要的還在一個「致」字，假若對於事物已有正確的了解而不去實行，結果亦等於不知。委員長主張精神勝過物質，有人疑心他是唯心論者，關於此點，他即有切實的聲明，他說：「如果講『良知』而注重在『致』，」論良知而注重實行。那就不能算是唯心論者。」（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委員長且說明「致良知」與總理的「知難行易」說並不互相衝突，而且互相發明。因爲良知重在「致」字，即是要從各人良知到事物上去切實體驗，所以「致」就是「行」，「致良知就是證明『行易』，」就是要實實在在去做。委員長且認爲「知行合一」與「知難行易」都是反對從前知易行難，祇知靜而不知動的哲學，而注重在動的方面，都是注重在行的哲學。而所謂實行，亦即「篤行



「的工夫；一個人若能做到『篤行』的工夫，則一切事無有不可爲者，黨員若能『篤行』，革命亦無有不成功的。所以戴季陶先生在三民主義表解中，把『篤行』列做最基本的工夫。我們可以再引委員長的一段話：

「我們要實現三民主義，不是心裏如此想，口裏如此講就能做到，必須大家腳踏實地認真來實行，才可以成功，如果只是想，只是講，只是研究，都不相干，一概無用。惟一要緊的，是要時時刻刻實實在在去做，就是要力行。也就是我所講的『實幹，快幹，硬幹。』……如果不行，任你有很好的理論，多大的本領，都沒有用。所以『行』是成功的秘訣，行才能革命。我們的革命，到現在所以還未成功，我們的國家所以到現在還沒有建設起來，……就是因爲大家只知坐而言，不能起而行，更須有人能『實幹，快幹，硬幹。』」（對於本團學員之希望）

委員長因爲極注重行的哲學，所以他雖主張精神的教育，恢復固有的道德，衍

佛很空虛的樣子，其實照他的說法，禮義廉恥的教育，還是從基本的生活改善着手，因為禮義廉恥的固有的道德，除在日常生活行為中是無由表現的，一個人的行為，假使都能合乎禮義廉恥諸種美德，則其人的精神道德當然可以高尚。在許多講演中，關於此點委員長有充分的闡發，他們所謂基本生活，即衣食住行四項，而衣食住行的適當處理與表現，即是禮義廉恥。委員長以為假若一個人穿衣吃飯都不合乎一定規則，他的生活還能稱為人的生活嗎？至若革命事業的成功，當然是更談不到了。我們且引委員長的幾段話：

「我們要使得一個學生成為一個人，就不得不先教他知道實際生活，如衣食住行，人人日常所必需的生活。如果一個人，連衣食住行都不會，那還能教他什麼？所以我們對於受教的學生，除掉講堂上講授學問之外，而在課外校外

的生活，尤為重要。尤其是吃飯，穿衣，走路，住居，日常的實際生活，更應注意。我們中國現在的教育，無論大學，中學，小學，統統都不注意這些日常

生活，以致現在的學生青年不僅不能得到切實的學問和智識，而且連吃飯穿衣都不會！……這些日常生活，中國人以為不是教育重要的任務，而外國人的教育恰恰以此佔最重要的部份。」（救國的教育）

爲什麼日常生活的改善會如此重要呢？就因爲一個人的衣食住行，如能合乎法度，則其人處己對人，必能盡其爲人的責任，必能合乎確實，迅速，靜肅，整齊諸條件，在個人生活中必能修持謹飭，在家庭中必能敬長上孝父母，在鄉黨中必能睦鄰里，在學堂中必能守校規，在社會上必能合作互助，在國家中必能盡職忠誠。像這樣一個人，不是在家爲良好子弟，在校爲守規則的學生，在社會上爲盡責的公民，國家中爲愛國的人民嗎？

國爲在委員長意見，一個國家的重要要素，就是紀律與組織。假若一國的國民對於一切規則法令，不知遵守，所有的國民，毫無組織，有如一盤散沙一樣，則國家的內部必定非常混亂，什麼事業都不能舉辦，國家會能够強盛嗎？外國人常常罵

我們中國是沒有組織的國家，就是因為一個國家若缺乏組織與紀律，這個國家必然是混亂的。外國所以對中國積極侵略，其原因亦在此。所以委員長對於紀律與組織非常重視，在許多講演中他都有透澈的發揮，例如在革命軍人必需的元素一講演中，他方言紀律在軍隊生活中的重要，軍隊若有紀律，必可成爲節制之師，而操必勝之權。此外尚有許多精彩的言論，此地因限於篇幅，不便列舉。總之，我們中國人就恰恰缺乏守紀律與重組織的精神與習慣，什麼事隨隨便便，所以結果禮義廉恥，喪失殆盡。一個人既不願禮義廉恥，更加不守紀律不重組織，所以我們要使一般國民養成守紀律與重組織的習慣，即在提倡禮義廉恥，而提倡禮義廉恥的基本，即在一個人正正常當盡其爲人的本分，使他穿衣吃飯，行路及一切舉止動作，都合乎一定的法度。假若個個人民都能如是，國家不是很有秩序，則什麼建設不是都可以舉辦嗎？可是向來的教育，都不注重這些習慣的養成，只知傳授知識，結果每一個國民都不知道他對於社會國家的責任，這是過去教育的大失敗。可是我們要養成國

民守紀律重組織的精神與習慣，又非從教育入手不可，所以教育界的責任是非常重大的。關於此點，委員長有一段重要的講話：

「現在二十世紀的教育，無論你什麼主義的教育，如果要使國民來愛國保國，就都要先教他有組織有紀律，有精神；如此，才能成功一個國民。如果一個國裡的國民，無紀律，無組織，無精神，那就成了一個紛亂的國家，就要亡國，怎麼還能想他救國？什麼叫有組織有紀律呢？……在學校裏講這組織，就是要人知禮義，講守校規，就是要人知廉恥。然而日本人有校規，我們中國人也有校規，日本學校分班分組，我們中國學校也分班分組，可是中國學校就不大注重組織，更不注重紀律，而日本人真是常校規作紀律，以分班級爲最重要的模範組織，其違犯校規的人，爲無廉恥，其視破壞組織的人，爲最不道德。從此可知日本教育奏效的地方，不僅是學西洋的科學，而且拿西洋的組織，應用到我們東方的精神上來，尤其是我們中國固有立國的精神——禮義廉恥上頭來，所

以日本至今能獨霸東亞，壓迫中國。爲什麼日本人能守紀律，重組織，而我們中國人有紀律與組織不能守呢？這就是中國教育不注重紀律與組織的原故。換句話說，就是中國人沒有養成守紀律重紀律的精神與習慣。這組織與紀律是人人應該知道的，亦是做人最初入門的道理，但是我們中國一般教育界却沒有注重過這些最緊要的東西來教育學生，所以教育完全失敗。……我們教師最大的目的，就是要使學生明白來求學是來求學做人的道理。……做人的道理是什麼？照現在的話講就是「紀律組織」；如果拿從前的話來說，就是禮義廉恥。而要獲得禮義廉恥與紀律組織的效果就是在日常實際生活上做起。這實際生活，在現在的話來說，是衣食住行；若拿從前教育上的成語來說，就是「飲食起居」或灑掃應對進退而已。」（救國的教育）

右面一段講詞中，委員長對於現在教育的弊病及應取的方針，講述得非常明白，不容作者再費贅詞加以解釋。總之，歸根結底，教育的目標即在做人的道理，而

所謂做人的道理即是我們中國固有的道德，尤其是禮義廉恥。一國的國民，假若人人都知道做人的道理，即是中國一般國民的道德水準已經提高，能够守紀律，重組織，知道愛國保國，結果國家自然強盛，民族自能復興，我們所以說，恢復中華民族固有的道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即能實現三民主義，其理由即在此。誤解委員長的主張的人們，至此應能獲得正確的了解。（關於此點，委員長在許多講演中屢次說明，另文詳論。）

不過以上討論的教育目的，只說到委員長主張之一半。即亦偏重個人的修持方面，即僅指大學上，所謂的明明德。委員長認為明明德只是一種獨善其身的政策，很容易養成個人主義及自私自利的心理，仍非救國之道，我們應將我們所認為合理者，推而廣之，使一般民衆都和我們一樣，獲得心理的改造，此即大學上所謂的親民。所謂「親民，」應有兩種解釋，一是使民衆能日新又新進步不已的意思，一是親近民衆的意思，就前一種意義而論：「我們明德修身之後，便要推而廣之，將

一般民衆的一切舊的不良的不適於時代環境的思想風習剷除，使造成一種新的思想與風習，與時代要求和適應，以確保生存與發展。」（大學之道）就後一種意義論：「因為新民必自親民開始，如果不親近民衆，深入民衆中間，我們自己有好的思想道德言行，然無從傳授他們，感化他們。」（同上）簡言之，「我們對於民衆，要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漸磨之以仁義，教之引之，鼓之舞之使他滌除一切污習，使民衆的智能德性情神體魄，追上時代，日新又新。」（同上）這種親民的工作，亦即是西洋所提倡的社會教育，民衆教育。

那麼，怎樣去教導一般民衆呢？委員長認為唯一的方法，即是新生活運動。因為新生活運動的基本工作，即在改進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亦即使之合乎禮義廉恥，亦即着重在中國固有道德的恢復。所以新生活實在是一種教育工作，是一種社會教育工作，而且着重於生活的改進，所以也是一種生活教育關於此點，委員長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新生活運動的中心準則，救國先救自己，新生活的意義與目的，新



生活運動之解釋諸篇講演中有極詳盡的闡述，此地無庸詳述。總之新生活運動的意義和內容，就是「要使全國國民從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上表現我們中國禮義廉恥固有的道德習慣，來達到行動一致的目的。」所謂行動一致，即是紀律組織，而此乃是一個國家必備的要素。

所以如上所述，照委員長的意見，生活即是教育，生活的改善即是教育的工作。反之，教育的工作，亦不能離開生活。假若教育單着重智識與學問，而不貴實行，即與實際生活不發生關係，便不是真正的教育。而我們的生活，就其影響而論，即具有一種教育的力量，事實上，生活本身即是教育。所以委員長說「人之成否，固關係乎政教，而社會習尚所予人之薰陶鍛鍊，其效力迅速而普及，遠非任何政教制度所能比擬。」（新生活運動綱要）這是說明日常社會生活有一種教育的力量。在另一篇講演中：委員長更有明切的主張：

「所謂教育，不僅是學校裏上課教書，才算教育。學校教育，只是教育的

一種；此外隨時隨地，都有教育，整個社會，都是我們教育的範圍；一切的人，都是我們教育的對象，必須社會上個個人能够「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知道愛護同胞，效忠國家，才是我們教育的成功。」（建設新四川之要道）

「教育是沒有一定範圍的，並不是有一個固定的學校聘了幾位教員在講堂上教書，就算教育；整個社會或者說整個國家就是一個大學校。……因此可以知道無地不是教育的地方。……教育的方式，也並不一定要上課或上操，無論辦公廳辦公，進飯堂吃飯，在街上或鄉里走路，舉凡起居作息，無不是受教施教的時候；衣食住行無不是應教，應學的事物。」（全國總動員的要義）

委員長這種教育上的主張，實在是最進步的教育哲學，歐美一般大教育家的思想，也不過如是。我們且應知道 委員長這種思想，並不是從外國抄襲得來的，而是憑他的思考，繼承 總理的遺教，再加上自他自己的體驗得來的，委員長教育思想

之可貴即在此。我們尊稱 委員長爲大教育家，確實是很適當的。

總括以上所述，我們可以說， 委員長關於教育目的論方面實在有很豐富的創見。他先由國家存在的立場，證明教育是一切建議的基本因素，要建設國家復興民族，非盡力提倡教育不可。繼由個人的立場說明個人對於宇宙，對於社會，對於國家的意義，要使個人盡其各方面的責任，則必須教以做人的道德。可是過去的教育對於此點完全忽略，不能不認爲教育界的大失敗。至若所謂做人的道理，即是「明德，」教以做人的道理，即是大學上所謂的「明明德，」亦即是發輝我們固有的天性，亦即是王陽明所謂的「致良知」所謂良知，照 委員長的解釋，即是理所當然，亦即人人認爲合理的行爲。而我們中國的固有道德，即是人人認爲當然的事情，例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乃是我們中國數千年傳統的美德，差不多已成爲我們的天性教育者的責任。只消把這些天性盡量發揮出來就够了。人人若能養成種種良好的道德，即成爲良好的國民，知道禮義廉恥，知道守紀律，重組織，愛護民族，保障

國家，國家當然強盛，三民主義當然實現。因為就三民主義的來源考察，三民主義即是此等道德的結晶，所以若能實踐此等道德，即不啻真正從事三民主義之建設。但要恢復中華民族固有的道德，使一般國民明禮義，知廉恥，便須從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入手，因為禮義廉恥的表現即在行爲上，即在日常生活上，所以致良知當着重在「致」字上面。而就此點而論，過去教育又是失敗的，因為過去教育全不注重行爲的改良，而一般國民的通病亦即在此，所以日常生活的改良，不要說是教育上最大的原則，而且是矯正一般國民尙空談不重實行的唯一良藥。但是個人的修身，不過是救國教育的一部份，最重要的還在將此等道德去普及于一般國民，使所有國民的生活，均能有澈底的改善，換言之，即在教育上還有親民的工夫，亦即是社會教育，民衆教育。假若明明德與親民的工夫都能做到，結果當然「止於至善」，即最後的理想必可達到。而我們現在認爲至善的理想當然是三民主義，所以換句話說，三民主義的理想，在明明德與親民兩步工夫做到後，當然會實現的。

以上所述，是 委員長關於教育目的及少數基本原則的主張，雖然寫了將近一萬字，但 委員長尚有許多意見，還未提到，甚至本篇所述者，亦常常因篇幅的限制，未能發揮詳盡，請俟另文詳論。以下且就方法論方面，略加敘述。

### 三 方法論

要達到上述的教育目的，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方法呢？就此點而論，在一般教育理論系統中有教育工具，教學方法，及教育制度諸項。但在 委員長的教育言論中，對於上列各項，並未分別加以詳盡的闡述，似有待於將來的補充，現在姑就委員長的講演，摘取其可以屬於方法論的部分而為上節所未講的，略述於下。

在方法論方面委員長的言論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關於教育內容的主張。在委員長的意見，教育的內容，應該分為智德體羣四部分。上節雖說教育的基本，在日常生活的改善，但這不過是一個起點，不能說是教育的全部，我們要使一個國民成為

完全的人，便應該施以各方面的教育，使其具有救國必需的條件，而智德體羣即包含一個人的教育的全部。委員長說道：

「教育的種類雖然甚多，然而却有一種共同的根基，就是一切教育共同的要旨所在。這個共同的要旨是什麼呢？就是要使受教的人能夠竭力增進充分發揮其「智識」，「道德」，「體魄」，及「羣性」，即所謂智德體羣四育。智育就是知識技能的養成，德育就是品德人格的提高，體育就是精神體力的增強，羣育就是團結親愛互相合作的習慣之養成。這一點是我們現在中國一般國民所最缺乏的習性，又是今後建設新社會新國家所最必要的條件。總要先使受教的人，認清他自己個人在團體，在社會與在國家中的地位和責任，再使身體能夠強健，如此他一面曉得自己的責任，一面體格精神很好，當然他的道德可以高尚起來，智識能力可以增進起來，做一個完全的現代國民了。」（現代國家的生命力）

在四育之中，照委員長的意思，自以羣育爲首要。即必須使一個人民社會上能合作互助，在國家能盡忠犧牲，然後他所有的知識技能才對國家有效用。一個人即使有豐富的知識與高深的技能，假若他不知道他對於社會的關係，對於國家的責任，則其知識與技能，不惟不有用於社會國家，而且反而有害。所以委員長說：「我們現在的教育，就是要養成這種「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英勇死義精忠報國的人格。」（全國總動員的要義）此種羣性的教育，亦即是做人的道理之一部份，亦即是個人應了解其生命的意義，知道一個人在宇宙，在社會及在國家中的地位與責任，個人打破其自私自利的心念，犧牲其小我的快樂，以謀社會幸福之增進，國家生命之保存，宇宙生命之永續，尤其是應該了解我們國家的文化與歷史，增強中華民族的意識，以謀民族之復興。關於羣育的要點，委員長有一段精采的講話，很值得我們讀：

「我們要講生命，決不要就自己這個極小的軀殼之存亡來講，決不能就自

己這個極短的壽命之始終來講。我們要講生命，一定要講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命，要講我們整個民族整個歷史的生命！總之，我們不好把自己個人的生存看做是生命，我們要把整個民族之歷史的生命當作自己的生命！所以我們對於整個民族，整個歷史，要負起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大責任。這就是講，我們要繼續保持整個民族的生命與歷史的生命，更要努力將這個生命發揚光大而開拓於無窮。我們中華民族已有了五千年的光榮歷史，但是到了現在，整個的民族已經遇到最大的危機，全部歷史已經蒙受重大的恥辱，決不可使整們民族的生命到我們而衰微，整個歷史的光榮，到我們手裏而減色。我們一定要繼續保持我們民族，就是我們祖宗父母遺下來的五千年光榮的歷史，並努力開拓我們部下與子孫未來光榮的歷史。」（現代軍人須知）

具體地說，就是要『使得我們全國國民，都能認識我們中國的歷史地理，中國的倫理文化，中國的精神道德，和中國人偉大崇高的人格之所在，從而提高我們的



國家觀念，增進民族意識，發揮民族精神，克盡國民之天職。」（救國的基本）

此外，類似的言論，在許多講演中都可見到，此地因限於篇幅，未便引徵。但委員長的意思，讀者總可以明瞭的。而這種培養羣性的教育，委員長又給與一種名稱，稱做軍國教育，其內容當然甚為豐富，甚至可以說即包含教育的全部，但其主要之點，則在民族意識的養成。因為委員長承認教育是國家的基本生命力，關係於國家的建設者甚大，教育的設施無論如何應以國家建設為主要目標，所以民族意識的養成，當然為教育上的基本工作，委員長先生曾有一篇講演的題目即是「救國的教育」而在任何講演詞中，委員長都將此意透徹發揮。

其次便是體育。委員長對於體育的重視，實不下對於羣育的重視，甚至超而過之。在委員長的意思，身體是一切活動的基本，我們必須有健全的身體然後精神才能煥發，才能勝任艱苦的工作。可是中國人的身體，向來非常孱弱，對於身體太不注意，所以百事不能舉辦，這實在是很危險的。而且我們的父母既給我一個身體，

我們若不加以鍛鍊，實在是對不起我們的父母。委員長說道：

「要曉得身體是成功立業的根本要件。惟有強健的身體，然後可以發揮卓越的精神，成功偉大的事業。……身體的孱弱，並不是原來如此，完全是由於平時自己不去好好的鍛鍊，反而將父母給你們的身體隨便糟蹋，把自己的體格一天一天摧殘下去的結果。如此試問如何可以對得起你們的父母？更如何可以對得起我們的國家？」（軍隊基本訓練之要點）

在另一篇講詞中，委員長更有切實的話：

『因為國民如果沒有強健的體魄，便沒有強健的精神和充足的力量可以來盡國民的責任，如此，國家便不能強盛，民族便不能復興！要使國家強盛，民族復興，就非要使國民的體魄強健不可。』（救國必須實施文武合一的教育）

因為委員長對於身體的鍛鍊非常注重，所以他提倡文武合一的教育，這在中國教育理論上，實在是一種最值得注意的主張。委員長認為我們對於體格的鍛鍊，乃

在養成一種自衛自強的能力，因為「一個人如果不懂得武藝，就不能自衛，不能保護鄉里，更不能保衛國家和民族。」（見同前）所謂武藝：即是身體方面的鍛鍊。

委員長認為這種文武合一的教育，並不是他自己發明的，第一，「現在世界上凡是一等強國，他們的教育，未有不文武合一而並重兼修的。」（見同上）這是由外國教育的設施證明此種教育的意義。並且，文武合一的教育，也是我們中國古代的教育，古代的教育，有所謂「禮樂射御書數」六藝，而其中射御即是一種身體的鍛鍊，委員長說道：

「古人教育學生，有所謂「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由此可見我們中國古代的教育，本來是文武合一術德兼修的。現在一般人以為文學校只講文事，不要講武藝，這完全是錯誤了。」（見同上）

那麼武藝教育的內容應該怎樣呢？關係此點，委員長未曾提示最詳細的具體辦法，但有幾點重要的指示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第一，委員長認為學習武藝必須鍛鍊強健的體魄，而鍛鍊體魄的最好辦法便是與自然奮鬥，須使我們的身體成爲鋼筋鐵骨。自然界中的要素有「日光，」「空氣，」「水，」我們應該用這三樣東西來磨鍊我們的身體。委員長說：

「鍛鍊體格的辦法，當然很多，現在我可以提出一個最扼要的原則，就是要和自然界「日光」「空氣」「水」這三件東西奮鬥，……從嚴寒酷暑狂風驟雨，霜雪冰霰各種惡劣的氣候之中，不斷地鬥爭來鍛鍊我們的身體。……凡是有志之士，無論遇着氣候怎樣冷熱，日光怎樣利害，雨雪怎樣大，總是和他們爭鬥。如此，一定可以克服他們，鍛鍊成鋼筋鐵骨的體魄。」（見同上）

所以照這樣辦法，委員長主張用軍隊訓練的辦法來訓練一般國民的體魄，其實照委員長軍國民教育的主張，即要將所有的國民都成爲軍人。而委員長且有一種更新穎的主張，他承認軍隊即學校，學校即軍隊，與此地的理論完全是一貫的，不過關於此點，說來很長，當另詳論之。

第二，委員長承認武藝的教育，固然甚爲重要，但具有武藝，假若缺乏道德的條養，這種專門的技能，對於國家社會也不見有何利益。所以委員長又提出「武德」的教育。所謂武德教育即是一個人應明瞭其在宇宙中，在社會中及在國家中的意義與地位，並履行其責任。委員長曾提出「智，信，仁，勇，嚴」爲武德的項目。即「機智」「信義，」「仁愛，」「勇敢，」「嚴肅。」委員長說道：

「今後我們要想抵抗外侮，建立一個新的中華民國，就是要先恢復國家的靈魂，增進國家的人格。如要恢復國家的靈魂，就要先恢復我們軍人的人格；要增進國家的人格，就要先恢復我們軍人的道德，具體地講，就是要掃除自袁世凱以來到現在爲止的中國軍人一切貪污卑劣，自私自利，驕奢淫佚，儉生怕死之思想和行爲，而恢復整個民族固有的武德——智信仁勇嚴。」（革命軍人的哲學提要）

上面的話，雖然是對軍人講的，但也適用於一般國民，因爲照委員長的軍國民

教育主張，一切國民皆須受軍事訓練，則一切國民當然應該具備此等道德，否則雖具有武藝，不惟對於國家民族無益反而有害了。所以委員長說：

『在一切學術技能之先，要修養我們的精神道德，以養成完美的人格。因為精神道德是一切學術技能的根本，一個人如果沒有精神和道德，任他有什麼好的學問和本領都是無用，對於國家民族一點沒有效益，而且一切聰明才智，反可資為濟奸作惡之工具，對於國家社會，格外有害。』（為學做人與復興民族之要道）

其次關於德育，我們不必另外加以詳細的解釋，上述的武德，即是此項教育的詮釋。並且委員長在教育上的主張，始終是以道德為基礎，為出發點，且將道德的訓練，貫徹其教育的全部。例如委員長開始即主張教育的主要目的即在教以做人的道德，而所謂做人的道理，即是禮義廉恥，亦即恢復中華民族固有的道德。關於此點，本篇已反覆有所解釋，此處無庸贅述。

最後論到智育，關於知識學問的傳授，委員長並不十分重視。他以為假若個人不明白做人的道理，即使有很高深的學問，亦歸於無用。所以他主張理智的訓練，應放在道德訓練之後。不過我們細讀他的講詞，也發見他關於智育的許多主張。

委員長屢屢提到智仁勇，又提到禮樂射藝書數等六藝，可見他對於知識的重要仍然是承認的。總理解釋智為「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勢，知彼己。」委員長會根據此點加以詳細的解釋，且應用致知的原則來說明，但歸根結底，所謂智仍以道義為歸宿，「合乎大義，乃得謂之大智，遠乎道義，雖智亦愚。」關於此點，在軍人精神教育釋要一講演中，委員長有透徹的解釋，讀者可以參看。

不過無論如何知識是一切事業的基礎。總理說，「革命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知識的增進，無論怎樣是不可少的，所以委員長在禦侮救國的路一篇講演中，曾說這：

「實現三民主義，就是要努力增長我們的智識學問。……過去因為一般同

志不努力讀書以增長學問，所以不能實行三民主義，不能革命。現在我們應當切實體認。總理所教訓我們的兩句話，「革命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如果我們沒有學問做革命的基礎，那我們的工作還能實在嗎？……『所以我們要努力救國，努力革命，就要努力讀書。』

以上所述，是委員長關於教育內容的主張，此外，委員長又常常提到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均可與智德體羣四育互相發明。此處因限於篇幅，未能透徹發揮，請俟諸異日。大致而論，委員長對於德育及羣育非常重視，認為是一切訓練的基本。但體格的鍛鍊，仍為個人修養上「基本」步驟，假若沒有強健的體魄，則任何事業都無由進行。至若智育，恐怕是放在最後了。

那麼，實施上述的教育內容，應該用什麼方法呢？關於此點，委體長亦有明確的指示。第一，委員長主張教育的設施，應採用人格感化的方法，不應該採取嚴厲主義。最好教師或長官能以身作則，叫學生或部下受其感動，精神上或行為上自然



發生變化。所以委員長對於負教育責任的人，屢次有懇切的指示。在救國的教育一篇講演中，委員長力言人格教育之重要：

「我認爲現在要想改造教育，首先要由我們校長和教師的人格做起，這人格的效能比什麼都大。所以一切救國的方法，惟有以教育爲最恰當最有力，而人格教育的効力更比一切教育都恰當重要。」

此之所謂人格教育，即委員長所稱的訓育。訓育的要點，第一即在教師自己應有高尙的人格，第二，應把學校當做家庭，學生當作自己的子弟看待，甚至長官對於部下，也應該這樣，把軍營看做家庭，看做學校，對於部下的兵士「作之師，作之親。」採用這種潛移默化的辦法，結果即可引起學生的自覺自立自強的精神與動機，到那時任何訓練都容易進行了。所以就此點而論，教師個人的修養是非常重要的，委員長說道：

「自古論教育者，無不注重「身教」，貴「感化」，即所謂「人格教育」

，欲實施「人格教育」，首當注重師資，一切品德精神，思想行為等，均應以身作則，真能為學生之模範與社會之導師。」（四川教育界應負之責任）

第二個教學的原則，便是勞作教育。委員長主張每一個國民都應該為社會服務，以充實國家的力量，然後民族乃能復興。但要發揚服務的精神，必須首先培養勞動的習慣。因為一個人若沒有勞動的訓練，則將來必不能吃苦，若是為國家而犧牲，那更是辦不到了。所以我們應以古代的偉大豪傑為模範，儘力鍛鍊自己。委員長認為教育與勞動是不能分離的，勞作的結果，也能發揚服務的精神，抑且有生產的效果，所以主張「教」「學」「做」應該合一。委員長說道：

「教育應該注重養成勞動的習慣，發揚服務的精神。大家要曉得，教育和勞動是不可分離的，如果只學而不勞動，坐言而不起行，任何學問和理想如何好，也不相干。這種學問就不是真正的學問。所以「教」「學」「做」應該要合一，而「勞動」「生產」「教育」實為不可解之連環。而其最基本的一法，

就是要使一般學生養成勞動的習慣，發揚服務的精神。」（爲學之目的與教育之要義，）

在另一篇講詞中，委員長更正式指示生產教育的重要，並提出實施生產教育的具體辦法：

「此外還有一件關於教育方針的事情，各校長教職員也應該注意的，就是要提倡生產教育。生產教育最重要的，又是農業生產教育，各學校都應該特關一塊園地；以爲學生從事實習農作園藝及飼畜的場所，藉以引起學生勞作的習慣與農業生產的興趣和知識技能。現在各學校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實在是教育的一個大缺點，希望負教育責任的人，要想方法做到，各學生也應該明白這個道理，學得這種中國國民必備的謀生的本領。」（中國青年之責任）

此外，在新生活運動綱領中，更規定生產化爲三大目標之一。

第三個重要原則，便是教育的軍事化。委員長所謂的軍事化，並不僅是「現在

一般的軍事訓練，不論學生軍，童子軍，保衛團，壯丁隊的訓練，只知道教學生做一些不確不實的站隊立正，最多是會一立射擊托鎗，」（新生活的意義與目的）這些訓練，只是軍事教育的表面，並且不能說是真正的軍事訓練。須知軍事訓練尙有其基本的精神存在，此種精神即前面所說的武德，即「智信仁勇嚴，」簡括說亦即禮義廉恥：換言之，亦即做人的道理。所以委員長說道

「什麼叫做軍事教育呢？就是要使他知道做國民的道理，亦就是要使他成爲一個現代的人所必具的本能行動。古人的教育，始於洒掃應對，而終於立身行道，這洒掃應對就是今日之所謂衣食住行，立身行道就是今日之所謂禮義廉恥的實際效用之所在。所以軍事教育的精神，惟有禮義廉恥；而軍事教育的基礎，端在衣食住行。實在說，這就是普通教育所必具的條件。」（見同上）

所以在新生活運動綱領中，委員長更規定軍事化爲三大目標之一，並解釋軍事化的要點云：「所謂軍事化者，並非欲全國同胞悉數武裝偕赴疆場也。只期其重組

織，尚團結，嚴紀律，守秩序，知振奮，保嚴肅，一洗從前散亂，浪漫，推諉，因循苟安之習性已耳。」（蔣委員長爲新運週年紀念告全國同胞書。）因爲一國的國民，必須具有此等習慣，然後始能擔負救國的重任。

其實所謂軍事化，不僅限於教育，國家欲圖復興，所有的一切活動，都應該軍事化，然後在中央統制之下，所有的設施才有組織系統，人民也方知道守紀律。此即委員長所謂的「全國總動員，」亦即黃梨洲說的「寄內政於軍令。」委員長對於這一句話，認爲非常有價值，他解釋說「我們可以講，除了內政沒有軍令，也可以講，除了軍令，沒有內政，更可以講，所以一切內政，統統本着軍令來做……所有土地，糧食，文化等設施。統統軍事化，統統用寄內政於軍令的辦法。」（修明內政與整飭吏治），所以軍事化的意義是非常豐富的，不過關於此點，說來甚長，當另文評論。

此外，還有一個原則，就是因材施教。委員長主張任何一種教育，須視受教育

的個性施以適當的處理，不可強求一致，必須使每一個人能各盡其才，這樣天才便不致被埋沒。委員長曾講到訓練士兵的辦法：

「我們訓練部下，要使他有專長的技術，可以担任特殊的任務，就要先能按照適當的標準將個性及才智最相宜的部下挑出來，然後因材施教，使他們各盡其材。」（時間為一切事業與生命之母。）

那麼怎樣才能因材施教各盡其才呢？最要的一點，即在為長官者必須具有認識的能力。委員長說：

「我們要怎樣才能挑選得人呢？根本的條件就是要認識人。所謂認識人。並不祇是認識他的面孔姓名而已，一定更要能認識他的人格，個性，思想，智識，能力等等。」（同上）

委員長關於因材施教，顯然是得孔子的學說。但同時亦與歐美的個性教育相吻

#### 四 結論

委員長教育思想的介紹，擬在此暫告一結束。但是本文雖然寫了兩萬多字，而委員長的教育思想言論，實未曾全部敘述到，這是作者引為遺憾的。作者覺得委員長的教育思想，實在是當得「博大精深」四個字，而且自成來說，始終有一貫的主張。委員長的思想，有許多且與歐美最進步的教育理論相合，而發揮且更為透徹，可是此等思想，都是委員長自己體會出來的，我們委員長的講詞，始終未見委員長引證西洋教育家的言論，委員長的教育哲學的最大價值即在此點。例如委員長講行的教育，即與西洋的「行以求知」(Learning by doing)的理論完全一致，而委員長主張由行爲的訓練以培養道德爲教育的基本工作，尤其是委員長在教育上的創見。委員長的講詞中，始終不離「做人的道理」一語，他簡直是將教育與人生打成一片，亦即西洋所謂的「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活」的理論。尤其是主義教育的軍事化，而特別着重於武德，又將「教育」「軍事」「倫理」打成一片，更是一種嶄

新的創見。總之，不論由那方面而論，委員長的教育思想都成爲一個極圓滿極融合的系統。惜此處爲篇幅所限，未能透徹發揮，不過述其大要而已。欲知其詳者，請看作者的續作委員長的好育思想體系一書。（尙在編著中。）

附註：此文爲趙君府作發表於書埔月刊第六卷第四期





